

张士海
程恩富◎主编

马克思主义 文化研究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AMI核心集刊
主办单位：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3年第2期
总第12期

RESEARCH ON MARXIST CULTURE

张士海 程恩富◎主编

本期焦点：

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化发展
——访山东省高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商志晓教授
毕国帅

意识形态属性的历史溯源
张胜强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三种资源及其地位关系
常玲玲 陆信礼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内涵、维度与实现路径
刘勇

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闲暇消费及其新动向
张文富

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

二〇二三年第二期
总第十二期

山东大学出版社
SHANDONG UNIVERSITY PRESS

山东大学出版社
SHANDONG UNIVERSITY PRESS

学术顾问：王忍之 中共中央宣传部原部长

滕文生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主任

王伟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院长

编委会主任：李慎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

尹作升 山东大学（威海）党工委书记、教授

编委会成员：（第二届）

陈众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

党圣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会长

张政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校长

林建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

李正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

张国祚 中国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

刘润为 《求是》杂志原副总编、全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

孙熙国 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戴木才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秦 宣 中国人民大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

李 冉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尚庆飞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

庞立生 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原副部长

王韶兴 山东大学世界政党研究中心主任

何中华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生导师

吴文新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

孙绍勇 西北工业大学创新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

东方毅 世界文化论坛联袂主席、东方毅文化协会会长

李 明 东方毅文化协会董事局主席

娜·根·奥西波娃 莫斯科国立大学社会学系主任

谢·奥·叶利谢夫 《莫斯科国立大学学报》政治学与社会学卷编委会第一副主席

主 编：张士海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程恩富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首席教授
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世界文化论坛联袂主席

常务副主编：郝书翠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威海）常务副院长

编辑部主任：马秋丽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威海）副院长

编辑部成员：焦 佩 鲁法芹 闫惠惠 于少青 李谷悦 陈 旭（英文）

主 办 单 位：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指 导 单 位：世界文化论坛学术委员会

马克思主义 文化研究



RESEARCH ON MARXIST CULTURE

2023年第2期
总第12期

张士海 程恩富◎主编

山东大学出版社
SHANDONG UNIVERSITY PRESS

· 济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 2023 年. 第 2 期 : 总第 12 期 /
张士海, 程恩富主编. — 济南 :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23.12
ISBN 978-7-5607-8048-1

I. ①马… II. ①张… ②程… III. ①马克思主义—
文化理论—研究 IV. ①A811.67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2023)第 210649 号

责任编辑 肖世伟

封面设计 王秋忆

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2023 年第 2 期, 总第 12 期)

MAKESI ZHUYI WENHUA YANJIU (2023 NIAN DI 2 QI, ZONG DI 12 QI)

出版发行 山东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0 号
邮政编码 250100
发行热线 (0531)8836300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济南华林彩印有限公司
规 格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14.5 印张 292 千字
版 次 202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7.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访 谈

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化发展

——访山东省高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商志晓教授 … 毕国帅/3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化理论研究

意识形态属性的历史溯源 …………… 张胜强/19

论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生命力 …………… 丛逸宇/30

论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的文化

——基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视角 …………… 张 恺/41

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弦乐四重奏” …………… 姜 逸/52

“两个结合” 相关研究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现代化探索及其思想

贡献 …………… 路鹏飞/67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三种资源及其地位关系 …………… 常玲玲 陆信礼/80

新时代提升党员领导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的科学意蕴

——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分析视域 …………… 冯红伟/90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内涵、维度与实现路径 …………… 刘 勇/105

先秦儒家义利观视域下的共同富裕研究 …………… 李圣强 李 琳/118

论毛泽东的中医药观及其哲学基础 …………… 马晓慧 程 旺/130

“大思政课” 相关研究

- 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闲暇消费及其新动向 张文富/143
-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治理：内涵、价值和路径 尹铁燕/157
- “大思政课” 实践教学の学理基础研究..... 焦 佩 衣安琪/171
- 提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传播效度的多维路径优化
..... 张意梵 周 琦/181
- 新时代大学生传承红色革命文化的路径探析 陈 欣/192

动 态

- 坚持“六个相结合”，书写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研究的新篇章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研究丛书”评介 赵信彦 高 奇/207
- 增强探寻“中国之理”的使命担当
——“第三届全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术研讨班”研讨述要
..... 刘清云 武晓玮/213
- 论点摘编 /221



访 谈

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化发展

——访山东省高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院长商志晓教授

毕国帅*

【商志晓简介】商志晓，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党的十八大代表；现为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山东省高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兼任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哲学学会会长、山东省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长等；曾任山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9年），入选全国“四个一批”人才（2005年）、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2014年），是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专家。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建设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出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与现代化发展研究》《邓小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若干问题研究》《科学发展观“深度理论问题”研究》等著作30余部，发表论文300余篇，主持重大、重点、特别委托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6项，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著作1部。2012年受党中央、国务院邀请赴北戴河参加“专家休假”活动，2016年出席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 毕国帅，法学博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首都高校党建研究基地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①“两个结合”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规律性认识的重大成果，是在新征程上推进理论创新、取得实践突破、实现奋斗目标的重要遵循。2023年，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阐述“两个结合”问题，尤其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基本内涵、结合条件、结合方式、重要地位等重大问题予以全面把握、深刻揭示，为我们提供了理论指导，指明了学习思考的基本遵循和努力方向。针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本刊记者专访了山东省高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山东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商志晓教授。

一、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与思想精髓

访问者：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时，特别强调“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②。这意味着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必须首先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您能先谈谈这个问题吗？

商志晓：好的。就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问题，我们必须有这样一个基本把握：作为揭示客观世界本质与发展规律的科学，作为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改变命运、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在自然、社会、思维等各个领域充分展开，展现出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多学科向度，构建起一个内容丰富而大气磅礴的真理体系。具体来说，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有以下几方面要点。

其一，马克思主义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和科学理论。所谓“真正意义上的”，是说马克思主义具备了“科学”所应有的全部要素，满足了“科学理论”所要求的全部条件，是真正具有科学性质并把科学性质贯彻到底的思维结晶。

其二，马克思主义是广博丰厚而又大气磅礴的真理体系。马克思主义提炼形成了一系列全新观点和判断，在人类思想史上实现了一系列重大突破和创新，凝练升华为一系列基本原理，建构起一个庞大深刻的理论体系。

其三，马克思主义是融世界观和方法论于一体的伟大思维创造。在观察世界、社会、历史，在认识自然、人类、思维，在剖析阶级关系、经济结构、资本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7页。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8页。

运行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致力于对内在本质和客观规律的把握与揭示，在“世界观”意义上给予我们全景式的崭新理念；与此同时，它把唯物论与辩证法、普遍联系与永恒发展、历史与逻辑统一、由感性具体到思维抽象再到思维具体等一系列科学方法和方法论原则，运演于理论构建和思维创造之中，彰显出特有的方法论体系及非凡价值。

其四，马克思主义是诉诸行动并志在改变和创造的实践哲学。在借鉴继承德国古典哲学又与之分道扬镳后，马克思主义不仅力图以唯物主义方式重新回应历史之谜，更根本性地扭转了其纯粹认识论旨趣，将“改造世界”的抱负与追求鲜明地写在自己的理论旗帜上。

其五，马克思主义是坚守人民立场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指南。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一般规律，并且真正发现了人民群众才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原理，科学阐明了“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人民群众一代接着一代地生产着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马克思主义的这些科学品质展现于性质、内容、方法、旨趣、立场等诸方面，并同时孕育了其开放性、创新性和与时俱进等基本属性，可以说迄今为止任何一种理论学说未曾企及；它产生的思想影响和实践效能，也是迄今为止任何一种理论学说未曾实现的。正是凭借这些品质风格，马克思主义才能够站在人类思维的制高点上，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成为人类思想宝库中独树一帜的伟大创造。

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仍是当今时代不可替代的思想旗帜。这是因为：首先，马克思主义的普适性理论与科学方法论在当今时代依然无可替代；其次，当今时代既承袭历史又吐故纳新，却仍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基本视域中；最后，时代的前进与发展使马克思主义既遭遇一系列新课题、新挑战，同时也面临开拓发展的新机遇。

接下来，我再谈一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问题。

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尤需把握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实现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贯通融合。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是蕴含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并处于支配地位、发挥统领作用的核心要义，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实质凝结与核心提炼。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强调：“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我们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恩格斯格外看重他们创立的科学理论中的辩证法内容，强调其理论创造的方法论意义。列宁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要义视为“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毛泽东将“实事求是”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二者都从一个侧面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的具体凝练与科学概括。

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化发展,务必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根本、核心与实质。唯其如此,我们才能精准地而非粗略地、科学地而非机械地、有效地而非徒然地去运用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正是科学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不断凝练丰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思想内涵,才让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地位与引领功能得以充分印证,进而推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不断取得胜利。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化发展,要求我们在学习、运用与发展马克思主义过程中,不能浅尝辄止、蜻蜓点水,不能教条主义、实用主义,必须全面掌握立场观点方法的基础上,着力运用思想精髓去联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导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二、正确辨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及其当代价值

访问者: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化发展,除了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之外,还需要全面掌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正确辨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及其当代价值。在这方面,您是怎样认识思考的呢?

商志晓:中华传统文化内涵丰厚、博大精深,是以儒家、道家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文化融通的体系,包括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和新学等不同发展阶段的文化实体。从学术流派来看,包括儒家、道家、墨家、法家、佛家、阴阳家、兵家、名家、杂家等在内的诸子百家,这些流派分途发展而又相互碰撞和交流吸收。从载体来看,又包括经史子集典籍和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

中华传统文化中有大量优秀、积极的内容,也有一些过时的糟粕。我们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内容、精粹部分。党的二十大报告把“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理念,视为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视为中华文明智慧的结晶,其实就是在“文化精华”意义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作的凝练概括和精确阐释。具体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忠诚爱国的坚贞信念。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厚重积淀中,“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爱国主义情感随时代发展而升华,被广泛认同而远播,饱含着为理想、为信念、为正义、为国家舍生取义的拳拳之心,饱含着“天下一统,四海靖宁”的精神之托,饱含着“位卑未敢忘忧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报国志,可谓荡气回肠,催人奋进。

二是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是一部自强不息的奋斗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集中概括和生动写照，显示出刚健有为、勤劳勇敢、积极向上、坚忍不拔的精神品格和生命意志，彰显着中华民族历经挫折而不屈、屡遭坎坷而不馁的精神。自强不息品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旋律，深深熔铸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中，铸就了中华文化五千年绵延不绝的辉煌历史。

三是血脉相融的为民情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素有“泛爱众”的仁义情怀，有“济世兼爱”的悯爱品德，主张“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主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主张“爱民者强，不爱民者弱”，把“理天下者以人本”作为治国理政、稳固一方的理念，告诫我们战道爱民、养民恤众、政在得民。民本精神及其践行，事关国家安危、民族兴亡、百姓苦乐。只有“民本”基石巩固，国泰民安才能成为现实。

四是勤劳节俭的优良风尚。“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从《尚书》“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到《治家格言》“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从《左传》“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到《诫子书》“静以修身，俭以养德”，从《墨子》“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到古训“兴家犹如针挑土，败家好似水推沙”，千百年来，勤劳节俭一直被中华民族当成代代相传的美德、人人尊崇的品格，当成修身养性的境界、陶冶情操的主导，当成持家兴业的根本、安邦定国的保证。

五是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中华民族历来提倡“养浩然正气”“守民族气节”，推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浩然正气，怀抱“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坚定意志，树立“厚德载物”“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的道德风范，弘扬克己奉公、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奉献精神，展现“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言必信，行必果”“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的人格魅力。

六是海纳百川的宽阔胸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诸子百家熠熠生辉，儒释道和谐共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浑然一体，既有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之道，又有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为人处事的价值指南，主张国家之间、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处，不同文明之间和谐共存，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生。墨子的“兼爱”“非攻”“视人之国若视其国”，孔子的“仁者爱人”“君子喻于义”，孟子的“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均饱含着“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的和平思想，饱含着“亲仁善邻”“睦邻友邦”“协和万邦”的政治抱负，饱含着“讲信修睦”“宽广仁厚”“兼容并包”的精神特质。可以说，“和”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是中华民族为实现大同之道而铺就的对外关系的基石。

当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单有其精华,也有其内在的缺陷。我们要辩证、理性地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区分开来。有学者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缺陷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宗法制度和专制统治过分压抑了人的个性发展,长此以往终于造成衰暮之气弥漫、社会心理老化、民族精神萎缩。概言之,共性压倒个性、整体压倒个体,独立意识荡然无存,使民主的政治理念成为不可能。二是过于注重主体道德修养而忽视对客体的探求与改造,重视系统直觉思维,轻视分析与逻辑思维,因而造成轻视自然、蔑弃技艺的后果,造成虽有实用技术,但无科学理论,使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成为不可能。这值得我们深思。

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我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把握。

其一,以丰富政治智慧服务于执政党治国理政实践。“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说,固然有过分褒奖之嫌,却也道出了孔子思想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具有的丰富政治智慧,其政治理论主张所具有的政治实践精神,如为政以德、以民为本、正己正人、选贤任能等,都是古人政治智慧的体现,深刻影响了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构成了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文化根基。

其二,以充沛价值思想润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价值思想内容丰厚,在修身重德、贵和持正、守信践诺、尽职尽责、谦恭礼让、尚义勇为、仁者爱人等方面有充分体现。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与践行,须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营养,使之成为涵养润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资源。

其三,以正心修身理念作用于人的德性养成与素质提升。钱穆概括中国文化要义为:“以教人做一好人,即做天地间一完人,为其文化之基本精神。”^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丰富的道德资源与正心修身理念,教人如何坚守道德底线、追求完美人格、增强责任意识,教人如何正心修身,实现道德上的自我修养和人格上的自我完善,而这正是人之为人的存养过程。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需要从传统文化正心修身理念中汲取思想精华,通过教育引导、道德养成与行为矫正,切实提升社会主义新人的思想境界和综合素养。

其四,以完备人际规范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人际关系、人际交往规范、社会稳定和谐予以高度关注,积淀了十分厚重的理念资源。讲礼仪、讲诚信、讲正义、讲仁爱、讲和合,对当今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促进社会和谐仍然十分重要。

其五,以深厚民族精神凝聚中华儿女共襄复兴伟业。中华民族绵延五千年,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位卑未敢忘忧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都体现了先哲强烈的报国

^① 钱穆:《人生十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1页。

情怀与无畏的献身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同心同德，需要凝聚中华儿女共同投身复兴伟业，在此过程中，民族精神的伟力不可替代、无可比拟。

其六，以包容和谐思维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华民族具有与其他民族和平共处、友好相待的优良传统，形成了和谐共生、海纳百川、兼容并蓄、和而不同等基本理念。在推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今时代，传统文化的包容和谐思维渗透到经济贸易、政治外交、民族交往、文明交流各领域，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

三、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访问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蕴的思想精华与当代价值，需要我们充分挖掘、准确改造、积极转化，使之与现代社会和当代实践嫁接融通，也就是推进其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推进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问题上，您是怎样认识看待的？我们应当如何去做呢？

商志晓：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千年传承延续内在规律的现代彰显，也是它历经抗争磨难之后寻求新的作为的真切呼唤，更是当代中国语境下民族复兴伟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释放能量、发挥作用的客观要求与现实需要，还是承载民族复兴伟业的执政党和人民大众面对历史文化传统必然怀有的主体使命和责任担当。

在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问题上，学界已经产出大量成果，但在理论认识上仍需深化，仍需深刻把握其基本内涵和实质要义。什么是创造性转化？什么是创新性发展？二者是怎样的一种关系？我们应遵循什么样的原则才能达到目标？这些都需要进一步搞清楚。

毫无疑问，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一个整体，却又各有侧重、各有所指。所谓创造性转化，是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涉及理念、内容、表达、形式等各层面。其内涵要求主要有三点：一是以“现实”为尺度，按照当今时代要求、现实社会标准、当代中国人思维进行转化；二是以服务于现实为旨归，力求与现代社会接轨、与民众需求吻合，达至为今天所用、为现实所用；三是以创造性为特征，即不是简单搬运移植过来，而必须具有新生新造之韵，体现为新蕴涵新样式。所谓创新性发展，是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提升超越，重在阐发立足现实并解决当今时代问题的创新内容。其内涵要求主要有三点：一是从传统文化思想基地出发，充分尊重而不是背离传统文化思维主线和思维特征；二是以回答解决现实问题为旨归，紧扣时代需求与民众意愿去创新发展；三是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养料，在现实条件下致力于文化提升和思想超越。如此来看，创造性转化主要是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而作出的努力，本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目标

是“转化”，要求是“创造性”，旨归是“服务”；而创新性发展则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依托进行的创新努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底色，“发展”是追求，根本特征是“创新”，旨归不只是“服务”，重在提炼出融入现代社会形态的新内容，这些新内容一头联结着传统文化，一头则进入了新文化体系之中。

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一项大工程，需要强化意识、加大力度，需要持续用力、久久为功，需要整体谋划、系统推进。简言之，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发力。

一要提高阐释研究水平，增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认知，既要知其然又要知其所以然，既要知其何为又要知其如何为。阐释研究是必要的理论准备，要本着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一贯原则，在系统全面搜集古籍资料的基础上，进行认真检索、细致校验、辨析优劣、整理提升；要把“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的治学方式结合起来，倡导创新性研究，保持理论研究的真实性和前瞻性，力求推出大批在学界领先、具有影响力、学理内涵丰富的研究成果。

二要加强优秀传统文化遗产保护运用，延续血脉风骨，使其既有形又有神，达到形神兼具完整统一。传统文化遗产是先民繁衍生息的文化基因，是民族发展壮大文化脉络，是一种文化有别于他种文化的历史存证。文化遗产分为物质文化遗产（文物古迹）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文化、传统风俗、民间艺术等），我们都应倍加珍惜、有效保护。我国文化遗产丰厚，是历史馈赠给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宝贵财富。我们要夯实文物保护的基础性工作，建立完备的文化遗产保护制度，构建具有特色优势的博物馆体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体系，建设完善的数据资料和档案系统，培养完善非遗保护传承队伍，广泛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

三要强化优秀传统文化宣传普及教育，提高国民素养，让人人都充分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清楚自己从何而来、身在何处。要统筹发挥国民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教化作用，彰显学校教育的主渠道作用，将学校教育和自我教育结合起来。家庭教育在继承发扬传统文化中具有其他社会组织无法替代的作用，如尊老爱幼、勤俭持家素质的培养，知书达理、遵纪守法的行为规范养成，都更多依赖“言传身教、德教为本”的家庭教育方法。要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突出榜样的力量，树立做人做事的标杆，把社会教育的作用发挥好。同时，要强化提高国民文化素养的宣传普及工作，增强宣传普及的拓展性、辐射性与渗透性，形成自我趋同的价值导向和舆论指引。

四要完善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体制机制，夯实保障条件，把软保护和硬约束结合起来，使自觉遵守与立法规章相得益彰。制度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保证，也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根本依赖。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了原则要求和具体任务举措，阐述了基本途径、

主要措施、重点工作，从组织领导、政策保障、法治环境、社会参与等角度对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系统部署和制度性安排。我们要按照党和国家一系列政策要求，在建立机制体系、创造社会环境、优化政策举措、制定规范准则等方面创新用力，进一步完善制度政策法规体系。要遵循党和国家的制度政策法规，在具体做法上进行探索创新，推出切合实际的传承模式，如打造传统文化体验平台，推行经典阅读、礼仪普及、大众讲座等，以加大实践养成力度。

五要优化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创新环境，营造发展氛围，多管齐下合力共为，为之注入新动力、展现新景象。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各级党委、政府要重视，全社会要积极参与行动，共同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氛围。只有人人自觉、人人主动，从自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优化创新环境才能形成，才能产生应有的影响效应和带动作用，优秀传统文化才会以“日用而不觉”的潜移默化的形式走进寻常百姓家、走进人们的心中，转化为自觉行动和自主追求。只要全社会各方面各领域通力合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一定会步步为营、行稳致远。

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意义

访问者：正如您前面讲述的，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化发展，需要着力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称为“第二个结合”。您是如何看待“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及其重要意义的？

商志晓：我们先来理顺“第二个结合”的提出过程。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和基本经验，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①，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单列出来，由此形成“两个结合”的重要论断以及“第二个结合”的崭新表达。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将“两个结合”重要论断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2022年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亲授“开年第一课”时指出：“更好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

^①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3页。

化时代化新篇章。”^①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我们党对“两个结合”进行了系统阐述，针对“第二个结合”明确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②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③

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实践者，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进行了具有开拓性的理论创造，打开了理论和实践的广阔创新空间。联系党的历史看“两个结合”及“第二个结合”，可以发现，“两个结合”既是对理论创新历史经验的传承和坚持，又是对理论创新崭新格局的开创与发展。

关于“第二个结合”的价值意义，我认为，从强调“文化自信”到提出“两个结合”，再到对“第二个结合”进行深入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华文化广泛应用于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价值与文明的高度加以创造和发展，使之成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强大力量。“第二个结合”在一个新的高度拓宽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的空间，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得以联通；极大提升了我们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视野和思想境界，将传承弘扬这项重要事业置于更高的平台和更重要的地位。推进“第二个结合”，必能让马克思主义深深植根中华大地和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沃土之中，始终保持蓬勃生机和旺盛的活力；必能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扬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的理念内容，使自身内蕴的思维智慧呈现出应有的当代价值。此外，“两个结合”和“第二个结合”还巩固了文化主体性。知所从来，方明所往。一种文化要具有穿越时空的影响力，必须要有其主体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中华文明的主体性植根于五千多年的文化沃土，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不断发展壮大，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更加自觉。有了文化主体性，文化自

① 《筑牢理想信念根基 树立践行正确政绩观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留下无悔的奋斗足迹》，《人民日报》2022年3月2日。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8页。

③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民日报》2023年6月3日。

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华民族才能彻底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从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访问者：还想进一步请教您，在坚持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凸显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在“一个结合”中单列出“第二个结合”，或把“一个结合”拆分为“两个结合”，您看是否必要？您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商志晓：在“一个结合”中单列出“第二个结合”无疑是必要的。都放在“一个结合”中，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并列为“两个结合”，又觉得确有理由。仔细体会一下，分别看“两个结合”，会觉得这是两个层面的“结合”，甚至可视为两种性质的“结合”。分开有必要，可以分别把握，可以有针对性地实施，可以按相应的要求与路径去操作。可以说，“两个结合”是一体两面：“一体”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两个结合”的基础；“两面”是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两个结合”的基本维度。

在这里，我们需要明确两个问题。其一，“两个结合”是一个新命题，但并不是个新问题。将其视为新论断，并不意味着我们以往对“第二个结合”未曾关注、未曾推进，只是被统汇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之中了，由“一个结合”予以总括包含。新时代凸显“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和历史经验获得的基本结论。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两个结合”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其二，“两个结合”的提出是时代的需要，不可视为只是对此前“一个结合”的拆分。以往我们对第二个层面结合的关注与推进，总体看是从属于第一个层面结合的，既比较笼统也不够突出，且尚未达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准把握。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独立出来，由“一个结合”进展到“两个结合”，不仅是认识上的深化，更是实践上的提升，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五、在彼此契合中让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互相成就

访问者：您刚才从“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两个方面阐释了“‘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的深意，非常具有启发性。那么，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化发展，应当从哪些方面做起？切实可行的路径是什么？

商志晓：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从自身发展创新、继续中国化时代化方面看，马克思主义需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获取理念

补充和原典支撑,从其文化精华中获得夯实历史根基的深厚基础;从自身传承弘扬、实现当代价值方面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务必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中得到方法指导和主题昭示,从其思想精髓中获得走入现代社会的理念引领。在这方面,毛泽东用历史唯物主义对中国传统“民为邦本”思想进行改造,提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著名论断;运用《汉书》中“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实证与考据方法,赋予“实事求是”新的内涵,以揭示辩证唯物主义的精神实质;《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汲取了中国古代认识论和辩证法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践有机结合的典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呈现出愈加鲜明的民族特色和中国风格。习近平总书记以中华文化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言必信,行必果”“德不孤,必有邻”等,深入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政者,正也”等,论证说明全面从严治党的任务要求;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位卑未敢忘忧国”等,为弘扬民族精神提供理念支撑。这一切既赋予马克思主义理论以新的阐释论证,使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嫁接联通,同时又以唯物辩证法去激活传统文化的内在活力,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彰显出应有的当代气韵与时代风采。

在彼此契合中让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互相成就,我们必须抓住相结合的重点任务和实质性要求,在已有成果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二者联通起来进行比照鉴识,确认共通之处,明晰差异所在,昭示互补空间,以便有针对性地推进“第二个结合”深化发展。

其一,确认共通之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认知对象和着力方向上,共同瞩目于人类社会及其要素关联、人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与共同发展,都推崇思想理念的经世致用与务实品格。马克思主义对“实践”至上性和优先性的强调与追求“知行合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对立统一学说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分为二”“中庸”等,都在认知观点上具有相通性,在内在精神上具有一致性。

其二,明晰差异所在。马克思主义关注历史变迁及其发展规律,具有宏大叙事、格局纵论特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偏向群体秩序与人为修行,带有伦理道德、心性养成风格。这种差异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二者互为融通的可能区域。

其三,昭示互补空间。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价值观以及关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人观、知行观、和谐观、伦理观、诚信观及人文观念、道德精神、民族气节等方面的阐述,都有着互为借鉴的丰富内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于人的修身养性理念互补空间宽阔,定能助益当代中国马克

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人的发展理论和人的现代化理论领域实现进一步创新发展。

六、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访问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化发展，无疑对中华文明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首次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任务。您能否就此谈谈对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的认识？

商志晓：首先，我们要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个概念。相对于中华民族古代文明、近代文明而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指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来，由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已经开始创造并正在丰富发展、已经初见端倪并正在形成中的新的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启程、发展相衔接、相映照，正愈益彰显出鲜明的民族特征和中国风格，独树一帜并独领风骚。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须在实践中有所遵循。具体而言，首先要遵循当代中国实践的需要，从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就与经验、机遇与挑战、推进与发展中汲取养料，将现代文明的根基深深扎在实践之中、深深扎在现实土壤之中；其次要顺应亿万人民群众的愿望，在历史创造者、参与者、推动者的价值追求和行为取向中，校准并设定现代文明的方向与路径；最后要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物的本源、本质、本性为依归，构筑起现代文明的客观基础和主体性力量。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过程，也就是造就一个新的文化生命体、形成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过程，是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加宏阔深远的过程，是深化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必须牢牢抓住以下几个方面，加大工作推进力度。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立党立国、兴党兴国，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二是传承弘扬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进一步强化和彰显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做到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三是深化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彼此契合过程中互相成就，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四是汲取世界各民族优秀成果，通过交流互鉴促进世界文明发展进步。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与“第二个结合”高度关联。一方面，通过“第二个结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建设,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这本身就是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另一方面,有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目标引领和追求归宿,“第二个结合”就有了新的遵循与牵引,就有了新的动能与力量。“第二个结合”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

在深化推进“第二个结合”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求我们统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有着广泛蕴涵,党的二十大提到“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指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我们正在建设的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讲到“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表明我们当前要着力建设的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等表述,都体现了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内容要求,需要我们系统理解、深刻领会。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目标方向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根本任务是丰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推进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推进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须据此找准方向、提炼要义、探索路径,推进建设过程并实现建设目标。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坚定文化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要秉持开放包容,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坚持守正创新,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①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刻论述,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路径指引。

[责任编辑:马秋丽]

^①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民日报》2023年6月3日。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化理论研究

意识形态属性的历史溯源^{*}

张胜强^{**}

【摘要】“意识形态”是社会学和政治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这个概念被创造出来以前，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哲学家们就已经开始思考人类的意识形态问题。培根、洛克、爱尔维修等中世纪启蒙思想家们开启了关于人类真理性认识来源的探讨，对宗教神学进行了批判，为“意识形态”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特拉西继承了培根等人的思想，从人的思想和感觉出发，以研究认识的起源、界限及可靠性程度为任务，创立了作为观念学的“意识形态”理论，并将其视为一切科学的基础，试图以其为依据进行从学校教育到社会制度的全盘改革。在特拉西那里，“意识形态”具有肯定性的内涵，具有一定的进步性。而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意识形态不再是简单的认识问题，而是和社会实践、革命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问题。他们将意识形态置于社会历史视域之下，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颠倒反映现实关系的本质进行了批判。因而“意识形态”具有虚伪性的根本特征，成了一个否定性的概念。列宁从所处时代理论批判和实际斗争的需要出发，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将“意识形态”作为一个描述性概念使用。他明确了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了区分，提出了意识形态有科学和非科学之分这一崭新论断，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说。

【关键词】意识形态；属性；溯源

“意识形态”是社会学和政治学理论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源于一定的社会存在。而作为一个哲学命题，哲学家们则会有意无意地思考意识形态问题。柏拉图的“理念世界”或许可以被视为人类思考意识形态问题的开端。经过中世

^{*} 本文系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信息时代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研究”（项目批准号：SZZX21085）阶段性成果。

^{**} 张胜强，法学博士，九江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意识形态理论。

纪启蒙思想家的不断探索,“意识形态”一词得以产生。但是,在不同的思想家那里,“意识形态”具有不同的属性。在创始人特拉西那里,“意识形态”作为“观念学”的代名词是作为一个肯定性的含义得以存在。而到了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出于阶级批判的需要,他们将“意识形态”当成一个否定性的概念加以批判。列宁从新的时代需要出发,继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在列宁那里,“意识形态”最终成为一个描述性的概念,其本身并无褒贬、好坏之分。

一、“意识形态”产生的思想渊源

意识形态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精神现象。在“意识形态”这个概念被创造出来之前,人类就已经生活在了意识形态的世界之中,只不过哲学家们试着用其他的词语来称呼它,比如柏拉图所提出的“理念世界”和“洞穴比喻”的观点就可以看作他对意识形态问题最初的猜测和思考。

进入中世纪之后,由于受到宗教神学的禁锢,人类的认识陷入深深的谬误和偏见中。为了批判中世纪神学和经院哲学,以培根、洛克为代表的英国近代经验论者和以爱尔维修、霍尔巴赫为代表的法国启蒙学者们深刻分析了人们的认识产生偏见和谬误的原因,开启了人类如何获得真理性认识的探讨,“意识形态”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

学者们普遍认为,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是开创意识形态学说的先驱。大卫·麦克里兰曾经在其著名的《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最初讨论意识形态的直接先驱是如弗朗西斯·培根和托马斯·霍布斯这样的思想家。”^①培根提出了著名的“四假象说”,分析了人类心中根深蒂固的错误观念产生的原因,对经院哲学形形色色的错误观念展开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对柏拉图“可靠的”理念世界进行了深刻反省和挑战。西方学者大多认为,培根所提出的“四假象说”对催生意识形态概念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成为意识形态概念产生的先兆。继培根之后,洛克的重要著作《人类理解论》成为意识形态概念产生的真正催化剂。洛克主张感觉经验是观念的唯一源泉,“一切观念都是由感觉或反省来的……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建立在经验上的,而且最后是导源于经验的”^②。洛克认为,人们在表达思想、传授知识的时候,普遍采用语言和文字两种形式,它们是人们内在观念的外在表达形式。因此,人们为了避免形成错误的认识,就一定要科学、严谨地使用语言和文字,按照一定的逻辑规则审慎地进行判断和推理。

法国启蒙学说承继了英国的经验论传统,将传统观念特别是经院哲学流传下

① [英] 大卫·麦克里兰:《意识形态》,孔兆政、蒋龙翔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② [英] 洛克:《人类理解论》上册,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8页。

来的种种“偏见”作为批判和抨击的主要对象。法国启蒙学说的代表学者爱尔维修认为，人们在感官的基础上产生了感觉，经验由此得以形成，而所有的知识都来源于外部经验，因此人们的感觉是一切知识最根本的来源。爱尔维修指出，宗教统治的实质在于通过控制人们的思维，用迷信和愚昧束缚人们的思想，以建立并实施宗教权力，达到维护教派利益的目的。“若不依赖迷信的帮助，僧侣的权力就无法施行。靠着迷信，他们抢劫了法官的权威及国王的合法权力。他们靠它压制人们，对其施行凌越法律的权力。也因此而败坏了每一道德规则。”^① 爱尔维修对宗教的虚伪道德的批判、对观念与利益关系的分析成为意识形态学说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

而霍尔巴赫则认为一切知识来源于经验。“我们所有的概念，都是作用于我的知觉器官的对象的反映”^②，人的感觉是认识的唯一通道。正是基于这一学说，他对“上帝”这一概念展开了批判。他认为上帝本质上是不存在的，充其量只能算作是想象的产物。它既不能创造客观的世界，也不能使物质发生运动，“只能产生荒诞、幻想、疯狂和纠纷”^③。宗教驱使人去信服的上帝，本质上是人虚构出来的产物，而这正是人们产生偏见和谬误的一个根本原因。

在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看来，人的认识之所以会产生偏见，既有生理和心理方面的原因，也受到人们利益的制约。他们所共同坚持的感觉主义的立场深刻影响了“意识形态”概念的产生，为“意识形态”概念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④

综上所述，英国经验论者主要是从感觉经验出发，对可能导致错误观念产生的种种原因进行了探讨，对中世纪的神学传统开展了大胆宣战，为“意识形态”概念的产生提供了原始动力。而法国启蒙学者则从生理、心理及利益等不同的角度，对传统观念尤其是经院哲学流传下来的种种“偏见”展开了批判。

二、特拉西：肯定性的意识形态属性

《哲学大辞典》《外国哲学大辞典》《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英汉哲学术语词典》都认为，“意识形态”一词最早是由法国哲学家、政治家德斯杜特·德·特拉西在1796年提出的。^⑤

特拉西深受爱尔维修、洛克等人哲学思想的影响，继承了他们的认识论传

① [美] 威尔·杜兰：《伏尔泰时代》，台北幼狮文化公司译，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480页。

② [法] 霍尔巴赫：《健全的思想》，王荫庭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3页。

③ [法] 霍尔巴赫：《健全的思想》，王荫庭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1页。

④ 参见李萍：《马克思意识形态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5页。

⑤ 参见冯契主编：《哲学大辞典》下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17页；冯契、徐孝通主编：《外国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893页；[英] 尼古拉斯·布宁、余纪元编著：《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69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译丛》编辑部编：《英汉哲学术语词典》，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页。

统,是一个彻底的感觉主义者。在他看来,人的感觉归根到底是一切准确的观念的基础,是感觉和神经系统的活动创造了人们的全部思想活动。人类过去的经验、知识是通过神学获得的,但“观念如果不能还原为人们通过自己的感官能够获得的感觉经验,就必定是虚妄的,必定不属于意识形态的范围”^①,所以人类现在应该学会理性思考。正因为如此,他才创立了“他称之为意识形态的学科”,而“意识形态的唯一的任务正是这种包罗万象的还原”。^②

按照特拉西的理解,“从字面上看,意识形态可以被称为观念学”^③。特拉西的本意是希望开创一门能够对人的思想和感觉作出科学分析的学科、一种关于观念的学说,从而为人们改良社会和政治环境提供帮助。特拉西创立的观念学以研究认识的起源、界限及可靠性程度为主要任务。由此可见,意识形态作为观念学从一开始就把认识论中的根本性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从根本上而言,它是作为一个哲学概念而得以产生的。^④

特拉西把观念学视为一切科学的基础,“对于特拉西来说,意识形态是哲学上的基础科学”,“在谱系上,它是‘第一科学’……它也是文法、逻辑、教育、道德的基础,以及最终是‘最伟大的艺术’的基础”。^⑤ 特拉西认为,真正的道德观念应该从人类与生俱来的自然的善的本性出发,具有保障社会成员利益和关系和谐的功能,而意识形态将为形成和发展科学的道德观念提供理论基础。

特拉西还将观念学视为政治理论的基础。他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由的,人只有在自由中才能生存和发展。同样,自由也是多种政治力量所追求的目标,这也就构成了国家建设的出发点。以此为基础,不仅能帮助准确理解经济学中的分工、财富、价值、工业、分配、人口等一系列观念,而且也只有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政治理论尤其是国家理论,才具有可能给人民带来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幸福的合法性。这样一来,“意识形态变成了社会的理论基础”,这样的学说将为革命后法国的建设提供科学的认识论基础。

特拉西提出的意识形态学说以可靠的感觉经验为基础,强调在可靠的感觉经验的基础上形成正确、理性的观念,并对政治、法律、经济、教育等其他各门社会科学的基本观念进行重新建构,对以宗教神学为代表的其他各种传统的、权威性的偏见展开了批判,其本质是在否定种种宗教和神秘观念的同时,将批判的矛头直指那些正在维护这些观念的、旧的政治制度,特别是其中的国家制度。这不仅标志着认识论从彻底的感觉主义转向经验主义,更表明特拉西意图通过运用意

① 聂海杰:《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思想及其当代价值》,《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② 苏令银:《意识形态概念的历史流变》,《前沿》2008年第8期。

③ 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页。

④ 参见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页。

⑤ [英]约翰·B. 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铨等译,译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32页。

识形态进行社会实践生活的革命。

经过特拉西以及深受其学说影响的意识形态家们的共同努力，意识形态学说在法国学术界逐渐产生了影响。他们试图以“观念学”为依据进行从学校教育到社会制度的全盘改革，“以意识形态为指导思想”甚至写进了法律。

由此可见，特拉西创立的意识形态理论具有肯定性的内涵。他关于意识形态的论述符合法国整个启蒙运动的基本精神，在历史上具有一定的进步性。

当然，特拉西的思想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特拉西仅仅通过感觉不可能获得关于任何一门社会科学的正确结论，纯粹的感觉主义立场不能科学地解决认识论的基础问题，更不可能成为改造其他学科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特拉西把观念学定位为一套理性政治学，是“社会的理论基础”，是建立理性社会、实现人类解放的思想依据。但实际上，他并没有认识到意识和人们的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特拉西的观念学的本质充其量是唯心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已，在他们那里，存在和意识、生活和观念的关系其实是颠倒的。

特拉西的意识形态理论带有一种启蒙理性的共和主义色彩，并反对当时的拿破仑政府。因此，拿破仑对特拉西的理论极为不满，他轻蔑地将特拉西的理论称为“形而上学”，说它是一种空谈或脱离实际的错误观念，并将自己失败的原因归结为观念学的横行无忌。^① 马克思接受了拿破仑的这种观点，在《资本论》中，他将特拉西称为“冷血的资产阶级空论家”^②，并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伪本质展开了批判。

三、马克思、恩格斯：否定性的意识形态属性

特拉西以及深受其学说影响的哲学家们几乎都是从认识论的视角出发分析意识形态。尽管马克思、恩格斯也赞同他们针对宗教神学和形而上学开展的批判，但在前者看来，意识形态不再是简单的认识论问题，而是和社会实践、革命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将意识形态置于更广阔的社会历史视域之下，对意识形态颠倒地反映现实关系的本质进行了批判。因此，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具有了否定性的含义。

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专门研究意识形态理论，甚至没有对意识形态的概念作出明确具体的界定。他们关于意识形态的论述主要集中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书中指出：“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

^① 参见谢江平：《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批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3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纪念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746页。

上层建筑的基础。”^① 在这里,“观念的上层建筑”指的就是意识形态,即一个由政治、法律、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等多种人类意识形式构成的有机整体,也可以称之为“思想体系”。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意识形态起源于社会分工的发展。在生产效率逐步提高以后,社会分工也逐渐得到发展,从起初以性别差异为基础的自然分工发展到后来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社会分工。社会分工形成以后,意识形态才得以产生。“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② 到了阶级社会,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意识形态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主要的谋生之道,而另一些人对于这些思想和幻想则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并且准备接受这些思想和幻想,因为在实际中他们是这个阶级的积极成员,很少有时间来编造关于自身的幻想和思想”^③。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意识形态常常是作为贬义而被使用的。此外,他们在使用意识形态术语的时候经常将它与一些限定词或词组一起使用,如“共和国的”“德意志的”“黑格尔式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等,有时还使用“意识形态主导”“虚假意识”“意识形态的企图”“意识形态的歪曲”“意识形态的立场”“意识形态的空话”“意识形态的反映和回声”“意识形态的理论”“意识形态的方法”“意识形态的代言人”等表述。^④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揭露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人们实际生活的掩蔽。他们指出,意识形态本质上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家的精神生产的产物,不过是“掩蔽资产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的偏见”^⑤。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种种传统的意识形态的分析,认定其根本特征是用神秘的、扭曲的方式去反映现实世界,“根本颠倒了存在和意识、生活和观念的关系,不是从生产、生活的实践出发,而是从幻想的观念出发,甚至以观念代替现实”^⑥。也就是说,意识形态与现实的关系是一种不真实的、掩蔽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形态作为统治阶级思想的产物,它的目的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合法统治。它非但不以揭示现实生活的真相为目的,相反还竭尽所能去掩蔽人们的现实生活和现实交往关系,以便维护所谓的“长治久安”。

马克思去世以后,恩格斯晚年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继续针对意识形态展开批判。他指出:“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

①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3页。

④ 参见张秀琴:《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理解史》,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2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77页。

⑥ 聂立清:《我国当代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1页。

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因此，他想象出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①恩格斯认为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种“虚假的意识”，从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捍卫并发展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学说。

因此，对于传统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持一种否定的、批判的观点，从根源上去揭露意识形态的虚假本质，并且主张要通过现实的实践、革命将阶级社会里颠倒的世界再颠倒回来。

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批判资产阶级的立场，从阶级关系和阶级分析的角度出发，认为意识形态是对现实生活的歪曲和颠倒，它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真实的社会关系，掩盖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它本质上是有意无意的欺骗，“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②。在他们看来，意识形态的欺骗性总是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统治阶级总是试图混淆他们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特殊利益与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之间的关系，尽力将他们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特殊利益描绘成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在阶级社会，国家机器本身就是一部意识形态机器，各阶级之间进行着激烈的利益冲突。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统治的合法性，不仅需要得到本阶级内部成员的认可，更需要获得全体社会成员的认同与接受。于是统治阶级便将本阶级的特殊要求泛化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要求，将本阶级的特殊利益说成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并试图将这种利益说成是永恒的、超越阶级的，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最合理、最美好的人类社会，营造出一种虚假的幸福家园画面。意识形态的虚伪性正是源于这种普遍利益的虚幻性。

其次，统治阶级总是试图将他们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意识形态描绘成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③ 在他们看来，统治阶级不仅控制着社会的物质生产，也控制着社会的思想生产，占支配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而意识形态作为一定社会历史时期的精神生产的产物，就其本质而言，是由统治阶级内部的思想家根据本阶级的利益，自觉或不自觉地编造出来的、总是体现为统治阶级的思想。这种思想会被他们描绘成是最合理的东西。“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2页。

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惟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①即便是那些进行革命的阶级，在反对统治阶级时，也总是以全社会的代表自居，将现存的一切都宣布为最不合理的，而将自己努力争取实现的一切宣布为最合理的。比如，在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时，资产阶级所提出来的“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思想是最符合资产阶级利益需要的，但资产阶级却将它们说成是全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显而易见，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和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利益之间是存在着明显差异的。

再次，统治阶级内部的意识形态家们也倾向于将特殊的、暂时的、片面的事物描绘成是普遍的、永恒的、全面的东西，极力将现存的各种秩序描绘成是最好的、永恒的理想状态，对现实中的丑恶和苦难进行美化和修饰，将等级压迫誉为平等，将奴役称为自由。比如，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力图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描述成是最合理的生产关系；拥护王权、贵族和资产阶级联合统治的政治家们则试图将分权学说表述成最符合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等。把历史的、暂时的东西说成是永恒的东西，同样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家们通过不懈努力所制造出来的一种幻想。

最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学家们在考察、分析历史时，还总是尽力将统治阶级的思想与统治阶级本身区别开来，将这些观念包装成为具有独立性的事物，并证明这些观念是支配整个社会前进的决定性力量。

因此，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整个背景来看，他们始终是把意识形态当成一个否定性概念来看待的。在他们看来，意识形态是一种“本末倒置”^②，“主体颠倒为客体以及反过来的情形”^③。它本质上是对社会现实的颠倒的、神秘的反映，其根本特征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掩蔽人们的现实生活和交往关系的真相”。因此，只要存在着阶级剥削关系，意识形态便必然具有阶级性。只有在马克思所向往的消除了剥削和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才有可能真正消除。

值得一提的是，意识形态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既然是作为一个否定性的概念而存在，那么在谈到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相对立的概念时，他们一般将它称之为“科学”。这里的“科学”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自然科学，二是指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显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把他们自己创立的学说也称作“意识形态”，而是把它们称作“科学”，是“我们用来同意识形态相对立的抽象”^④。

①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1页。

四、列宁：描述性的意识形态属性

列宁承继了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的基本精神，并且从革命实践和理论批判的需要出发，对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了新的说明和阐释，丰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的内涵。列宁不再一般地讨论意识形态的虚假性，而是认为它既可能是虚假的，也可以是真实的。如果说历代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特别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虚假的，那么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则是真实的、科学的。

列宁所处的时代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经济和政治变得越来越不平衡，这为无产阶级通过革命的手段谋求自身解放提供了较好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不仅先后战胜了各种资产阶级思潮的进攻，也清除了许多泛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工人运动的影响，成长为国际工人运动中最有影响的一种指导学说。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已经绝对地战胜了工人运动中的其他一切意识形态”^①。因此，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再笼统地将意识形态同虚假性画上等号，实际上也就相当于变相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列宁明确了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强调超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不存在的。他指出，任何意识形态都是为特定的阶级服务的，具有鲜明的阶级性，阶级性就是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思想体系，而且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因此，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②他认为，在具体的阶级斗争中，剥削阶级有他们的意识形态，无产阶级为了谋求自身解放，也应该而且更要有作为自己思想武器的意识形态。

列宁区分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在列宁看来，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剥削阶级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从本质上来说是虚假的，需要对它们加以揭露、批判和斗争。^③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是正确地揭示社会运动规律、适应社会历史发展潮流的科学的意识形态。因此，列宁认为，抽象地看，“意识形态”应当成为一个描述性的概念。“在列宁那里，意识形态的含意的变化过程达到了顶点。意识形态不再是取消冲突的必然性的扭曲，而是成了一个涉及阶级（包括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的中性^④的概

①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②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6～327页。

③ 参见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3页。

④ 中性并不表示意识形态是某种超阶级的东西，实际上也就是描述性的概念，即意识形态是整个社会结构的一部分，不同的阶级（包括）无产阶级都拥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在谈到意识形态时，既不否定它也不肯定它，只采取描述的态度。

念。”^① 列宁虽然不再一般地讨论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但他却提出了意识形态有科学和非科学之分这一崭新论断，并提出了“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科学的思想体系”的新概念。“一句话，任何思想体系都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可是，任何科学的思想体系（例如不同于宗教的思想体系）都和客观真理、绝对自然相符合，这是无条件的。”^② 在列宁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为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服务的，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同时，马克思主义鲜明揭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体现了科学性与阶级性、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统一，是“科学的意识形态”。“科学的意识形态”的概念也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指明了方向。^③

在列宁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日趋复杂，“为了避免工人群众遭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侵蚀，迫切需要一种正面的、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相对立的理论形态与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④。从这种斗争的实际需要出发，列宁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从“中性”的立场揭示意识形态对全体社会成员尤其是无产阶级所具有的作用和意义。在列宁看来，阶级社会中的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种价值理论，它是服务于与服从于阶级斗争的需要的，它的性质由其阶级主体所决定，而其本身无所谓好坏。因此，列宁时期，马克思主义由“我们用来同意识形态相对立的抽象”^⑤ 发展成为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相对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深刻认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努力用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即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就成了列宁时代无产阶级的重要使命。列宁对意识形态问题的重要论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说，对后来苏联和中国的思想家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以后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新的探讨中，列宁的意识形态概念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并成了最有影响的学说。”^⑥

五、结语

在“意识形态”概念的创始人特拉西那里，“意识形态”是一个肯定性的概念，是“观念的科学”的代名词。特拉西之所以赋予它以肯定性的含义，目的是把它与经院哲学、神学和宗教的种种错误见解对立起来。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成了一个否定性的概念，因为他发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真正基础是黑格尔

① Tom Bottomore, ed., *A Dictionary of Marxist Thought*, Second Edition, Wiley-Blackwell, 1983, p. 222.

②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6页。

③ 参见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0页。

④ 余一凡：《从马克思到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确立》，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1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1页。

⑥ 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3页。

哲学，而黑格尔哲学本质上作为唯心主义，把一切都头足倒置起来，颠倒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不对以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为基础的种种错误的观念进行彻底的清算和批判，是不可能从思想上开辟出任何真正的道路来的。而列宁从他那个时代的理论批判和实际斗争的需要出发，对意识形态的含义作出了新的说明，不再将意识形态当作统治阶级的附庸，而将意识形态当成一个描述性的概念使用，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学说的推进和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

The Historical Traceability of Ideology Attributes

Zhang Shengqiang

Abstract: Ideology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in sociological political theory. Before this concept was created, philosophers represented by Plato began to consider human ideology. Bacon, Locke, Claude-Adrien Helvétius, and other medieval enlightenment thinkers started the discussion on the source of human truth, criticized religious theology, and laid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for the emergence of ideology. Tracy inherited the ideas of Bacon and others, founded the theory of “ideology” as a concept based on people’s thoughts and feelings, with the task of studying the origin, boundary, and reliability of cognition, and regarded it as the basis of all sciences, trying to carry out a comprehensive reform from school education to the social system. In Tracy’s view, “ideology” has a positive connotation and a certain degree of progress. In the view of Marx and Engels, ideology is no longer a simple problem of cognition, but a problem closely related to social practice and revolutionary struggle. They put ideology into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d criticized the essence of bourgeois ideology’s reversal to reflect realistic relations. Therefore, “ideology” has the fundamental feature of hypocrisy and has become a negative concept. Lenin insisted on the basic viewpoint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used “ideology” as a descriptive concept from the needs of theoretical criticism and practical struggle in his time. He defined the class nature of ideology, distinguished bourgeois ideology from proletarian ideology, and put forward a brand-new conclusion that there are scientific and unscientific ideologies, thus enriching and developing Marxist ideology theory.

Keywords: Ideology; Attributes; Traceability

[责任编辑：闫惠惠]

论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生命力^{*}

丛逸宇^{**}

【摘要】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深刻剖析了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提出人类要按照自然规律改造和利用自然、劳动实践是实现人与自然统一的现实形式、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终将实现等重要内容，其理论的科学性为解决人类生态环境问题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当下，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彰显出旺盛的生命力：为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提供思想和方法指导，强调应对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的制度优势，强调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能动反作用，为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启发。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创造性发展。新时代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生命力需要坚持继承与发展的统一、理论与现实观照的统一、中国立场与国际视野的统一。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生命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讲话中指出：“在人类思想史上，没有一种思想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产生了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①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它的诞生不仅影响了人类思维本身的发展，而且极大推进了人类文明进程。其中，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它从西方走向东方，从一个世纪走向另一个世纪，经过时间和空间的洗礼，依旧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闪烁着真理的光芒，历久弥新。本文尝试总结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基本内容，阐述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现实表现，在此基础上挖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继承与发展，并对新时代继续增强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生命力作

^{*} 本文系山东省社科基金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研究”（18CXSJ09）阶段性成果。

^{**} 丛逸宇，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威海）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①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0页。

出展望,以期为当代人重新审视和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走出生态困境,并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新境界作出一些理论思考。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基本内容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加剧环境污染、生态恶化以及资源短缺等现象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和思考,经过系统的研究,构建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概括起来,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主要涵盖以下四方面内容。

(一) 人与自然是相互依赖的有机整体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既不宣扬人类中心主义,也不主张自然中心主义,而是坚持生存论视阈下的人与自然内在统一。人与自然是相互依赖的有机整体。首先,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①人类起源于自然,生存于自然又发展于自然,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而“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部分,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②。自然界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源头和基础,在某种意义上,人类自身发展的历史本身就是自然史的一部分。其次,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前提。自然界是社会生产过程中资源、能源的供应者,为人类的生产生活提供了必要条件;同时,自然界中各种有生命和无生命的存在又构成人们进行艺术创作和审美的对象,给人带来美的享受,是人类精神的源泉。由此可见,人类精神世界的充盈和物质世界的满足都要以自然界为前提和基础。诚如马克思所言:“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③也就是说,自然界不仅是人类生产生活的无机界,还是人类精神领域的无机界。因此,人类与自然休戚与共、互利共生的有机统一体。对于人类而言,自然界具有先在性和前提性意义,离开了自然界,离开了感性的外部世界,人类就无法进行生产和创造。

(二) 人类要按照自然规律改造和利用自然

自然界的变化发展不是随机的,而是有规律可循的。人类在与自然界进行物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3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页。

质交换的过程中,不能随心所欲,必须遵循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做到尊重自然、善待自然;同时,要将人类改造自然的欲望控制在理性的范围内。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指出:“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①人们在対大自然进行改造和利用的过程中,虽然凭借自身智慧取得了满足自身生存发展需求的生产生活资料,但是其不合规性规律的实践活动对自然界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恶劣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因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②人类具有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能够在改造自然的实践过程中认识和掌握自然发展的客观规律,并按照规律必然性的要求从自然界中获取生存发展的资料,以实现自身目的并满足自身欲望。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可以挣脱自然规律的束缚而肆意妄为,人类必须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因此,我们需要克服“支配自然”和“征服自然”的错误思想,摒弃主人的傲慢,平等地与自然对话,理性地与自然握手,亲近自然,善待自然,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更加合理地改造和利用自然。只有如此才能实现自然与社会的永续发展。

(三) 劳动实践是实现人与自然统一的现实形式

在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语境中,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的,并且这种统一是通过实践来实现的。马克思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③人类通过劳动实践开展对象化的活动,并且在能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彰显并确证自己的本质力量。在某种意义上,“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④。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确立了劳动是人的本质的思想,认为人类正是通过劳动实践才得以改造自然并建立起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劳动实践中,自然界既是人们劳动的对象,也是人们获取生产生活资料的源泉和基础。对于人类而言,自然界既不是纯粹的主观意识,也不是纯粹的客观对象,我们应该把自然界理解为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人化的自然界”,而这种“人化的自然界”就体现在它是人类劳动实践的产物。^⑤人类通过劳动实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9~56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7~20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0页。

⑤ 参见邓坤金、李国兴:《简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观》,《哲学研究》2010年第5期。

实践使“自在自然”转变为“人化自然”，“自在之物”转变为“为我之物”。人类实践所改变的不仅仅是自然界的形态，更重要的是它把人类的欲望以目的的形式外化到自然界中，将人类的思想观念转化为现实的物质存在，从而不断扩大人化的对象性世界。劳动实践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在劳动实践中，人类具有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能力，不仅能够探索出事物变化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在合乎自然要求的前提下改造自然，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四）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终将实现

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间的矛盾之所以会扩大并发展到极端程度，归根到底是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固有的且无法克服的弊端造成的。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劳动异化直接或间接导致了自然异化；以利润至上为主要价值目标的资本逻辑是造成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对立冲突的根源所在。^① 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最终目标就是无休止地攫取劳动人民创造的剩余价值。这种以无限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会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而置身自然之外支配与征服自然的态度也势必会造成人类对自然的无限索取与破坏。通过对资本的批判，马克思科学地描绘了人类走出生态困境、实现生态和谐的光明图景，即必须变革具有反生态性的资本主义制度，用“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取代“以物为本”的资本主义，并在发展的基础上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条件下，“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②。到那时，社会物质财富将极大丰富，阶级将会消亡，为生产而生产的利润动机不复存在，人们将按照自然资源的状况和社会成员的需要进行生产。马克思指出：“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③ 到那时，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异化状态将被彻底消除，人与自然也终将达到和谐统一的理想状态。

二、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强大生命力的现实表现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超越工

^① 参见刘希刚、徐民华：《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及其历史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8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8～92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页。

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经验总结和大势所趋。马克思、恩格斯在实践过程中探索总结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发现了潜藏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生态问题,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理论内容的科学性使其具有跨越时代、跨越国度的影响力,在21世纪的今天仍彰显出旺盛的生命力,不仅为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指明方向,而且为全球的生态文明发展提供启示。

(一) 为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提供思想和方法指导

物质生产是现存感性世界的基础,生态环境的保护同样要以发展生产力为基本前提。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启示我们,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是相互促进的有机统一体。在一定条件下,自然与经济可以实现良性循环。因此,我们要正确地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把发展与生态保护紧密联系起来,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谋求发展,在发展的基础上改善生态环境,既要尊重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律,又要尊重自然生态的法则。只有使生态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二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才能为经济稳定增长提供长期发展的动力。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受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人们对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认识不够,片面强调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结果陷入用污染换发展的误区。面对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人们开始反思过去粗放的、欠缺科学性的发展模式,并在实践中对此进行纠偏和矫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为指导,审时度势,提出在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过程中必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①,贯彻落实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思想。要使干部群众深刻认识到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之间辩证统一的关系,努力把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使人民群众既有绿水青山,又有金山银山,从而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良性互动。^②为此,我国大力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发展绿色经济,努力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节能环保龙头企业,着力推动重点技术装备产业化发展;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动可再生资源清洁回收、规模化利用和集聚化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指导下,我国正在走一条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相辅相成的新发展道路,在努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路上稳步前进。

(二) 强调应对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制度优势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认为,以资本无限增殖和以利润最大化为导向的资本主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209页。

^② 参见魏华、卢黎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内涵、特征与时代价值》,《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义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催生了不合理的生产和消费方式，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被不断激化。在西方物质享乐主义的刺激下，人类一味战胜自然，对地球进行了毁灭性的开发和利用。有违规律的发展模式致使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也愈演愈烈并逐渐发展为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这种资本逻辑的认知框架使人们忽视了生态环境对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作用，自然界被看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人类的生存环境受到了永久性的破坏，严重制约了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社会主义制度在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问题上具有显著优势。首先，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能够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重大作用，着眼于国家长远利益，对全国生态文明建设进行统筹谋划和总体布局；同时，党能够凭借完备的组织架构实行政治动员，以统一的思想凝聚共识，集中各方面的力量、资源办大事。其次，人民至上的群众观念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力量源泉。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思想，在党的各项工作中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意味着中国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建设是为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发展服务的，它能真正代表人民的意愿和要求。在党的领导下，国家能够制定并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向上、向好发展。从政治视角来看，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启示我们，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这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保障和优势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①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指导下，遵循“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五个文明”协同发展的生态文明发展新道路，彰显了中国制度优势下独特的道路优势。^② 新时代，我们要继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为指导，坚持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努力构建生态宜居、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向着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稳步前进。

（三）强调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能动反作用

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经济虽然得到快速发展，但与此同时，各种生态灾难也接踵而至。优美的生态环境是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也是重要的民生问题，解决好生态环境问题事关生态安全、发展空间和社会稳定。它既是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社会意识对

^①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13～14 页。

^② 参见王雨辰、彭奕为：《论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及其当代价值》，《云梦学刊》2023 年第 1 期。

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因此,要取得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性胜利,还需加强生态文明精神建设,通过各种手段途径培养全民的生态文明意识,使人民群众在生态文化的潜移默化中变被动接受为主动改变,进而夯实生态文明建设的群众基础。首先,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理念。我们要从价值导向上促使人们转变思想观念,抛弃经济利益至上、物质享受优先的错误思想。通过在全社会倡导简约、节俭、生态、低碳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努力培育社会主义先进的生态文化。其次,完善生态文明的教育机制。把生态文明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当中,贯穿于全民教育和终身教育,倡导生态良心、生态正义和生态义务,把生态意识上升为全民意识。^①同时,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鼓励高校加快建设与环境保护相关的学科体系。最后,构建生态文明传播体系。通过大众传媒把生态文明融入精神文明建设之中,融入党风、政风和民风民俗中,从而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生态文明观念,培养和提高人们的生态道德素质,努力营造全民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良好氛围。总之,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指导下积极发展社会主义生态精神文明,努力让每位公民都成为生态文明理念的传播者和践行者,身体力行、真抓实干,努力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四) 为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启发

今天,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深入,各国之间相互依存、紧密联系,日益发展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生态环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整体性和相关性,地球上的每个部分、每个系统都是自然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各部分、各要素之间相互依赖、彼此制约。环境的影响是不分国界的,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会产生连锁反应,制约并影响全球的生态环境。各国虽然在政治上是独立的,但在生态环境上却是相互依赖的。因此,保护生态环境仅靠几个国家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需要世界各国携手应对、共同解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的生态文明建设都具有启发性的深远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建设美丽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想。面对生态环境挑战,人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唯有携手合作,我们才能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海洋污染、生物保护等全球性环境问题,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只有并肩同行,才能让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全球生态文明之路行稳致远。”^②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只有强化国际合作,我们才能走出单个国家在处理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方面力量不足的困境,整合全球的智慧来共同应对这个

^① 参见陶良虎、刘光远、肖卫康主编:《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3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75页。

世界性的挑战，从而实现国际社会持久发展的目标。为此，“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同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①，各国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为指导，努力贯彻落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发扬国际主义精神，积极履行本国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国际责任和国际义务，同舟共济、权责共担、携手应对，竭力守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地球家园。

三、新时代增强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生命力的立场原则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是解决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重要宝库，是世界各国人民攻坚克难、互鉴共赢的思想法宝。新时代要继续增强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生命力，必须坚持继承与发展的有机统一、理论与现实观照的有机统一、中国立场与国际视野的有机统一，由此推动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不断焕发出青春活力，更好地指引人类前行。

（一）坚持继承与发展的有机统一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是一个具有自我超越能力的开放体系，具备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② 同样，新时代要不断壮大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生命力也需要在继承和发展的统一中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两个结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我们党探索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成果和理论创新，也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在当代中国的最新诠释，它的产生和发展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蕴藏着极为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儒家、道家和佛家都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例如“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生态理念，都与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哲学呼应会通。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生态智慧与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进行有机融合，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激活中华民族绵延至今的生态文化，并结合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践提出了富有中国智慧、中国价值、中国风格的生态文明理念。例如，“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25页。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7页。

觉,失之难存”^①,“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这个生命共同体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②,等等。这些具有时代性和创造性的生态文明思想将人与自然紧密联系起来,既是对古老中国和谐平衡、天人合一思想的时代阐释,又反映了我们党在新时代对人与自然关系和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基本内容的总体认识。^③新时代,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生命力,仍需要坚持继承与发展的有机统一,在“两个结合”的过程中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新境界。

(二) 坚持理论研究与现实观照的有机统一

中国是世界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最多的国家,是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出版物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在实践中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国家。因此,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极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内部环境。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的内在统一,其理论性和实践性相互交织、此消彼长。有学者认为,在实际过程中,我们的实践与我们的理论成果相比还相差很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逐渐弱化的趋向,马克思主义存在着沦为学术研究工具和学术理论话语表达的危险。过于从学理层面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其结果是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渐脱离其发展的现实根基,马克思主义愈来愈失去其革命性和现实性,而演变为一种学术研究对象。^④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史上最具有实践性的学说,它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实践的理论,是指导人们改造世界的行动指南。因此,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必须重视并处理好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理论与实践不可分割的内在特质,既要强调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理论性和学术性,又要突出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实践性和现实性,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进一步增强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生命力。为此,我们要像马克思那样对社会现实保持高度的关切,将理论研究着眼并落脚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具体问题,着力构建中国特色生态哲学学术话语体系,增强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在新时代的话语能力,不断扩大理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同时,回归并拓展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发展的实践维度,使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始终保持与实践对话的姿态。因为,正是在回答和应对时代挑战、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才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并实现它对人们认识和实践的双重导向作用。也只有这样,马克思

① 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254页。

② 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257页。

③ 参见严金强、夏碧英:《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视域下的生态文明新理念研究》,《理论探讨》2020年第4期。

④ 参见刘同舫:《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的辨与思》,《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主义生态哲学才能真正融入人类历史的长河并不断从中获得滋养，进而永葆其青春活力和蓬勃旺盛的生命力。

（三）坚持中国立场与国际视野的有机统一

新的历史时期，要继续增强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生命力，还要坚持中国立场与国际视野的有机统一。进入 21 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得到空前加强。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各国无视自然法则，对自然界进行了无底线的索取和掠夺，虽然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成果，但也让环境问题悄然越过国与国之间的传统界限，逐渐扩大为影响世界的全球性问题。面对气候变化、臭氧层空洞、生物多样性丧失等一系列生态困境，任何国家都无法置身事外。要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必须树立国际视野，加强各国间的交流合作，站在全球化的高度上共谋全球生态治理。同时，马克思主义本身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人民立场，决定了我们要想在新时代继续增强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就必须坚持走中国道路、站稳中国立场、强化中国意识，把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作为发展的基础。坚持中国立场与国际视野的统一，不仅要中国的视野看世界，还要以世界的视野看中国。一方面，我们要创建中国语境，提供中国方案。在分析和探索中国道路的过程中，既要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运用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践当中，从实践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又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持续推动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在当代中国的深化和发展。另一方面，人类历史的发展具有全球化和国际化的趋势。在此背景下，任何学说要想发挥自己的历史作用，就必须顺应这一潮流。为此，我们要树立国际视野，不断扩大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引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与实践，通过采取有效的措施和行动建立全球生态环境新秩序，进而不断壮大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在当代的生命力和国际影响力。

在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的今天，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已成为人类克服日益严重的全球生态危机的理论武器，处于全球化境遇中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及其发展具备了全新的时代语境、理论内生空间和外部环境。整个人类的正反经验、理论得失和实践成败都将成为推动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不断发展的重要动力和宝贵资源。

On the Vitality of Marxist Ecological Philosophy

Cong Yiyu

Abstract: Marxist ecological philosophy profoundly analyzes the interdepend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and proposes that human beings should transform and use nature according to the laws of nature, that labor practice is the realistic form of realizing the unity of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and that the harmony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will eventually be realized in a communist society. The scientific nature of its theoretical ideas has pointed out the right direction for solving human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Nowadays, Marxist ecological philosophy is not only not obsolete, but also shows its vitality. Its reality manifests itself in providing ideological and methodological guidance for the correct handl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mphasizing th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of coping with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man and nature, stressing the dynamic counteraction of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providing inspiration for the joint construction of glob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Xi Jinping's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has realized the creativ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ecological philosophy. Continuing to enhance the vitality of Marxist ecological philosophy in the new era requires adherence to the unity of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al concern, and Chinese position and global vision.

Keywords: Marxist Ecological Philosophy; Vitality; Xi Jinping's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责任编辑：鲁法芹]

论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的文化

——基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视角

张 恺*

【摘 要】 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的文化，从人的本质的角度深刻回答了“我是谁”这一终极性的哲学问题。主体性、历史观和实践观是分析文化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的三大维度，文化的主体性回答了文化属谁的问题，这使得文化与人建立了联系；文化的历史观反映了文化的过程性，有过程才会有历史，文化正是在历史过程中生成和发展的；文化的实践观深刻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实践创造了文化，脱离了实践也就不存在文化。从主体性的维度看，文化是人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与动物的差别所在，是人的自由本性的体现。从历史观的维度看，必然性只能导致重复，但历史不是简单的重复性活动，自由才可以创造奇迹，人正是在文化活动中创造奇迹并走向未来的。从实践观的维度看，文化与实践具有同一性，超越性、创造性和生成性是文化的显著特征。文化的主体性、历史观、实践观统一于文化的生成性，人的存在是一个生成性的过程，文化也是属人的生成性活动，因而文化成为人的存在方式，人成为文化的存在。

【关键词】 人；存在方式；文化；自由；实践

人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存在，是哲学史上长期讨论的命题。把文化作为人的存在方式，来源于深厚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① 这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立足于实践的观点、唯物辩证法的逻辑

* 张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2页。

方法和人的解放的价值目标,从主体性、历史性、实践性三大维度深刻回答了“人的存在方式”这一命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①在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看来,文化是属人的活动,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文化的发展过程同样是主体性的生成与展开的过程,文化的内容深刻反映了人的主体性,因此必须从主体性维度探讨文化;人的存在是一个运动的过程而不是静止的片段,历史也是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文化正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创造并走向未来的,文化与历史在过程性上具有一致性;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最鲜明的特征。文化既是实践的过程,又是实践的结果,也正是借助于实践,文化才具有了主体性和历史性。

一、文化的主体性维度:文化是人的自由自觉活动

围绕“我是谁”这一终极性的问题,古往今来有很多哲学家进行了讨论。马克思把人的本质理解为自由自觉的活动,文化正是这种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示。文化是属人的,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②只有从主体性维度才能真正探究文化与人的本质力量的关系,真正使文化与人建立联系,进而探讨文化是人的存在方式。从主体性的维度看,人正是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实现自身、创造自身、完善自身,因而人是一种文化的存在,文化正是对“我是谁”这一终极性问题的回答。

(一) 自由与必然:文化属人性质的逻辑起点

自由与必然的关系是马克思回答人的本质问题的逻辑起点,他认为:“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③在马克思看来,人是以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方式而存在的,人人生而向往自由,人的发展正是挣脱必然性的束缚而进入到自由状态的过程。自由意味着利用必然和突破必然,因此人只有摆脱了必然性对人自身的盲目控制,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文化正是这样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文化是属人的,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发挥与彰显。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了“自由王国”的理想:“事实上,自由王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页。

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① 自然就是必然，必然就是确定性，确定性不可能有创造，必然只能按照自然规律不断地重复。文化不是在自然中能生长出来的，而是由人创造的，是人的本质的外化表现形式，它只能是一种自由活动而不能是必然性的活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是文化的存在，文化是人的存在方式。

（二）存在与本质：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文化

马克思认为：“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② 正因为自由是人的类特性，人的活动才能是“存在先于本质”，人才能够突破本质对自身的限制，按照自身意愿改造和利用外部世界，可以自由支配；而动物的活动是“本质先于存在”，动物只能在自身本质限定范围内生存，无法突破自身本质的限制，受必然性支配。因此，只有人能够创造出文化，而动物不能创造出文化，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文化，文化只能是人的存在方式。

马克思指出：“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或者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③ 按照马克思的理解，文化对于动物来说不可能是它的生命活动，因为文化无益于动物的生存。但文化对于人来说则是一种生命活动，文化是人意识的对象，是属于意识的内容，是人的生命活动的一部分。

文化不仅是人的生命活动，更在塑造人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从代际角度来说，正是因为后代的新人孕育是在先人创造的文化环境中，才培养出了与先人一致的“文化基因”，具有了相似的文化特质，并在创造新文化的过程中再为后人确立新的基础。从群体的角度来说，相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往往具有类似的文化精神，而不同的群体因创造了不同的文化而不同；但动物就不具有这种差异，动物在同一类群中不会有任何差别，因为它们受共同的必然性所制约。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8～92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2页。

（三）文化与理性：对极端理性主义的主体性反思

近代以来，西方启蒙思想家们高扬理性的旗帜，通过不断的思想解放运动，将人从宗教的桎梏与蒙昧中解放出来，重新奠定了西方哲学思想史上的理性主义传统。不可否认的是，理性主义在促进人的主体性发展历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我们也应看到极端的理性使人陷入了新的蒙昧即理性主义的蒙昧。这种蒙昧的主要来源就是西方哲学传统中的主客二元对立思想方式，认为一切都可以精确化、数量化、控制化。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就体现出这一特征，科学正呈现出精准化、量化的趋势。由于科技进步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人们崇信“科技至上”，普遍依赖工具和技术。但是科技发展同样带来了新的问题：一方面人们越来越依赖工具和技术，科技正在成为控制人的新力量；另一方面人类能够毁灭自身的能力越来越强。

早在20世纪，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就注意到了这些问题，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法兰克福学派提出的“启蒙辩证法”。他们对启蒙理性进行了批判，认为启蒙的目的应当是增强人的本质力量，建立起人对自然的无限统治，但事实却是人对自然的统治造成了人对自然的破坏，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异化。“人类进行毁灭的能力是如此之大，如果这种毁灭力实现了，整个地球就会成为一片空地。或者人类自身互相吞尽，或者人类食尽地球上全部动物和植物，如果地球符合一种著名的论断还有足够的生命力的话，万物就会从最低级的阶段重新开始。”^①

我们通过对理性进行反思就会发现，绝对理性造成了“文化的空场”。人一旦失去了对价值的追问，失去了文化的滋养，就会丧失本质和陷入迷茫。正如胡塞尔所说：“实证科学正是在原则上排斥了一个在我们的不幸的时代中，人面对命运攸关的根本变革所必须立即作出回答的问题：探问整个人生有无意义。”^②胡塞尔在这里就将科学的危机归结为了文化的危机，于是他提出回归生活世界的观点，而生活的世界就是文化的世界。这也正说明人离不开文化，文化正是人的存在方式。

二、文化的历史观维度：文化在历史中传承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

^① [德] 马克斯·霍克海默、[德] 特奥多·威·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片断》，洪佩郁、蔺月峰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213～214页。

^② [德] 埃德蒙德·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张庆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6页。

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①文化和历史都是生成性的连续过程,人在创造中生成了历史,又在不断超越中创造奇迹走向未来。文化在历史中传承,在历史中创造,从历史观的维度审视文化,才能完整把握文化发展的生成性过程,避免对文化进行孤立、片面的理解。马克思用辩证法揭示了历史的实质,他指出:“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②马克思把历史理解为不断生生灭灭的运动,因此只有具有创造性的东西才能在历史中留存。文化之所以能够在历史中传承,就在于文化是人的存在方式,具有自由创造性。

(一) 文化在创造历史中具有重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③文化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精神动力,文化作为意识的内容,反映着人们的社会关系,是社会精神生产的重要部分,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在现实性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种社会关系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的,并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构成历史发展的因素。“人们之间一开始就有一种物质的联系。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它不需要用任何政治的或宗教的呓语特意把人们维系在一起。”^④文化正是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方式,起着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人与人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社会关系,也就形成了特定的文化。人正是在创造文化的同时实现生产,也就是创造历史。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将“意识”也归结为创造历史的因素,他们指出:“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⑤文化作为人的意识的对象和内容,必然成为创造历史的贡献者。马克思在这部著作的手稿边注中还明确指出:“人们之所以有历史,是因为他们必须生产自己的生命,而且必须

①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民日报》2023年6月3日。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

③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3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4页。

用一定的方式来进行。”^①这种方式就是文化的方式。文化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在人的本能之外创造了人的生命，人生命的价值意义是在文化中体现出来的，所以文化对于历史的生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此外，历史的生成也包含精神生产的部分。马克思认为：“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例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②文化作为一种精神生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会表现为不同的形式，每一时代随着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不断发展，历史也就会不断推向前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所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③

（二）历史中传承的只能是文化

文化自产生以来就绵延不绝、源远流长。正如《道德经》所言：“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人类正是在有限的生命中将自身对无限的追求寄托在文化中才获得了永恒，许许多多的历史人物正是在文化中才得以流传千古、经久不息。器物性的存在历史中不可能长期留存和不变。依据现代化学知识我们可以得知，任何器物都是由分子和原子构成，而分子和原子是处在不断运动之中的，这就导致所有器物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出现或氧化或腐化或者其他的变化，只是维持固有状态的时间长短不同罢了。此外，外力因素例如自然灾害、人为破坏等情况，也使得器物无法长期留存。历代皇宫可能是传统封建社会历史中建筑技艺最高、质量最好的建筑，但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皇宫距今也不过六百年，六百年与我们五千年的历史比起来只是一个阶段。当然，我们在博物馆里可以见到有着长达千年历史的文物，但是文物之所以能够较长时间留存，原因在于其已经成为表现文化的载体，其文化价值替代了使用价值，因成为文化的一部分才得以留存。

人也不可能永远活在历史中。没有一个人是可以永生的，人的生理结构及人生存的外部环境决定了人不可能永远活着。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年代，人能否解决温饱而生存下去都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叠加医疗卫生条件的落后，疾病又大大缩减了人的寿命，如果再遇上天灾战乱，更是朝不保夕。历史上有很多养尊处优、丰衣足食的帝王想要寻找“长生不老术”，但事实也证明这只是诱人的谎言。但人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人能明确作为个体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作为类的人的生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46页。

③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2～23页。

命可以是无限的。文化作为人意识的对象和内容，因不具有特定的载体而得以无限。人类将自身对无限的追求寄托在文化之中，文化又通过一代代的生命而传承下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人是在文化中彰显了生命的意义，人因文化而在历史中永恒。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 5000 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①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几千年生生不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华文化从未中断。从道家理想的“天人合一”境界到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从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到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家国情怀，从“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到“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崇高信念，中华文化始终在中华历史中传承，始终是不断塑造民族品格和激励民族前进的巨大动力。

三、文化的实践观维度：文化的超越性、创造性与生成性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首要理论基础。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② 马克思把实践理解为感性的人的活动，而文化作为人的活动，同样是一种感性的人的活动，在实践中超越、创造和生成。实践是一个过程，文化同样是一个过程，脱离了实践，文化也就失去了创造力和生机。只有从实践观的维度，我们才能把握文化超越、创造与生成的特征。我们从实践维度对文化进行分析会发现，文化与实践有着同一性，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的实践活动，既丰富着人的主观世界，同时又深刻影响和塑造着外部世界。实践视域下的文化具有超越性、创造性和生成性的特征。

（一）文化的超越性

马克思认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③ 马克思在这里批判旧唯物主义的同时，也揭示了西方哲学史上主客二元对立的传统，这种传统是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但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外文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36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01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99 页。

世间的事物是无法简单划分为主客两大阵营的。

文化就是如此。文化既不完全是主观的,其产生需要人的感性活动,人的感性活动也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为基础;文化也不全是客观的,更不是一种客观实在,其内容大多还是意识层面的。文化实际上是一种超越主客二元对立的存在,既能在主观意识中反映客观存在,并在意识中对客观存在进行自由地想象与加工,又能够依据客观存在的变化而丰富主观意识,不断创造新的文化内容,因而文化体现出一种超越性,能够实现主客观的二元统一。文化的超越性特征与人有着密切关系。人是自然界中唯一具有超越性的存在,而文化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就会有鲜明的超越性特征。人之所以能够超越,就在于人是有意识的,人有意识才能突破本质的限制,超越的本质就是不断突破自然规律对人的必然的限制。人正是因为有意识,才能在理念中创造出超越现状的目标,并在现实中通过实践为之努力,而这种理念中的目标往往呈现为一种文化的存在。人正是在不断超越中创造奇迹、走向未来。

(二) 文化的创造性

实践的价值在于创造,通过实践才能使观念中的事物变为现实。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实践活动正是人们改变和创造外部世界的活动,创造性是实践活动的鲜明特征。文化与实践是同一的,文化也具备着创造性。马克思在实践的基础上将人理解为类存在物,“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做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做类存在物”^②。“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③人的类本质外在表现为自由而有意识的活动,即创造性的活动,正是因为具有这种独特的活动,人才能在自然的基础上改造自然、创造新的外部世界。文化作为人的存在方式,是人的类本质的外在表现形式之一,因而也具备创造性的特征。文化作为人的意识的内容,只有通过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才能呈现为现实,但人的实践活动不是出于本能进行的,而是受到一定的文化影响,文化的创造性正是在实践活动中体现出来的。

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创造。人的生存离不开自然,但人在自然中又是处于弱勢的。人类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靠的是一种不断创造的内在动力,可以说追求创新创造是人的本性之一。人在克服自然缺陷的同时推动了文化的产生,文化是人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3页。

创造的结果，而不是自然的产物。文化是创造的尺度，人在创造外部世界的时候总要遵循一定的尺度。马克思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① 因为人有意识，所以人在创造外部世界之前就先把外部世界在思维中构造出来了，这种有意识的构造往往会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人类在创造外部世界的过程中通常会求美，但是不同文化对美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人们就会按照自己对美的理解来创造，从而使文化成为一种创造的尺度。

（三）文化的生成性

文化是在人的后天活动中生成的，而不是先验预成的，没有一种文化是按照既定的模板制作出来的，文化绝不是复制和重复。文化的内容和样态也不会一成不变，文化始终处于动态发展之中，是一个无限的过程。文化的生成性特征就体现为文化是作为过程而存在的，这种过程性正是在实践基础之上建立的。

文化的生成是一个连续性的、一脉相承的过程，没有先前的文化作为基础，就没有后续新的文化创造。古希腊文明和古希伯来文明是西方文明的两大来源，正是因为传承了古希腊文明，欧洲社会才会产生高度弘扬理性精神的现代科学；正是因为传承了古希伯来文明，欧洲社会才会产生基督教等宗教，才会在对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反思基础上发生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中华文化同样如此。中华文化是一个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文化形态，儒家思想也正是在一代代的传承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自孔子建立以“仁”为核心的儒家哲学思想后，孟子将这一思想推广到政治领域，主张“仁政”；荀子在儒家“性善”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性恶”观点，建立了“性善”与“性恶”之辨；西汉董仲舒强调“三纲五常”，终于使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宋代朱熹的“理学”和明代王阳明的“心学”深入汲取了先前儒学的伦理理念，充分吸收佛道两家的理论，终于将儒家思想推上了最高峰，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官方哲学。

文化能够成为一个无限的过程，是离不开人的。人类可以一代代传承，文化是属人的活动，每一代人都会有一定的文化继承和文化创造，文化就得以创新和进步。文化的内容能够在过程中不断生成，不同的实践条件会生成不同的文化形式。比如，艺术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内容和载体几乎伴随着人类文明历史的全过程，其早期形式主要是美术、音乐、舞蹈、文学等，而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则又出现了戏剧、电影电视等新的艺术形式，也为文化增添了新的内涵。人的延续的无限性、实践运动的无限性和文化发展的无限性是三者统一的，只有建立在这三者统一的基础之上，文化才能成为生成的过程，成为人的存在方式。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3页。

四、结语

文化的主体性、历史观、实践观三大维度，归根到底统一于文化的生成性。人的存在是一个生成性的过程，文化也是属人的生成性活动，因而文化成为人的存在方式，人成为文化的存在。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①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途径。以文化哲学的视野概观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就会发现我们需要依据高度的文化自觉、鲜活的生命实践、纵深的历史视野进行文化创造，自觉回应当代中国问题，这本身也将是历史在自由与必然之间呈现出的生成过程与存在方式。深刻探讨“文化作为人的存在方式”这一哲学命题，从主体性、历史观、实践观三大维度理解和把握文化的本质，有助于我们更好把握文化与人的关系，更好把握文化的社会历史意义，从而助力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开创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On Culture as the Way of Human Existenc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Cultural View

Zhang Kai

Abstract: As the way of human existence, culture answers the ultimate philosophical question “who am 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essence. Subjectivity, the view of history and the view of practice are the three dimensions to analyze culture as the way of human existence. The subjectivity of culture answers the question of who culture belongs to, which mak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e and human beings established. The view of history of culture reflects the process of culture, and it is in the process of history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42～43页。

that culture is generated and developed. The view of practice of culture profoundly reflects the world outlook and methodology of Marxism. Practice creates culture, and without practice, there will be no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bjectivity, culture is the free and conscious activity of human being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animals, and the embodiment of the nature of human freedo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view of history, inevitability can only lead to repetition, but history is not a simple repetitive activity, freedom can create miracles, and people create miracles in cultural activities and move towards the fu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view of practice, culture and practice have identity, and transcendence, creativity and generation are the remarkable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e. Subjectivity, the view of history and the view of practice of culture are unified in the generation of culture. Human existence is a generative process, and culture is also a generative activity of human beings, so culture has become the way of human existence and human being has become the existence of culture.

Keywords: Human Beings; Way of Existence; Culture; Freedom; Practice

[责任编辑: 于少青]

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弦乐四重奏”^{*}

姜逸^{**}

【摘要】恩格斯对自己“第二小提琴”的定位启发我们找寻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的“弦乐四重奏”。恩格斯所发挥的“第二小提琴”作用，使马克思所担任的“第一小提琴”主题旋律的表达方式更为丰富和饱满。琳蘅既是一名拥有坚定信仰的马克思主义者，又是马克思一家人琐事的操劳者，同时还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支持者。她的地位和角色可以用“中提琴”的音乐形象来诠释。燕妮对马克思忠贞不渝的爱情，对革命理想矢志不渝的追求，对革命事业不遗余力的支持和对共产主义坚定不移的信仰，使她扮演了弦乐四重奏中“大提琴”的角色。

【关键词】弦乐四重奏；马克思；恩格斯；燕妮；琳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是顶天立地的伟人，也是有血有肉的常人。他热爱生活，真诚朴实，重情重义。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友谊长达40年……马克思和妻子燕妮患难与共，谱写了理想和爱情的命运交响曲。”^①恩格斯曾多次以“第二小提琴手”来定位他在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受这一比喻的启发，笔者联想到古典主义时期海顿风格的“弦乐四重奏”之喻。“弦乐四重奏”中，第一小提琴是一位富有智慧的健谈者，也是话题的提出者，他总是游刃有余地维持、引导着整个对话。第二小提琴是第一小提琴的朋友，他竭尽全力设法突出第一小提琴的才智，为此而常常抑制着自己，很少表达。中提琴是一位善良且饶舌的女人，经常插嘴却丝毫讲不出任何重要意见，然而她贯穿始终的存在却无形中给对话增添了温暖。大提琴学识渊博，常用简单而中肯的论断支持第一小提琴的观点。^②马克思主义形成与发展的进程，是否也可以大致视为一种“弦乐四重奏”呢？笔者尝试进行梳理，以期丰富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的理解角度。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新时代‘大思政课’建设研究”（21VSZ035）阶段性成果。

^{**} 姜逸，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①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5～6页。

^② 参见钱仁康编著：《欧洲音乐简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18页。

一、“第二小提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马克思主义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恩格斯不论在理论方面还是生活方面，都为马克思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尽管如此，他却从未想过在马克思主义中为自己署名，而是用“第二小提琴”来形容自己。恩格斯这一比喻在突出马克思地位并表达对马克思尊重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自己理论的地位作出了评价。

（一）旋律的衔接发展：在马克思对经济问题的早期研究中，恩格斯有关政治经济学的论著起到了启发性的关键作用

对于音乐作品而言，作品的转调常常代表着作品的情感升华。第二小提琴作为旋律的衔接发展，旨在通过临时变音记号将第一小提琴的旋律引入新的调性。通过此类结构织体的循环往复，第一小提琴旋律声部的情感在转调的推动作用下不断发展。在马克思对经济问题的早期研究中，恩格斯颇具启发性的观点引导着马克思的研究转入了更为开阔的视野，并将理论上升至全新的高度。马克思和恩格斯相互交流各自从哲学和经济学角度得出的结论，为他们密切合作的革命事业建立了互补性优势，也为他们理论研究的融合与升华提供了可能。

少年时期的马克思深受家庭影响，在法律和哲学方面受到了良好教育。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坚守少年时期的理想，特别是在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受到的专业教育，使其思想在哲学领域得到较大发展。此时的马克思在遇到“物质利益的难事”时，还没有认识到物质利益是思想本身的前提和基础。他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对国家和法的观念进行辩论的思想武器依然是运用抽象的理论来批判现实，试图立足于自己的哲学立场进行突破。“这种特点本质上也是德国观念论固有的缺陷，即普遍轻视社会经济问题。”^①相比较而言，恩格斯在经济问题的研究中具备马克思所欠缺的优势条件。恩格斯的出身让他“有很多机会来观察你们的敌人——资产阶级”^②，他的妻子玛丽·白恩士作为拥有阶级与民族双重仇恨的工人阶级的一员，使恩格斯能够在研究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过程中知己知彼。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等著作中，恩格斯已经率先开展了领先于包括马克思在内的所有同时代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些立足于经验实证性质而非抽象哲学批判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使马克思惊叹于恩格斯极富创见的批判路径，认为他们是志同道合的战友，“同恩格斯的交往显然促使马克思下决心去研

^① 黄学胜：《在差异中共进：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关系——基于〈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比较》，《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2页。

究政治经济学”^①。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称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②，这一评价足见马克思对恩格斯的认可与欣赏。

（二）旋律的平行声部：在马克思对经济问题的后期研究中，恩格斯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阐释与完善方面作出了极大贡献

对于音乐作品而言，声部的交织与叠加建构了极具丰富性和完整性的听觉效果。第二小提琴作为旋律的平行声部，旨在与第一小提琴构成平行进行的双音程旋律，通过双声部的共振与融合，实现音响效果的充实与丰盈。恩格斯的阐释与完善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得以更完美地呈现，宛如音乐作品中更为充实饱满的音响展现。马克思创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仿佛音乐作品中的主题旋律，在恩格斯的阐释与完善下，他们共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充实与饱满，将其发展成为震撼时代的不朽经典。

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中止了《自然辩证法》的写作，担负起《资本论》的编译、修订等收尾工作。他完善了《资本论》的结构体系，促进了《资本论》的广泛传播。他先后编订并监督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四版以及英文版，并根据马克思生前的手稿，整理出版了《资本论》的第二卷和第三卷。在《资本论》的整理过程中，恩格斯为第一卷“补加了一些说明性的注释”^③；为第二卷增添了部分用于解释说明和承上启下的语句，进行了37处共1500多字的文字增补，在保持马克思原意的基础上完成了对《资本论》第二卷的完善与再创作。相比之下，恩格斯对《资本论》第三卷的增补更具有建设性。马克思生前只为《资本论》第三卷留下了极不完整的初稿，甚至部分章节只有标题，没有具体内容。除此以外，还散落着大量未经整理的笔记、摘录和述评。恩格斯遵循马克思的逻辑思路，并依据后者留下的片段性文稿，对《资本论》第三卷进行了80多处共36000多字的文字增补^④，使《资本论》这部宏大的巨著得以最终完成。在整理和编辑《资本论》的过程中，恩格斯依据新的时代情况进行了翔实材料补充和解释说明，使《资本论》更为充实和完善。“恩格斯出版《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就是替他的天才朋友建立了一座庄严宏伟的纪念碑，无意中也把自己的名字不可磨灭地铭刻在上面了。”^⑤在《资本论》的宣传方面，恩格斯通过撰写书评和通俗小册子等方式，鼓励工人阶级了解《资本论》，并公

①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

④ 参见张雷声：《恩格斯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贡献》，《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⑤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页。

开批判资产阶级针对《资本论》的错误言论，在普及、捍卫《资本论》的过程中传播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三）旋律的对话交流：在马克思对哲学问题的研究中，恩格斯有关哲学的论著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音乐作品而言，声部间的沟通交流使其更为富于情感和灵动。第二小提琴作为旋律的对话交流，旨在由第二小提琴扮演“主角”，在作品的部分片段中旋律声部由第二小提琴演奏。旋律声部在第一小提琴与第二小提琴之间纵向交错，二者密切配合，共同演绎出连贯、流畅的横向旋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研究的过程中，不论合作撰写还是独立完成，其作品中均同时渗透着二者的理论观点。他们在哲学领域的论著共同构成了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宛如音乐作品中声部间的对话。

1.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篇章内部实现横向旋律的共同演绎

虽然恩格斯早期的研究是以政治经济学为切入点，但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的诸多重点篇章都少不了恩格斯的身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清算了以往思想，阐明了新思想，解决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成立后工人阶级缺乏正确理论指导的问题，“向许许多多非常愿意干但只靠自己又干不好的一知半解的人提供必要的依据”^①，其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占据着极为重要的理论地位。其一，与整个德国哲学思想体系的旧哲学彻底划清界限。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意识形态内部斗争中局限于用词句反对词句、不触及社会现实的错误倾向，强调了哲学与现实之间的联系。其二，将科学的实践观引入哲学体系，实现了哲学的变革。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实践的观点出发，揭示了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所共有的缺点，即离开实践的视角来观察和思考问题。

2.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整体实现横向旋律的共同演绎

恩格斯独立完成的部分重点篇章丰富、完善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诸多领域的实践与应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自然辩证法》。其一，哲学的变革不能仅仅依靠哲学层面的思辨，也需要科学的进步提供实证材料。《自然辩证法》充实并完善了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理论内容。其二，为自然科学的研究奠定了辩证的思维基础，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自然辩证法》完成以前，自然科学领域的许多科学家缺乏辩证思维，限制了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恩格斯指出，自然科学领域往往非常明显地显露出对哲学知识的匮乏，诸多哲学领域几百年前就已经提出并早已抛弃的一些命题，在自然科学领域却常常作为崭新的知识出现，甚至在一段时间内成为时髦。其三，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发展厉兵秣马。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进一步揭示了当时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页。

资产阶级运用科学技术剥削无产阶级的手段，总结概括了从古代到近代再到现代的自然科学发展历程，以科学知识完善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为无产阶级革命积蓄力量做了思想上的准备。其四，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为建设生态文明、保护生态环境提供了理论依据。恩格斯在人与自然高度统一性、人受动于自然的基础上，着重从长远角度探讨自然对人类活动的制约作用，指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习常过程的干预所造成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①，强化了人与自然高度统一的哲学观。

（四）旋律的和声填充：在马克思清贫的一生中，恩格斯的资助是马克思主义得以形成和发展的有力保障

对于音乐作品而言，和声进行直接影响作品情感走向。由第一小提琴演奏旋律声部时，第二小提琴时常与中提琴、大提琴共同构成功能和声。恩格斯的资助为马克思清贫的生活提供了基本的保障，对马克思能否继续研究工作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宛如音乐作品中和声对旋律的支持。

19世纪五六十年代是马克思一家经济最为困难的时期。恩格斯为了革命事业和人生理想，也为了使马克思在写作过程中能够获得最起码的生存条件，他选择把这项他们共同热爱的研究工作交给马克思，自己则回到曼彻斯特继续从事商业工作。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恩格斯夜以继日地工作，白天忙于生意，晚上和周末从事政治研究和革命活动。当商业工作占用从事研究和革命工作的时间时，他便会倍感烦躁：“真见鬼，大量的工作和商务简直弄得我头昏脑涨……而最令人讨厌的是，今后一段时间内，我必须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放在这该死的生意上。”^②恩格斯这样忍辱负重的选择，确保了马克思的研究工作得以继续，也为他们的革命事业赚取了必要的生存土壤。

《资本论》第一卷完成后，马克思对于恩格斯多年来的牺牲以及给予自己的帮助深感愧疚。他在通信中写道：“没有你，我永远不能完成这部著作。坦白地向你说，我的良心经常像被梦魇压着一样感到沉重，因为你主要是为了我才把你的卓越才能浪费在经商上面，使之荒废，而且还要分担我的一切琐碎的苦恼。”^③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姓名“在德国长时期联在一起，他们的名字将永远一起记载在史册上。马克思与恩格斯在我们的时代里实现了古代诗人所描绘的那种理想的友谊。他们年轻时就在一起，并平行地发展起来，互相最真挚地倾吐了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参加了同一革命运动，只要可能便在一起并肩工作”^④。在这项他们共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9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4～4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6页。

④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回忆马克思恩格斯》，胡尧之等译，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2页。

同铸就的伟大事业中，恩格斯功不可没。

（五）主题的串联融合：在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之间，恩格斯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及其内在联系

对于音乐作品而言，丰富的“主导动机”分别代表着不同的主题情感，它们贯穿全曲，既彼此独立又相互联系和交织，预示、推动着作品的前进。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三大“主导动机”，在马恩著作中各自拥有占据主导地位的重点篇章，这些阐述不同领域的篇章在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交替出现，共同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它们在各自的领域中自成体系，同时又是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有机整体。恩格斯从整体的角度阐释马克思主义，宛如音乐作品中主题的串联融合。

主要由恩格斯撰写的《反杜林论》，是第一部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之间内在联系的著作。恩格斯在文中指出，由于“本书所批判的杜林先生的‘体系’涉及非常广泛的理论领域，这使我不能不跟着他到处跑，并以自己的见解去反驳他的见解”^①，使该书成为一部内容极其驳杂的著作，同时完成了“消极的批判成了积极的批判；论战转变成对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②这一任务。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首次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了系统论述，使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作为完整的体系呈现在世人面前，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恩格斯在回顾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做贡献的问题上，认为自己扮演了“第二小提琴”的角色。诚然，第二小提琴虽不如第一小提琴那样夺目，但同样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音乐作品中，第一小提琴与第二小提琴之间常常通过“对话”、“衬托”或“角色互换”等方式相互呼应，才能共同演奏出富于情感和灵动的音响效果。不论是恩格斯的某些启发性观点对于马克思思想的促进作用，还是马恩著作中由恩格斯所撰写并完善重要篇章，抑或是恩格斯对马克思经济上的支持，都同第二小提琴与第一小提琴的合作关系极为相似。恩格斯与马克思之间的互补宛如声部间的共振与交融，这使他们的合作焕发出艺术一般的独特魅力。

二、“中提琴”——海伦·德穆特（琳蕙）

中提琴在弦乐四重奏中主要承担着旋律的和声填充角色。一般来说，中提琴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8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83页。

的声部既不是旋律担当,也不是和声基础,却能够为作品整体增添更多的情感色彩。中提琴的节奏与织体富于变化,能够根据作品情感需求的变化胜任不同的角色。琳蕙既是一名拥有坚定信仰的马克思主义者,又是家庭琐事的操劳者,她还是革命事业的支持者。她随场景的变换承担着多重角色,其人物形象与“弦乐四重奏”中的中提琴音乐形象极为相似。

中提琴的和声填充与其他声部既有共性也独具特性,大致可分为共同构成的“柱式和弦”与“分解和弦”两种形式。其一,“柱式和弦”旨在同时演奏和弦内部的所有音符,音响效果节奏鲜明、坚定有力。这非常符合琳蕙作为拥有坚定信仰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体现了她坚定的政治立场、淡泊的金钱观念和忘我的牺牲精神。首先,琳蕙在马克思一家流亡巴黎的日子里义无反顾地来到他们身边,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她一生中跟随马克思夫妇辗转流亡于欧洲各国,分担着他们的艰辛,受尽颠沛流离之苦却从无怨言。琳蕙虽然不曾饱读诗书,却头脑聪慧,她的内心非常敬仰马克思一家所从事的革命事业。琳蕙的政治立场十分坚定,她乐于助人、性格温和,唯独对马克思的敌人咬牙切齿,甚至发怒。其次,每到马克思一家经济困难时,琳蕙都会主动放弃自己的工资,缓解马克思和燕妮的经济压力。“到了月底,马克思不得不拖欠佣人琳蕙·德穆特的工资……可她却连连说:‘我们不谈这件事,不谈这件事,我现在不需要钱用,你用不着介意。’”^①最后,琳蕙对马克思一家真挚的革命情感让她以忘我的牺牲精神放弃了成立自己的家庭。由于善良的性格和动人的外表,琳蕙在年轻时曾不乏追求者。威廉·李卜克内西曾回忆道:“我第一次看到琳蕙的时候,她二十七岁。虽然不是美人,但她修长匀称的身材和惹人喜欢的面孔显得十分动人。倾慕他的男子并不是没有,而且不止一次有缔结美满姻缘的机会。虽然她不曾立过任何誓约,但她那忠诚的心却很明白:她应该同摩尔、马克思夫人和孩子们留在一起……直到最后她都是忘我的。”^②

其二,“分解和弦”旨在分散演奏和弦音符。中提琴声部中,节奏急促的单音重复或和弦音交替是常用的形式,映射着琳蕙为家庭琐事的操劳。在清贫的生活里,琳蕙总是能够巧妙地处理好日常生活中各种使人烦恼的琐事,她讲求实际、处处节约,在琳蕙照管的家里从未缺少过必要的物品。除此以外,琳蕙还是一位料理家务的能手。“琳蕙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全家的轴心,一切都围绕着她转动。”^③马克思或燕妮生病时,琳蕙总是彻夜不眠、悉心照料,对孩子们更是有着母亲般的关怀。燕妮曾在外出时写信给马克思,说:“没有琳蕙,我在这里会

① 罗范懿编著:《马克思传记故事》,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2页。

②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回忆马克思恩格斯》,胡尧之等译,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4~145页。

③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回忆马克思恩格斯》,胡尧之等译,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0页。

坐卧不宁的。她眼下太不容易了——我多么怀念我们小的时候!”^①

琳蕻虽然与马克思和燕妮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却是他们名副其实的亲人。在革命的道路上，她以坚定的政治立场、淡薄的金钱观念和忘我的牺牲精神给了马克思与燕妮极大的支持和关怀，在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作出了巨大贡献，不论在革命事业还是革命情感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三、“大提琴”——燕妮·冯·威斯特华伦

大提琴在弦乐四重奏中主要承担着旋律的和声填充、旋律的附和追随、旋律的加花装饰等多种角色。大提琴深沉、稳重的支撑赋予了旋律畅所欲言的潇洒，多样化的表达又起到了辅助旋律表达的作用。相比之下，大提琴的节奏与织体更为稳定，这种稳定与燕妮对马克思忠贞不渝的爱情、对革命理想矢志不渝的追求和对共产主义坚定不移的信仰颇为相似。

（一）旋律的和声填充：革命事业的坚实后盾

对音乐作品而言，低音承担着深沉、稳重的角色。大提琴的演奏作为纵向和声中的最低音，具有稳定情感、支撑旋律、平衡整体的作用。正如宏伟的建筑需要深厚的地基，伟大的事业需要坚实的后盾。燕妮曾说过：“痛苦可以锻炼一个人，而爱则给我们以支持!”^② 在马克思的一生中，不论遇到怎样的困境，燕妮在精神、思想和经济等各个方面的支持都从未缺席。她毫无疑问是马克思革命生涯中最为坚实的后盾。

1. 精神支持

自燕妮与马克思订婚开始，家人的反对、政府的压迫、经济的窘迫、屡次被驱逐等遭遇，便开始考验着这对饱经磨难的恋人。然而燕妮自始至终不顾家人反对，非马克思不嫁；不顾政府压迫，坚决支持马克思的政治立场；不顾经济窘迫，生活清贫却乐在其中；不顾屡次遭遇驱逐，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革命意志。燕妮已完全融入马克思所从事的革命事业中，在她的激励下，马克思始终没有因为任何理由而停下他的研究工作。他非常欣赏妻子的美丽、温柔、智慧和热忱，这是马克思作为一名社会主义革命者在饱经风霜的生活中得到的莫大安慰。

燕妮出生于易北省萨尔茨维德尔的一个贵族家庭。祖父曾任高级军官，以卓著的军功被封为贵族；父亲世袭男爵，曾任州长；母亲出身于名门望族，与父亲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86～487页。

^②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回忆马克思恩格斯》，胡尧之等译，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76页。

的结合可谓门当户对。在思想支持方面,燕妮与恩格斯颇具几分相似。恩格斯的出身让他有很多机会来观察资产阶级,而燕妮同样对自己的出身——资产阶级具有深刻的认识和见解。这在马克思的理论研究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2. 经济支持

在革命事业所需的大量经费面前,燕妮常常用家里仅有的积蓄支持革命的宣传工作。巴黎二月革命爆发后,在布鲁塞尔引起巨大反响,燕妮又动用了从父亲遗产中继承的大笔款项,为工人们配发武器装备,支持他们的示威游行。流亡伦敦后,马克思和燕妮迅速投入到救助流亡者的工作中,只要有一点点财力,他们就会向困难的流亡者慷慨相助。此外,马克思决定趁着革命热情“养精蓄锐”,进一步巩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辞去工作以专注于理论研究时,燕妮依然一如既往地支持着马克思的决定。燕妮的母亲去世后,燕妮分得的遗产一度让他们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观。然而好景不长,马克思起诉《国民报》需要一大笔支出,同时,他为了撰写《福格特先生》而再度放弃工作,使他们再一次失去了经济来源。然而面对一次次贫困的深渊,燕妮的坚定始终未曾改变。

(二) 旋律的应声附和:革命事业的“秘书”工作

对于音乐作品而言,轮奏旨在由两位或两位以上演奏者交替演奏相同旋律,连绵起伏、前呼后应。在革命事业的角度上,燕妮一定程度上是革命参与者的代表。每当马克思产生新的观点、撰写新的著作时,燕妮总是紧随其后,并为马克思誊写手稿。她以此起彼伏的“轮奏”方式誊写和阐述着马克思的思想,体现了其对革命事业的支持、追随和拥护。

经过巴黎流亡生活的“实践”洗礼,燕妮已然可以以一名革命者的姿态投身于革命事业,成为马克思的得力助手。在她所承担的诸多工作中,最为成功的就是“秘书”工作。马克思的手稿内容广泛且字迹潦草,但由于燕妮熟悉马克思的学说和思路,又具有丰富的知识,因而她总是能够在极难辨别的手稿中迅速、准确地把握思想的核心。所有马克思发表的稿件,燕妮几乎都看过。马克思撰写《福格特先生》时,燕妮不知疲倦地帮助丈夫誊写书稿;马克思投入《资本论》第一卷的写作后,生活的贫困让他无力再额外聘请一位秘书,燕妮不顾家庭琐事的牵绊,再一次承担起“秘书”的重任。《资本论》第一卷完成后,各国社会主义者和工人阶级不顾政府的压制,将该书传遍各国。燕妮为此感慨万千:“恐怕没有一本书是在比这更困难的条件下写成的,我大概可以就此写一部秘史,它将揭示出很多、多到无限的暗自的操心、忧虑和苦恼。”^①

除此之外,燕妮还承担了校对、撰写通信以及其他许多繁杂的工作。每当马克思阐述新的理论观点时,她也总是积极发表自己的见解。燕妮是一位非常出色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98页。

的“秘书”，保尔·拉法格曾提到，燕妮“有一种明彻而光辉的智慧。她给她朋友们的那些毫不费力信手写出来的信，乃是一个活跃而独创的心灵的真正杰作”^①。

（三）旋律的加花装饰：革命事业的“美育”工作

对于音乐作品而言，装饰音旨在通过插入装饰性音符，起到修饰、美化旋律的作用，突出作品的情感流露，是一种旋律的“修辞手法”。善良、美好的燕妮赢得了工人阶级的喜爱和拥戴，充分发挥文艺的作用，恰如装饰音突出了潜藏在主旋律中的细腻情感。在马克思、恩格斯领导的革命事业中，燕妮通过“美育”教育关怀、影响着参与革命运动的工人阶级，丰富了革命的主旋律，为革命事业提供了细腻情感的表达和宣泄路径。

燕妮早在少年时期就以婀娜曼妙的舞姿引人注目，曾是当地人心目中那个“特里尔最美丽的姑娘”^②和“舞会上的皇后”^③。“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是“对于整个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④在他们婚后的流亡生活里，饱读诗书、多才多艺的燕妮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向工人阶级普及文化知识这项丰富灵魂的“美育”工作，可谓为宣传革命思想承担起了“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⑤的使命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在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同时，也创立了“德意志工人协会”并开展了大量活动，燕妮也参与了协会的工作，在各项活动中为他们提供了很大帮助。她向工人们介绍著名作家的文学作品，还在工人阶级的晚会上朗诵诗歌。关于燕妮在协会举办的一次新年宴会上的朗诵，《德意志—布鲁塞尔报》还刊登过一则简讯：“宴会之后，演出了文艺节目，马克思夫人参加了表演。她在演出中显示了天才的朗诵才能……当你看到杰出的妇女们怎样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工作，从而为别人做出富有教益的榜样时，你会产生一种愉快的印象。”^⑥对于马克思本人，燕妮也曾建议他尝试转变文风：“你写作时不要那样好动肝火、好发脾气。你可知道，你的其他文章所起的作用要大得多。你要写得实际而精炼，或者写得幽默而轻松。”^⑦在这项“美育”工作中，燕妮发挥优势，游刃有余，以深厚的

①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回忆马克思恩格斯》，胡尧之等译，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1页。

② 《回忆马克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4页。

③ 《回忆马克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4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6页。

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12页。

⑥ [苏]波·维诺格拉茨卡娅：《燕妮·马克思》，高宁哲、赵德成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131页。

⑦ [苏]波·维诺格拉茨卡娅：《燕妮·马克思》，高宁哲、赵德成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118页。

文化修养影响着参与革命运动的工人阶级，是一位大有作为的文艺工作者。

对马克思而言，燕妮既是妻子，也是革命伙伴。不论爱情方面还是事业方面，燕妮矢志不渝的支持是马克思面对一切困难时的坚强后盾。燕妮逝世后，赫斯夫人曾写道：“由于她的逝世，自然界毁坏了它自己的杰作，因为我一辈子没有见过这样聪慧而慈爱的女人。”^① 燕妮完美的女性形象与不朽的革命形象成为她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的最高礼赞，她与马克思之间的爱情也成为千古流传的佳话。正如他们的小女儿艾琳娜所言：“不论在幸福的时刻或在困苦的日子里，爱情和友谊始终联系着他们，他们从不知道动摇和疑虑，他们互相忠实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甚至死亡也未能使他们分开。”^②

四、结语

旋律的和声填充是第二小提琴、中提琴和大提琴对第一小提琴共同的支持，也是恩格斯、琳蕻和燕妮共有的角色。同时，他们又各具特点和优势，让马克思领导的革命事业如虎添翼。马克思、恩格斯、燕妮、琳蕻以及所有帮助和陪伴他们的家人和朋友，都为伟大的革命事业付出了能力范围内的全部心血。他们彼此极富默契，使这个“弦乐四重奏”演绎出可与庞大交响乐团媲美的革命华章。在他们中间，每位“演奏家”都竭尽全力在各自的声部上贡献着自己独特的音色，而那个引导他们团结协作的无形的指挥棒，正是他们心中共同的信仰——共产主义。

“String Quartet” in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Jiang Yi

Abstract: Engels' positioning of his “second violin” inspires us to look for the “string quartet” in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The role of Engels as the “second violin” makes the expression of Marx's theme melody as the “first violin” become enrich and plump. Linchen was the laborers of household chores and the supporter of revolution who firmly believe in Marxism. This character image can be interpreted by the musical image of “viola”. Jenny's uncompromising honesty love for Marx, unswerving pursuit of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42页。

②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回忆马克思恩格斯》，胡尧之等译，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92～293页。

revolutionary ideals, sparing no effort to support the revolutionary cause and unswerving belief in communism are very similar to the role of “cello” in the string quartet.

Keywords: String Quartet; Marx; Engels; Jenny; Linchen

[责任编辑：杨鹏]

**“两个结合”
相关研究**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现代化探索及其思想贡献^{*}

路鹏飞^{**}

【摘要】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现代化探索内在地蕴含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历程中，尤其体现在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为知识分子提供了正确对待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方法，即既要避免全盘西化，也要避免对传统文化的机械固守。马克思、列宁强调要在吸收借鉴过去文化基础上开拓创新，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他们的文化观，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科学主张，在实践过程中对西方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改造和转化，不断提升人民文化水平。毛泽东在文化领域的探索与贡献，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结合、提升中国文化思想在世界上的话语影响力提供了重要镜鉴。

【关键词】 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贡献

如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发展到了新的层次和新的阶段，然而先河而后海，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创作用可谓具有先河之义。毛泽东思想最早回答了“何以中国”的议题，这成为 20 世纪一个重要的事件。毛泽东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创新发展，既重塑了我们对过去的理解，又改变着我们对未来的构想。关于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一定进展，包括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思维路径创新，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五四时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国化的理论贡献，以及在妇女解放、军事理论方面的贡献论述等，学界对此

^{*} 本文系湖南省社科评审委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历史发展及其理论创新研究”（XSP2023ZXC015）、湖南省教育厅课题“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高校思政实践研究”（项目编号：21B0122）、湘潭大学第 12 批教改课题“赛博空间审美批判融入美育教学改革研究”阶段性成果。

^{**} 路鹏飞，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哲学。

进行了一些讨论。然而,关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结合方面则研究不足,虽然有学者肯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与建设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获新生^①,但是相关内容仍有待挖掘。

一、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结合的现代化探索

近代历史上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不乏其人,如马一浮、冯友兰等,而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有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但是坚持两者相结合并且能够把两者创新结合、结合好的人则不多。如果说当时很多人是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实际以外来研究中国的发展道路,那么毛泽东则是结合中国本土文化、中国实际情况来探索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欧洲模板、俄国模板中解放出来,体现了毛泽东对理论和现实、抽象和具体、历史和现代的科学结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提出对“解放”的理解:“‘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②这也是毛泽东得以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陈独秀、王明等人更多是从抽象理论和俄国革命的教条主义出发,其积极性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国外情况进行了研究和介绍,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思想和判断标准;缺陷在于他们只是把中国的现实社会看作直观的“感性对象”,而非现实活动,仅仅停留在思想理论领域,没有联系中国实际。

(一)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对当时知识分子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中国当时的有识之士主要是向西方文明学习不同的发展道路。然而西方文明同样存在问题,尤其是其本身的“文明”具有选择性和欺骗性,其“文明”只是针对资产阶级自身的“文明”,甚至在内部也存在严重的分裂与分歧,而对中国和非洲国家等则赤裸裸地体现了其野蛮性。西方国家在对外侵略扩张和殖民的过程中,直接暴露了西方文明的相对性和狭隘性,他们不是以所谓的文明方式来对待殖民地国家人民,而是采用了比奴隶社会更残暴的方式、比封建社会更野蛮的方式。西方国家在其现代化历程中对其他国家进行了赤裸裸的侵略和掠夺,如美国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政策,以及英法等国在非洲进行的黑奴贸易,在亚洲包括中国进行的贩卖华工、鸦片贸易等行为。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的巴黎和会,西方社会不仅暴露了社会制度方面的问题,

^① 参见王锐:《中国共产党继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立场与历史经验探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1年第5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4页。

而且暴露了西方文明的缺陷和不足。面对西方思想文化和野蛮行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尤其十月革命的发生改变了中国人对俄国以及西方文明的态度，马克思主义从当时众多社会思潮中脱颖而出。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给中国人一个批判审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契机，也给中国人一个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方法，既避免了全盘西化，也规避了对传统文化机械化的固守。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提出：“毛泽东的品质是不能撇开历史悠久的中国文明来加以解释的。”^①毛泽东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同时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现代化改造。毛泽东明确了中国实践的主体地位，以中国实际结合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而非机械地照搬马克思主义理论。他正确处理了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际、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在和经验主义、教条主义的斗争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毛泽东在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上，既非全盘否定，也非全盘接受，而是有所扬弃，即他所提出的“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他指出：“看不起中国的东西，不尊重民族文化遗产，这是极端卑鄙恶劣的资产阶级的心理在作怪。”^②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科学态度，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最终提炼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表达了对东西方古今思想的开放和包容。但是他反对盲目崇拜西方文化，尤其对学习西方思想后对中国没有信心的那批人进行了批评，批评他们是做奴隶做久了，在外国人面前直不起腰来。

毛泽东对文化的态度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他在青年时期立下了拯救民族于危难的远大志向，曾经将文化作为改造社会的核心内容，希望通过哲学、伦理学来进行国民改造。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他将社会制度革命作为改造社会的核心，但是同样没有放弃文化改革，始终主张提高农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如1936年他在《致林彪信》中肯定了文化和实际的联系：“如你所说的实际与理论并重，文化工具就是‘实际’的一部分。”^③他主张辩证认识传统文化，既承认其中有不足之处，也肯定其中优秀的内容。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中，他强调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的深度结合。毛泽东对中国历史上的文化进行了区分，认为资产阶级的文化属于近代文化，地主阶级的文化属于古老文化，农民有耕作、民歌、跳舞等文化，但是同样不属于现代文化。他指出，中国的文化整体上不如外国，因此多次提出要积极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

① [美] 罗斯·特里尔：《毛泽东的后半生》，曾胡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252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58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5页。

(二)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结合的现代化探索

在湖南求学期间,毛泽东受杨昌济对东西方文化的态度影响,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西学兼收并蓄,从先秦诸子、宋明理学、湖湘文化到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思想都有所涉猎。新文化运动后他主要转向西学,对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实用主义等思想都有所关注。即便如此,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保持了积极的肯定,认为我们既要学习改造西方文化,也要积极改造东方文化。如1917年他提出:“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①他主张要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进行现代化改造,使得西方文化能够“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也”^②。他提出要打破传统儒家的强权思想,获得思想自由,指出中华传统文化在君权、父权、夫权之外缺乏民权、子权、妻权,强调从哲学、伦理等“大本大源”处进行变革。当五四运动在北京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当学生们把孔、孟骂得体无完肤时,毛泽东却跑到山东拜谒了孔子的墓地”^③,此外还去了孟子的家乡邹城和《水浒传》故事的发生地梁山。五四运动后期,毛泽东在长沙成为五四运动的先锋人物,他反对当时的军阀张敬尧,并帮助成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在历史变革过程中,毛泽东从中华传统文化转向社会主义,而在社会主义思潮中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此后,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毛泽东未来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依然将学习文化作为救亡图存的重要思想来源,在开展军事革命的同时还强调文化变革。如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要救国维新,就要学习外国以及教育农民,提出要采取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将先进文化从知识分子阶层扩大到普通民众。在宗教信仰上,毛泽东尊重人民的朴素信仰,革命时期他对彭湃用和农民一起拜菩萨的方式来发动人民群众表示赞赏,提出只有解决经济问题后才能彻底解决文化思想问题。1938年,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题,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肯定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和传统文化的特殊性结合起来。他用“相反相成”阐释万事万物同一性、斗争性,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申明对阶级敌人实施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用“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阐明人心向背对稳固政权的重大意义,用“纲举目张”“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等说明掌握科学方法论的重要性。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3~74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页。

③ [美]罗斯·特里尔:《毛泽东传》,胡为雄、郑玉臣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2页。

毛泽东曾在致陈寄生的信中提出：“惟觉中国的历史学，若不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研究，势将徒费精力，不能有良好结果。”^① 全民族抗战时期，毛泽东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② 在批判性方面，毛泽东尤为强调“反封建主义的文化当然要比封建主义的好，但也要有批判、有区别地加以利用”^③。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提高老百姓的经济文化水平。1950年，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提出“推行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从政府机关到全国各地展开扫盲运动。1952年，中央成立了全国扫盲工作委员会，到1964年全国文盲率从80%降到了52%。1951年，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1956年，他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第二次结合以及“双百”方针，并且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④ 他肯定外国文化有较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明之处，但是依然强调中华文化的主体性。他指出，社会主义也有缺点，强调要承认外国文化的积极方面，“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⑤。同时，他也指出：“我们要向先进的国家和民族学习，学习对本民族有用的东西，但不是所有的方面都要学别的民族，而要保持本民族的特点。”^⑥

在价值理想方面，毛泽东认同孔子在《礼记》中提到的“大同”理想，因为这是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价值观比较一致的内容。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用“大同”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共产主义社会，他将共产主义理想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关内容，用大家喜闻乐见的民族化形式表达。

二、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继承和发展

毛泽东不仅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结合的基础上具有开放性，对两者创新结合的理解方面同样具有开拓性。他所学习、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仅仅是指儒家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还包括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5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534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5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8页。

⑤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页。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选编：《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3页。

革命文化以及道家、佛学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甚至可以宽泛地说是整个非物质文化形式,强调不同阶段、不同学派、不同民族的传统文化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和引领,朝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发展;而且毛泽东对文学、诗词、戏剧、音乐等方面都进行过论述。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解,要结合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的理解来进行阐释。

(一) 马克思、列宁等人对文化的理解

对于文化的理解,马克思一方面提出文化具有阶级性,将文化理解为不同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思想,指出文化具有虚假性和欺骗性,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的对立性,以此肯定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另一方面,他指出文化具有世界性。由于商品市场的拓展,地域历史构成世界历史,民族文化构成全球文化,也就是说从经济、政治到文化领域实现了互相依存、互相影响的局面。“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①然而马克思去世后,各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宣扬“拯救民族”“保卫祖国”等形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来为战争做准备,包括当时第二国际中的机会主义也开始强调资本主义国家的“爱国主义”“效忠祖国”等口号,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文化对立转变为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对立。通过这种超阶级观点和民族意识理论观点,帝国主义国家掩盖了战争的实质,为后来的世界战争制造了舆论,甚至获得了本国无产阶级的支持。

此后,列宁于1913年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中对民族文化进行了梳理和辨析。他指出:“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②他将每一个民族文化区分为两种,即“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或者说被剥削阶级的文化和剥削阶级的文化。列宁反对帝国主义不分阶级的民族文化,以及以这种文化来分裂各民族无产阶级的欺骗性做法,他提出在尊重民族文化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基础上进行继承性改造。他主张民族文化中无产阶级文化的共通性,即“民主主义的和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国际文化”,并且以此来团结世界工人阶级。另外,列宁发展了文化的世界性,强调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属于全人类的智慧结晶,都是应该积极继承的。此后,斯大林将资产阶级执政的文化归结为资产阶级文化,而无产阶级执政的文化则是无产阶级文化。“当各民族在苏维埃政权保护下巩固起来的时候,民族文化这个口号就成了无产阶级的口号。”^③

无论马克思还是列宁,都强调要继承过去的文化传统来创新发展。马克思肯定了资本主义文化的进步性,列宁强调无产阶级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4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17页。

是无产阶级专家杜撰出来的，同样要在注重过去文化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在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后，毛泽东更加注重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因此强调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其中内在包含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如星火燎原的主张、实事求是的观点、群众路线的方法等，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基础上提出的。当然，毛泽东的主张并非无端产生，李大钊、恽代英、瞿秋白都提出过马克思主义要和中国现实情况相结合的观点。例如，李大钊提出要“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①。恽代英指出：“解决中国的问题，自然要根据中国的情形，以决定中国的办法。”^②瞿秋白则认为：“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③

（二）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发展

毛泽东继承发展了古今中外的丰富思想，主要体现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结合。毛泽东对文化的理解具有开放性，不局限于中国文化，也不局限于西方文化，不仅包括书本上的内容，也包括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生存方式、休闲方式等内容。他不仅在诗词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创新，而且对戏剧、小说、诗歌、历史等都有所涉猎。他尊重中国的民族音乐、民族服装、民族用具等，但是他反对机械地坚持传统形式，而是主张古为今用、外为中用，如1951年提出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等。

在1938年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民族化”的问题。他强调要学习中国的历史文化，而非割断中国历史，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④中国的新文化必须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此外，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了文艺“民族形式”争论和学术“中国化”讨论，艾思奇、陈伯达、张申府、胡绳等人抗战前夕发起了新启蒙运动，提出创造中华民族新文化，即“整个中国自己的文化”。1940年，毛泽东作《新民主主义论》，随后将它发表在《中国文化》创刊号上。他指出，除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外，共产党还要为文化革命而奋斗，构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新文化，既非蕴藏奴化思想的帝国主义文化，也非倡导尊孔读经、旧礼教旧思想的半封建文化。所谓新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⑤。他强调中华民族的

①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② 《恽代英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80～481页。

③ 《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1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页。

独立性,强调文化必须是我们民族的、带有民族特性的文化,他不否认学习外国进步文化,但必须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提到了中国古代文化和民间文化。他主张要辩证借鉴,并且指出:“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和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①毛泽东对传统文化融会贯通,经常化用传统文化中的一些话语体系来说明问题。在《反对本本主义》中,他提出学习孔子的“每事问”来反对教条主义;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他用“实事求是”来诠释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实践论》《矛盾论》中则通过传统文化中的知行观、矛盾观来讲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全民族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特朗的谈话中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视为“纸老虎”,极大增强了人民的信心。他还用“扫地”“扫帚”比喻暴力革命,反对幻想仅靠政治影响来获得政权的想法。他用“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战争策略来反对蒋介石的“寸权必夺,寸利必得”的反动策略,提出蒋介石在“磨刀”,那么共产党“也要磨刀”,从而保证了清醒的头脑,制定了正确的方针,避免了重蹈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在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性方面,毛泽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表达方式来奉劝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要抱有幻想,如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指出:“希望劝说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动派发出善心,回头是岸,是不可能的。”^②他否定以训诫的口吻来教育民众,批评了“长衣社会的先生们”的傲慢态度,主张做诲人不倦的教授,而非官僚主义的政客。有学者对《毛泽东选集》四卷本分析得知,其中有40个成语典故来自《左传》,有30个左右来自《论语》《孟子》《史记》《汉书》《朱子语类》等,其他的则来自《尚书》《易经》《诗经》《大学》《中庸》《战国策》等。他强调对中国传统文化要古为今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中对中国传统智慧进行了新的诠释。

三、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想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③他在建党百年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两个方向,即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两个结合”既指明了未来的发展方向,也蕴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和思想渊源。

①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7页。

③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

（一）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基础

“两个结合”不是天然、自然形成的，而是奠定在鸦片战争后数百年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的实践基础上，奠定在近代革命历史和建设历史不断探索的基础上。在此基础上，中国逐步实现了民族独立，正在建设文化强国，从百年前被西方帝国主义文化霸权不断入侵的国家，逐步转变为不断向外界发出中国声音、输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家，如孔子学院的建立等。这离不开近代以来毛泽东等人对古今中外文化不断学习的探索历程。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融合汇通，是建立在近代以来知识分子对东西方古今文化不断探索学习的基础上的，其杰出代表之一便是毛泽东。这种创新结合是一种“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的艰辛探索过程，如果不深刻挖掘其基础和前提，而是直接从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始着眼，则不足以理解这个创新结合的曲折历程和丰富内涵。如果说毛泽东思想体现为两个结合的优秀成果，那么这两种创新结合还有着漫长而丰富的历史前提和思想基础。第一，其历史前提在于近代以来对东西方文化的政治实践和历史探索，包括太平天国尝试的基督教救国思想、洋务运动提出的科技振兴思想、维新变法尝试的君主立宪理论、辛亥革命强调的资本主义民主思想，同时还包括义和团运动所实施的本土农民为主体的爱国思想。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严复、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的思想文化对毛泽东都产生过重要影响，这些理论和实践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历史前提。第二，其思想基础则在于近代以来学者对东西方古今优秀文化的不断引进和传播。毛泽东青年时期虽没有出国经历，但是并不影响他对东西方古今文化进行丰富而长期的学习，并且结合了中国的具体实际，才最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曾经说起自己读了六年孔子的书，七年资本主义的书，1918年才开始接触马列主义。^①他一生都坚持学习东西方的思想文化，开拓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陈晋曾经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三个来源……三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包括五四运动以来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中蕴含的经验、智慧、作风、气派，这仿佛是一个人的血脉。”^②他指出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吸收和转化，当然可能还不够全面，因为无论是在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前，还是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后，毛泽东依旧对外国思想不断学习，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能完全涵盖外国思想理论。

毛泽东本人生活在中国历史上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民族危机时代。他少时

^①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31页。

^② 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战略卷》，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6页。

读私塾，青年时期受救亡图存思想的影响学习东西方先进思想，进而转向了社会主义，最后服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他的思想发端于救亡图存的民族觉醒意识，不断借鉴中西方古今思想，体现为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结合成果——毛泽东思想，其基础和前提体现在毛泽东对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对古今中外优秀文化成果的创新转化。毛泽东的爱国主义思想本身包含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他身上体现的民族精神也包括对中华五千年传承下来的各民族优秀文化的学习和发展。尽管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他也经历了数次对传统文化的阶段性否定，如新文化运动和“批林批孔”运动，其中新文化运动是着眼于社会意识的改造，他并没有全盘否定，而“批林批孔”则是由于政治运动，但总体上毛泽东依然对传统文化保持着正确的态度。

（二）毛泽东对东西方优秀文化兼收并蓄的开放性

毛泽东有很深的民族忧患意识和爱国担当精神，在外出求学时，曾写下“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的诗句。尽管20世纪初中国科举制度已经废除，如1904年清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1906年旧式科举制度废除，学校讲授的内容也进行了更改，颁布了新的讲授内容，包括了东西方历史、地理、算术、卫生、天文、地质、化学等23种科目，但是毛泽东的启蒙教育依然是中国传统私塾教育。后来他曾向斯诺讲述过这段经历，也曾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讲授过。他在离开韶山之前主要读的还是中华传统文化书籍，此后即便到了长沙求学或是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中华传统文化典籍都是他的重要阅读对象，包括老子、孔子、庄子等先秦诸子的著作、宋明理学著作，尤其对史学类书籍《资治通鉴》《三国志》等感兴趣。毛泽东少年时期便喜欢读中国传统文化书籍，如《三国演义》《西游记》等，新中国成立后，他还曾多次向党内干部和身边人员推荐阅读《三国志·魏书·郭嘉传》等相关文章。

毛泽东对西方文化也始终保持着不断学习的态度。他不仅熟悉亚当·斯密、赫胥黎、达尔文、托尔斯泰、柏格森的观点，而且对柏拉图、康德、黑格尔到马克思、列宁等人的著作也进行了系统的学习，从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到现代英美哲学都进行了研究。当时这些思想被称为“新思想”，严复、梁启超、胡适、李大钊等人都在不断地把西方的思想传入中国，外国思想甚至比中国传统思想更加体现为当时的主流思想。毛泽东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他积极参与学习和宣传了这些思想，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批判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毛泽东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后来主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但是又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他在青年时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楷模，后来以胡适、陈独秀为学习对象，这几个人当时都是传播西方文化、引领风尚的仁人志士，这也体现了毛泽东对西方文化的不断了解。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指出，我们能学会原来不懂的东西，不但善于破坏旧世界，也善于建设新世界，而

“学会原来不懂”的东西便包括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化思想。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他还特别强调：“吸收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①这里面外国的东西，自然也包括外国的思想文化。

1936年，毛泽东在和斯诺交谈的时候曾引用英国科幻作家威尔斯的《星际战争》《最早登上月球的人》来反驳共产党受苏联控制的谣言。^②此后，毛泽东在读苏联西洛可夫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时指出，中国的革命斗争如此丰富，却没有相应的理论家。^③从1938年开始，他多次向党内干部提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要求，1949年他推荐了12本马列著作^④，1963年推荐了30本马列著作^⑤，1970年他又向中央委员推荐了9本马列著作^⑥。他尤其喜欢读列宁的著作，提出黑格尔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先生，因此要学习研究黑格尔思想。^⑦在文化科学方面，他强调东方应该学习西方。^⑧这些都体现了他对东西方古今文化的借鉴。

中国近代以来除了面临着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的现实冲突外，还面临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制度选择问题。中国从原来的文化输出状态变为文化输入状态，经济上由出超国变为了入超国，思想上呈现出古今东西之争、夷夏内外之辨。这种“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内蕴的现实变革、文化冲突也必然体现在毛泽东的思想地图演变中。毛泽东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有吸收借鉴的一面，又有批判扬弃的一面，同样有推陈出新的一面，并融贯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出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他带领中国共产党推进了中国的社会发展、文化发展。在进行社会革命的同时，也变革了中国的文化面貌，尤其是他从传统文化转向社会主义思想并最终服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转变过程。在此发展过程中，他的思想发展也体现了康德所说的启蒙过程，即从不成熟状态到成熟状态，或者说福柯所理解的“启蒙”，即对事物始终保持着批判的态度。在纠正了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错误思想后，他的理论发展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汇通的历史探索和创新。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9页。

② 参见刘宝东：《老一辈革命家的读书生活》，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5页。

③ 参见丁晓平：《光荣梦想：毛泽东人生七日谈》，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36页。

④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1页。

⑤ 相关内容可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⑥ 参见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历史卷》，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版，第340页。

⑦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13页。

⑧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思想年编：1921—1975》，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97页。

四、余论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在经济上为世界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促进了世界经济增长。但是在文化上我们还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中国文化、中国思想在世界上的话语权依然比较弱,因此要加强研究,推动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促进中国文化“走出去”。我们既要吸收、学习外来文化,同时也要贡献自己的文化。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结合的探索发展是重要的历史经验,刘少奇在七大上提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①,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②,因此研究毛泽东的历史经验是未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与重要经验。毛泽东思想是20世纪中国两种前途、两种命运之争中的重要决定力量,即在代表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命运和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命运的斗争中,正是毛泽东思想引领、促成了胜利的天平最终倒向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反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有力思想武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创新发展,既恢复了中华文化的主体地位,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或者说确立了两个主体的双向互动,这是对毛泽东“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观点的继承发展。然而,即便到目前,我们依然受到西方文化霸权的影响,只是方式更加隐蔽、更加多样化。西方文化通过娱乐文化、消费文化、星座文化、生活方式等仍然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包括审美上的西方中心主义等。因此,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结合的道路上,我们依然任重道远。

① 《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5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3页。

Mao Zedong's Modernization Exploration and Ideological Contribution to the Combination of Marxism and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Lu Pengfei

Abstract: The exploration of modernization combining Marxism with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s embodied in the development course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especially in the process of MAO Zedong's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After Marxism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intellectuals was provided with a correct way to treat western culture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that is, not only to avoid overall westernization, but also to avoid the mechanical adhere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Marx and Lenin stressed the need to innovate on the basis of absorbing past cultures, and MAO Zedong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their cultural views. He put forward scientific proposals such as making the past serve the present, the foreign serve China, a hundred flowers bloom, and a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contend. In the process of practice, he reform and transform the western culture and the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so as to constantly improve the cultural level of the people. MAO Zedong provided an important mirror for combining the innovation of Marxism with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the new era and strengthening the discourse power of Chinese cultural thought in the world.

Keywords: MAO Zedong; Marxism;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deological Contribution

[责任编辑: 李谷悦]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三种资源及其地位关系^{*}

常玲玲 陆信礼^{**}

【摘要】方克立在阐扬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创新文化观的过程中，提出了“马魂中体西用”的观点。“马学为魂”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中的主导地位；“中学为体”指的是文化的民族主体性，即中华文化的主体地位；“西学为用”体现的是中国新文化建设的开放态度。“马魂中体西用”论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高度契合。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综合了来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外优秀文明成果和马克思主义三方面的文化资源，突出体现了党的文化建设指导方针。通过这一理论，可以明晰三种资源在融通生成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中的地位 and 关系，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体系构建。

【关键词】马魂中体西用；中国式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外优秀文明成果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二十大以来理论研讨的热点之一。深入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不仅要讲清楚它的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还须掌握其理论逻辑。具体而言，既要明了该理论借鉴了哪些文化资源，还要厘清这些资源在整个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方克立的“马魂中体西用”论为说明中、西、马三种文化资源在中国新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关系提供了范式和方法，也为目前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生成逻辑提供了重要工具。

一、“马魂中体西用”论与党的文化建设指导方针

“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如何正确处理中、西、马

^{*}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资源研究”（项目编号：202261107）阶段性成果。

^{**} 常玲玲，中国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陆信礼，中国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三种文化资源在中国新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成为重要的时代课题。方克立于2006年提出的“马魂中体西用”论,对此课题作出了明确回答。“马魂中体西用”论,即“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马学为魂”,就是在中国的新文化建设中,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原则;“中学为体”,与清末洋务派的主张有所不同,不是把中国文化作为精神指导原则,而是指文化的民族主体性,即把有着数千年历史积淀的中国文化整体作为中国新文化建设的运作主体、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西学为用”,体现的是中国新文化建设的开放态度,即“以西方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中的一切积极成果、合理成分为学习、借鉴的对象”^①。

“马魂中体西用”论对于“思考‘五四’后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问题,并进而把它当做带有一定普遍意义的思维模式,来说明客观世界的某一类事物、现象和关系”^②具有重要意义,与中国共产党在这段时期的文化建设指导方针也是高度契合的。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论述,即体现了“马魂中体西用”的精神。毛泽东强调,“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③;他还高度重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族主体性,认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④;此外,毛泽东还主张“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⑤,使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实现兼收并蓄。

方克立认为,“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来说,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综合创新”^⑥,体现了“马魂、中体、西用”的理论范式。中共中央于1986年制定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和1991年江泽民同志的“七一”讲话,都强调要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弘扬中华文化,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一方面明确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兴国之魂”地位,而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容的第一个方面,可以说是“魂中之魂”;另一方面也提出“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

① 方克立等著,谢青松编:《马魂 中体 西用——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

② 方克立等著,谢青松编:《马魂 中体 西用——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6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6页。

⑥ 方克立等著,谢青松编:《马魂 中体 西用——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5页。

化”，还提出在对待外来文化时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方克立指出，“《决定》就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创造性地阐明当代中国文化之‘魂、体、用’三者统一辩证法的典范”^①。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文化建设问题时，对“中、西、马”三种文化资源的地位及相互关系多有论述。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时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原则。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更明确指出，要善于融通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习近平关于思想文化问题的一系列论述，是对‘马魂、中体、西用’最好的诠释。”^②

在方克立看来，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建设方针一脉相承，都可概括为“马魂中体西用”。这在党的十八大之后旗帜更加鲜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作为党的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综合了来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外优秀文明成果和马克思主义三方面的文化资源，突出体现了党的文化建设指导方针。在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三种文化资源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处于主体地位，国外优秀文明成果处于借鉴地位，马克思主义则处于主导地位。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及其主体作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文化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的沃土。在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三种文化资源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理论原则、价值观念和思想精髓等发挥运作主体和接受主体的作用，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之“体”。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也有基于中国国情的五个方面的特色。与其他各国的现代化相比较，既有同，又有异；有共性，也有个性。这其中共性与个性相结合的思想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也有历史根据。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无序，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等学派的代表人物皆提出各自主张，并展开激烈的思想争鸣。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实现天下大治，只是主张采取的方针和措施不同而已。就像《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的，“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这一精神在其他古籍中也有体现，比如“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周易·系辞

^① 方克立等著，谢青松编：《马魂 中体 西用——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06页。

^② 方克立等著，谢青松编：《马魂 中体 西用——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31页。

传》)、“道并行而不悖”(《礼记·中庸》)。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这种“同归殊途”“一致百虑”观念,向人们昭示现代化发展模式是多样的,这为我们党带领人民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重要的活力之源。

除此之外,中华文明也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的历史底蕴,特别是其中关于利益观、宇宙观和天下观等方面的阐释,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历史根基。

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利益观的阐释是形成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特征的理论资源。比如《论语》中记述的孔子关于“庶之”“富之”“教之”的思想,不仅包含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意涵,而且是关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思想的重要体现。儒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所提倡的“重义轻利”“先义后利”的价值观,虽然在处理利义关系中比较偏重作为道德标准的“义”,但这并不否认民众对物质利益的正当追求。孔子表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他不赞成民众去单纯追求仁义,摒弃利欲,而是主张通过正当手段和途径获取利益。“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六韬·文韬·文师》)这表明能够与天下百姓共享利益的君主才能得到民心。同时,单靠物质积累并不能解决贫富差距悬殊问题,关键在于如何保证社会公平。这与“不患寡而患不均”(《论语·季氏》)的理念是一致的。这种“富民共利”的思想启示我们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要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实现“富之”以后,还要做好“教之”。也就是说,在物质生活需要得到满足的基础上再去教化民众,使民众能够实现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双富足。春秋时期政治家管子“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的观点也包含了这个道理。因此,我们党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必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

其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宇宙观的阐释是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特征的理论资源。在中国古代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中,“天人合一”观念占据主导地位。这种观念将人与自然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此应当善待和保护自然环境。庄子在《齐物论》中提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董仲舒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天人合一”的思想到宋明时期发展为“民胞物与”(张载《西铭》,完整表述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王阳明《大学问》)等观点。在“天人合一”思想指导下,中国古人特别关注农业生产同生态保护相协调。春秋时期的大政治家管子就主张通过立法的手段保护生物资源,提出“以时禁发”(《管子·立政》)的原则。《礼记》中的《月令》《王制》,不仅规定了每年捕鱼、打猎、捉鸟、伐树等活动的时间,还规定了禁止滥伐森林、捕获幼兽、採取鸟卵、杀害怀胎母兽等行为。这些都可以说是倡导民众顺应

天时的“自然法”。中国传统自然观中蕴含的“天人合一”理念，对于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态保护难题具有重要的启示。

最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天下观的阐释是形成走和平与发展道路特征的理论资源。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的崇高理想。与此相应，中国人一直崇尚和平，这也是中华民族十分重要的文化基因。和平性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之一。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谈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儒教时指出：“儒教的‘理性’是一种秩序的理性主义……儒教的理性，本质上具有和平主义的性质。”^① 中华文明的这种和平性在处理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中的具体表现是：尚文不尚武，崇仁义，贵王道，倡导“讲信修睦”“协和万邦”。古代中国一直主张以德行仁的“王道”，反对以力假仁的“霸道”，有“国虽大，好战必亡”的警言。明朝万历年间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曾指出，明朝军队虽然是当时他所见过的装备最精良的，但这支军队完全是防御性的。现代思想家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根据历史学家雷海宗“中国自东汉以降为无兵的文化”的观点，认为“无兵之国”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② “协和万邦”思想是中国一直所倡导的发展观念，这种和平发展的思想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的政治底色。

郭齐勇认为，“任何民族成功的现代化，必然是而且主要是在本民族的思想资源的滋养下成功的。这样的现代化才不致是无本无根的现代化”^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根基，是应对现代化进程中风险和危机的重要资源。在开展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还必须继续发掘并利用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

三、国外优秀文明成果的资源及其借鉴作用

文化多样性是世界文化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过程中，国外优秀文明成果也是不可缺少的文化资源。国外优秀文明成果中关涉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内容，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参考价值。国外学者关于中国现代化及其模式的研究成果，可以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生成中发挥重要的借鉴作用。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之“用”。

由于历史环境、文化传统以及基本国情等因素的不同，世界各国在现代化的道路选择和实现方式上必然具有多样性，美国学者西里尔·E. 布莱克明确指出了这种多样性，他认为，“除了一般意义外，任一社会的制度模式不能作为其他

① [德] 韦伯：《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2页。

② 参见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9页。

③ 郭齐勇：《守先待后：文化与人生随笔》，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7页。

社会的模型。每一社会必须在相当程度上创造出自己的解答”^①。在布莱克看来，现代化建设中的差异性更应成为学界研究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点。对于进入现代化进程较晚的国家来说，使“传统制度适应新的功能比或多或少原样照搬西方的制度更为有效”^②。因此，后发展国家应合理保留自身的传统制度，采用非西方化的现代化模式，如果完全抛弃自身的制度去照搬西方的制度模式，“多半是不成功的”^③。吉尔伯特·罗兹曼考察中国现代化历程的目的，在于了解中国“在哪些方面遵循了其他进行现代化的国家所经过的基本路线，在哪些方面它又闯出了自己的独特道路”^④，进而分析出哪些因素能够促进现代化进程，哪些因素对现代化发展起阻碍作用。在“西化”和“现代化”的关系上，罗兹曼认为，“西化”一词是与先发的现代化国家相联系的，如果“用西化来说明现代化，可以说是用词不当”^⑤。从这两位学者的探索成果来看，任何国家的现代化模式都与本国独特的国情有关。这些关于现代化发展模式多样化以及后发的现代化国家的道路选择问题等相关论述，是我们学习了解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形成的重要参考。

国外学者关于中国人口规模、生态现代化以及全球化理论等问题的论述中也有可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资源。

首先，国外学者关于中国人口规模的分析是人口规模巨大特征的借鉴性资源。罗兹曼在分析中国现代化的影响因素时，认为“从18、19世纪开始的人口急剧增长”^⑥是关键性因素，这种人口激增会对经济增长、社会整合和耕地面积比例等产生重要影响。中国的现代化是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入的现代化，发展规模已经超越现有发达国家的总和。国外学者对于人口问题的剖析，展现出中国 in 实现现代化进程中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这也意味着，对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来说，必须走具有自身特色的现代化之路。

其次，生态现代化理论中关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关系的论述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特征的借鉴性资源。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生态现代化也呈现出国际化和全球化的趋势。这种理论试图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引进生态转型这一概念，从而解决在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生态失衡问题，实现经济和环境关系的协调发

① [美] C. E. 布莱克编：《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景跃进、张静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4页。

② [美] 西里尔·E. 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杨豫、陈祖洲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

③ [美] 西里尔·E. 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杨豫、陈祖洲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

④ [美] 吉尔伯特·罗兹曼等编：《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⑤ [美] 吉尔伯特·罗兹曼等编：《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⑥ [美] 吉尔伯特·罗兹曼等编：《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29页。

展。生态现代化理论致力于通过社会和制度的转型解决生态环境危机，这为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有效避免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良好借鉴。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理论是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进行的，并不能摆脱资本逻辑的束缚。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应当“积极寻求综合性的‘社会生态转型’的机遇或可能性”^①。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应在推进中对该理论进行借鉴和反思，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创造条件。

最后，全球化理论从整体构建人类社会和倡导构建世界新秩序是走和平与发展道路特征的借鉴性资源。20世纪90年代的西方全球化理论将人类命运和共同利益纳入研究范畴，反思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气候和生态恶化、资本盛行以及经济危机频发等现代性危机。这一理论强调对人类整体的关注和各民族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批判西方主流价值观，提出在全球化过程中建立平等和民主的新秩序。这为中国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始终以整体思维、系统观念观照全人类的前途命运，探寻国家与世界和平发展的双向互动关系提供了经验借鉴，为之后发展中国家探索现代化模式提供了一种全新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讲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不排斥吸收人类文明创造的有益成果，不仅不排斥，而且要积极学习借鉴。”^②西方国家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提出的工业化、市场化和民主化等理念，对于变革生产和生活方式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我们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民族文化主体性，还要对外来成果进行批判吸收。中国共产党是胸怀天下的政党，历来主张“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③。新中国成立之初，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侧重汲取苏联现代化建设经验，有计划地开展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国家工业化积累充足物质基础。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实现现代化是当务之急，主张实行改革开放，大胆吸收市场经济这一文明成果，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我们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也需要对国外优秀文明成果中的相关资源进行分析和借鉴，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助力。

四、马克思主义的资源及其指导作用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引领中国社会发

① 张清俐：《让谁吃下污染：“绿色资本主义”的回答》，《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5月13日。

② 习近平：《为实现党的二十大确定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求是》2023年第1期。

③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1页。

展的伟大旗帜。在中国式现代化三种理论资源中，马克思主义是最后的“落脚点”，因为吸收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国外优秀文明成果的目的是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就马克思主义的资源来说，其中所蕴含的体现科学社会主义本质的相关学说发挥着指导性作用，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之“魂”。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原理是矛盾问题的精髓。这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被马克思应用于现代化问题的研究中。他一方面论述了现代化过程中的一般特征，另一方面也指出，受历史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不同国家也会呈现出“现代化个别”。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明确表示，不论各民族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如果将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①并扩展到一切国家，这种做法“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②。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多次论及古代罗马平民的命运问题，认为在罗马历史发展过程中最终所呈现出来的并不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完全是奴隶制的，这些“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③。列宁在继承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规律论述的基础上，认为“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④。他还亲自领导了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并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探索与实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现代化发展共性与个性的论述，为中国共产党正确研判历史环境和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指导。

此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还有一些具体论述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形成的原则性内容。

首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生产的目的和劳动成果的分配等方面的论述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特征的理论之源。马克思认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⑤，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⑥。马克思在这提到的“所有的人”指的就是全体社会成员，意味着每个人不论性别、等级以及职业等都可以作为享受共同富裕的主体。恩格斯也曾提出，社会化生产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⑦。列宁在阐释共同劳动成果的分配问题时，也明确指出“应该归全体劳动者享受”^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物质生产和劳动成果分配问题的论述，启示着我们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需要将全体人民作为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和享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3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3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30页。

④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74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7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0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9页。

⑧ 《列宁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2页。

者,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此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其次,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精神文明相对独立性的论述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特征的理论之源。在他们看来,物质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精神文明的现实基础。精神文明具有相对独立性,政治、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相互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①。恩格斯在回应“经济决定论”的冲击时也表示,“物质存在方式虽然是始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物质存在方式起作用”^②。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恩格斯指出:“通过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③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们一方面要夯实人民美好生活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还要重视精神文明的反作用,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统筹推进。

最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前瞻性论述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特征的理论之源。恩格斯曾给人们提出这样的警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④,违背自然社会发展规律,“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⑤。在《自然辩证法》中,他运用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地区居民破坏环境的实例,深刻说明了违反自然规律就要受到自然界报复的道理。在未来社会中,“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⑥。在实现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现代化发展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要坚持在发展过程中始终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从二者和谐共生的高度对现代化做整体谋划。

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居于指导地位,在整个文化体系中起主导和决定性作用,是整个文化体系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⑦。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原因就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决不犯颠覆性错误。马克思主义中所蕴含的发展趋向和理论主张能够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行动指南,为中国式现代化“铸魂”。马克思主义方面的资源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主导或“灵魂”地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4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9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3~56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98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98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8页。

⑦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3页。

位，关系到现代化发展方向和道路，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

作为学术范式的“马魂中体西用”论，是一个逻辑严密的文化理论体系。我们在运用这一学术范式解读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资源时，所期望的并不是将三种文化资源简单分开或叠加、糅杂在一起，而是运用辩证的系统思维方法，合理辨析三者的不同地位及关系，进而实现“综合创新”。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三种资源的积极作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构建。

Three Resources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eory and Their Status Relationship

Chang Lingling Lu Xinli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elaborating the Marxist concept of integrated innovation culture, Fang Keli formally proposed the theory of “Marxism as the spirit, Chinese tradition as the basic structure and Western knowledge as the instrument”. “Marxism as the spirit” refers to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Marxism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socialist culture; “Chinese tradition as the basic structure” refers to the subjectivity of national culture, which is the main position of Chinese culture; “Western knowledge as the instrument” reflects the open attitud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Chinese culture. The theory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synthesizes cultural resources from three aspects: the excellen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excellent foreign civilization and Marxism, and highlights the Party’s cultural construction guidelines. Using this theory, we can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ul”, “body” and “application” of the three resources in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heory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nd promote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Keywords: Marxism as the Spirit, Chinese Tradition as the Basic Structure and Western Knowledge as the Instrument;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Marxism; Excellen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Excellent Foreign Civilization

[责任编辑：杨鹏]

新时代提升党员领导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的 科学意蕴*

——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分析视域

冯红伟**

【摘要】 党员领导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即党员领导干部完整准确坚持中国式现代化、扎实有效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能力。历史地看，提升党员领导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需求，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拓新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具备过硬的现代化建设能力。中国式现代化是提升党员领导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的方向指南，从价值追求、过程展开、外化表现三个层面为党员领导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内容生成提供实践基础。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与提升党员领导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相互支撑，内在自洽，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成功开创的法宝之一。在已开启的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要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指导，坚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坚持自我革命与胸怀“国之大者”相结合，坚持完善制度与改善环境相结合，继续提升党员领导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助力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如期实现。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党员领导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提升路径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①。2022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中再次强调：“必须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② 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重申，

* 本文系山东省社科规划研究项目“现代化强省目标下干部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提升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2CDCJ10）和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重大项目攻关创新的阶段性成果。

** 冯红伟，山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党史与党的建设。

①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4页。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崭新篇章》，《人民日报》2022年7月28日。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①。由此可见，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大道。与西方现代化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熔铸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具有深厚的实践基础。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强调现代化的协调发展、和平发展，不断破解现代化建设的难点、痛点和堵点，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证、科学的思想指南、深厚的群众基础、稳定的社会条件，将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不断引向深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劲动力与磅礴力量。历史与现实已经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系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保障和鲜明优势。而党员领导干部作为党的领导的中坚力量，不断提升其现代化建设能力，则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然之势和应然之道。基于此，以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演进为标向，科学认识提升党员领导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与中国式现代化成功推进的内在统一，准确把握党员领导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的核心内涵与提升路径，是兼具理论与实践双重层面价值引领的时代问题。

一、因何提升：提升党员领导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需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②。一定意义上讲，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也是党员领导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持续提升的历史。党员领导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即党员领导干部“完整准确坚持中国式现代化、扎实有效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能力”^③。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需要，是党员领导干部提升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基本定位和标向。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开创性探索：提升党员领导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的提出与确证

现代化旨在通过加快经济发展、促进社会进步、提升文明水平，进而摆脱国家贫穷落后状态。新中国成立后，为彻底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中国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21 页。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22 页。

③ 冯舟：《建设一支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干部队伍》，《学习时报》2022 年 11 月 14 日。

共产党旋即提出要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①，从而拉开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序幕。结合我国具体实际，党在过渡时期提出要“实现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交通运输业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四个现代化”具体目标。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在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深入认识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又将“四个现代化”的科学内涵调整概括为“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四个现代化”的提出，使得现代化建设内容更加具体、方向更加明确。战略目标确定后，作为实施政策的制定者、路线方针的执行者，党员领导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其现代化建设能力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战略目标的实现与否。基于此，1957年，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郑重提出“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②，从而明确了党员领导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的总要求：既要具备过硬的政治能力，又要具有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的科学技术知识和业务能力。以此为牵引，加大干部教育培训力度，逐渐建立起了一支具有一定数量和规模的“红专”干部队伍。在这样一支干部队伍的带领下，我国在初步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取得了卓著成就，实现了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目标。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性推进：提升党员领导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的深化与发展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中国式现代化进入了深化发展阶段：一是总目标经历了“中国式的现代化（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调整转变；二是具体目标经历了“富强民主文明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调整转变；三是战略步骤经历了“分三步走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调整转变；四是总体布局经历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抓到三位一体、四位一体再到五位一体”的调整转变。深化发展意味着发展的高标准、高要求，对此，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战略上的清醒和坚定，适应不同阶段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具体要求，对于党员领导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的提升方针也进行了发展优化、调整完善，加快构建与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党员干部队伍。

改革开放之初，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着力打造一支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相适应的高素质党员领导干部队伍，提出了干部队伍建设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方针，不断提升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能力、知识能力、专业能力等与现代化建设相关的系列能力。在“四化”干部

①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9页。

的带领下，中国踏上了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新征程。20世纪90年代，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党员领导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的认识不断深化，在具体表述上形成了更为丰富的内容，指出要不断提高干部的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法执政的能力、总揽全局的能力，将中国式现代化成功推向21世纪。进入21世纪，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着重从提高党员领导干部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等“五大能力”，以及激发社会创造活力的本领、管理社会事务的本领、协调利益关系的本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本领、开展群众工作的本领和维护社会稳定的本领等“六大本领”这两大方面不断提升党员领导干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能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继续向纵深发展。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时代拓展：提升党员领导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完善与拓新

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被进一步发展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强调“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制定了分两个阶段实现强国目标的发展战略。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锻造“一支政治过硬、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干部队伍”^①，与时俱进地提出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在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五大能力”和“六大本领”的基础上，结合新时代发展需求，进一步强调干部队伍需要具备“七种能力”和“八大本领”^②。此外，随着全媒体时代、智能化时代的到来，习近平总书记还要求党员领导干部要不断增强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不断增强国际传播能力、不断增强发展数字经济本领以及利用数据推进工作的本领等富有时代特色的新内容。在坚持共性原则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的党员领导干部群体和不同岗位的党员领导干部，又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能力建设的个性要求。比如针对年轻党员干部群体，习近平总书记从培养年轻党员干部是关系国运、党运的“百年大计”方面强调了提升年轻党员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的重要性，从加强专题培训、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等方面为提升年轻党员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指明了方向。针对政法队伍，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政法干部要提高“法律政策运用能力、防控风险能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66页。

^② “七种能力”：政治能力，调查研究能力，科学决策能力，改革攻坚能力，应急处突能力，群众工作能力，抓落实能力；“八大本领”：学习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和驾驭风险本领。

力、群众工作能力、科技应用能力、舆论引导能力”^①。上述内容鲜明体现了新时代提升党员领导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有机统一、统筹兼顾与重点突出有机统一的方法论原则。在这样一支现代化建设能力过硬的党员干部队伍的带领下，过去十年，“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②。

列宁曾指出：“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③从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可以看出，提升党员领导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与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同频共振。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与拓展，提升党员领导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也经历了“提出与确证—深化与发展—完善与拓新”的发展阶段，党员领导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的不断提升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顺利推进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障，从而助力党和国家取得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历史性胜利。展望未来，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毋庸置疑，仍需继续提升党员领导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使其能够更好应对形势和任务发展带来的新挑战，进而助力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如期实现。

二、提升什么：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提升党员领导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内容体系

“党员领导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与“中国式现代化”既同时出场，又同时在场。通过前面的历史梳理，不难看出，提升党员领导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内容体系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和拓展中逐渐定型并不断完善，呈现出历史的延续性和实践的发展性特征。基于此，本部分拟以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发展为参照系，坚持唯物辩证的发展观，在变与不变的有机统一，从价值追求、过程展开、外化表现三个方面厘清提升党员领导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的核心内容，为新征程中继续提升党员领导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提供理论指导。其中，价值追求是主线，引领并贯穿于党员领导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全部内容体系；过程展开是主导，具体内涵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过程中凝练升华而成；外化表现是标识，是在主线内容与主导内容基础上延伸而来的精神要素。三者之间相辅相成，彼此支撑，共同构成提升党员领导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内容体系。

^①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49页。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6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6页。

（一）作为价值追求的主线性内容

“价值追求是对一定的价值目标的执着向往并力图达到此目标的强烈驱动倾向”^①，是贯穿党员领导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提升全过程的一条主线。党员领导干部在提升现代化建设能力过程中，要始终牢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和对党忠诚的价值原则。

一是始终牢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②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外，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在领导全国人民开拓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多次强调党员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宗旨意识，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满足人民群众需要摆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一位。从毛泽东提出适应人民需要，“力争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工人生活”^③，到邓小平强调“要防止只顾本位利益、个人利益而损害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破坏性的自发倾向”^④，从江泽民重申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到胡锦涛主张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再到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及“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始终要求党员领导干部要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最高价值追求，并将其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全部工作中，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⑤。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中，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也在持续增强。新时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党员领导干部在提升自身现代化建设能力的过程中，务必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将解决群众难题、增进人民福祉作为能力建设的“价值路标”，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二是始终牢牢坚持对党忠诚的价值原则。对党忠诚作为党员领导干部的首要政治品质，说到底就是党性问题，是干部队伍主体政治身份的重要彰显。党员领导干部作为党的事业的中坚力量，在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和拓展过程中起着“方向指导”“价值指引”的双重作用，对党忠诚与否直接影响着中国式现代化实践。

① 王伦光：《论价值追求》，《社会科学辑刊》2006年第2期。

② 《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43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5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2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页。

因此,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对党忠诚作为选任干部的首要标准。毛泽东要求党员领导干部要“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①,邓小平同样主张党员领导干部要忠实于党和人民的事业。江泽民和胡锦涛也多次指出,党员领导干部要对党和人民负责,对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要“忠心耿耿……反对弄虚作假、瞒上欺下”^②。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将对党忠诚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从定位、定标、定向等方面对党员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中青年干部和重点领域干部对党忠诚问题进行了新思考、新探索。对党忠诚是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根本政治要求,是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对党忠诚主要“体现到对党的信仰的忠诚上,体现到对党组织的忠诚上,体现到对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忠诚上”^③。就对党忠诚的践行而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高级干部要“带好头、做好表率”,中青年干部要将对党忠诚摆在自身成长发展的首位,中央办公厅、军队、政法部门、党校系统等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点领域,相关干部在对党忠诚问题上更要严格自我要求。正是因为有了一支对党绝对忠诚的干部队伍的领导,全国人民才能始终保持“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成功化解了中国式现代化推进过程中面临的诸多风险挑战。新征程上,面对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党员领导干部更要自觉加强党性修养和政治历练,以实际行动诠释对党忠诚,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化拓展继续“保驾护航”。

(二) 作为过程展开的主导性内容

主导性内容是党员领导干部在中国式现代化推进过程中完成工作任务的必备条件,其呈现出发展的动态性,具体内涵随时代变化不断升级,持续扩容。结合党和国家关于现代化的已有探索和未来规划,作为过程展开的主导性内容主要包括政治能力、理论素养、专业能力、思维能力四个方面。

政治能力是首位。列宁曾深刻指出:“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④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政治能力始终是中国共产党重视的党员领导干部现代化建设的首位能力。毛泽东多次强调领导干部如果“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⑤。邓小平反复要求领导干部“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⑥。江泽民明确提出党的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要成为“会治党治国的政治家”^⑦。胡锦涛多次重申广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7页。

② 《胡锦涛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59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00页。

④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7页。

⑤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6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6页。

⑦ 《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66页。

大干部要“始终站稳政治立场”^①。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明确指出政治能力在党员领导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中是居于第一位的，并详细阐述了政治能力的“三力”内涵，即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在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中把牢政治方向，在不断提高政治领悟力中做到“两个维护”，在不断提高政治执行力中切实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将政治能力置于党员领导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首位，使得干部队伍成功抵御了世情、国情、党情变化带来的一系列风险挑战，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得以成功推进和拓展的政治智慧。新时代新征程，党员领导干部务必要继续“旗帜鲜明讲政治”，不断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实现。

理论素养是核心。“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是我们党的干部领导素质的核心和灵魂。”^②理论坚定，政治能力才能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才能保持正确的方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员领导干部通过在职教育、自我学习、小组讨论等形式提升自身理论素养，在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对国家现代化建设果断作出由“以苏为师”到“以苏为鉴”的战略调整，标志着中国开启了独立自主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新历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反复重申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有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③。正是有了这样一支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高的党员干部队伍，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才能在国内矛盾激化和国际局势动荡的危机中从容应对，始终立于不败之地。江泽民、胡锦涛也多次强调党员领导干部要有“忠于马克思主义的坚定立场”^④，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⑤，将中国式现代化引入新的发展阶段。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总是企图让我们党改旗易帜、改名换姓，其要害就是企图让我们丢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丢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⑥。因此，他反复警示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有马克思主义的坚定立场，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含糊和动摇。在理论坚定的党员干部队伍带领下，党和国家成功地化解了发展过程中的诸多风险和挑战。坚定马克思主义立场，加强党员干部队伍思想建设，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得以成功推进和拓展的思想智慧。新征程上，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仍然是党员干部胜任领导现代化建设工作的最根本的本领，广大干部要在理论与实际相联系、学习与实践相结合中，既学懂弄通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又确保这一理论体系真正入脑入心，不断提升自身理论素养，善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工作实践，回答解决现实问题，更好发挥习近平新时代

① 《胡锦涛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79页。

② 《胡锦涛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75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1页。

④ 《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页。

⑤ 《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3页。

⑥ 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8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的作用，确保国家永不变质、政党永不变色。

专业能力是关键。专业能力强，对于工作才更能有胜任力。毛泽东要求“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①，着重通过提升党员领导干部的科学技术和知识文化水平，使其成为胜任本职工作的行家里手。邓小平将专业化作为干部队伍建设的原则方针之一，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建立一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干部队伍，而且是一支宏大的队伍”^②。江泽民指出，高素质干部的要求之一就是要“不断加强知识积累和经验积累，具备做好本职工作的专业知识和能力”^③。胡锦涛强调选拔党员领导干部要选拔“工作上有本事”^④的人，“有本事”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要要有胜任本职工作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新时代，随着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向前推进，各项工作对专业化的要求越来越高。为更好适应国家发展需要，习近平注重从系统论视角出发，以整体性逻辑深化专业能力认识，强调专业能力是专业知识、专业思维、专业方法、专业作风、专业精神的内在统一，“不仅仅是专业对口那么简单”^⑤，既继承了以往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党员领导干部专业能力界定的核心内涵，又结合新时代的发展变化，对其外延进行了丰富和完善。加强党员领导干部专业化建设，提升党员领导干部专业化工作能力，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得以成功推进和拓展的实践智慧，同时也为新征程中党员领导干部专业化能力进一步提升提供了方向指导和理论遵循。

思维能力是保障。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⑥ 理论思维是人们正确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有效工具，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具体展现。理论思维源于实践又引领实践，实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是理论思维的起点，理论思维形成后，又用于指导实践问题的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为帮助党员领导干部纠正对一些经济问题的错误倾向，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新问题，有效观察和处理国际斗争中的新问题，毛泽东要求党员领导干部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的学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针对部分党员领导干部缺乏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缺乏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不善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邓小平要求干部队伍“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⑦，江泽民提出“在干部中开展正确的思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9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4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58页。

④ 《胡锦涛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96页。

⑤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51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75页。

⑦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3页。

维方式的教育，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①，胡锦涛强调要不断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理论思维能力”^②。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重申中国共产党人要领导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同样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对于马克思主义思维的学习运用，内蕴了中国式现代化得以成功推进和拓展的方法论智慧。新征程，面对可预见和难预见的风险和挑战，要想如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员领导干部必须要有理论思维的有力支撑，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等能力，增强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三）作为外化表现的标识性内容

外化表现是党员领导干部完成工作任务必备的精神状态，是判断党员领导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高低的标识性内容。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精神作为人的主观能动意识的外在表现，有积极与消极之分，其在实践中产生，同时对实践又具有重要的反作用。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中，精神主要是指在革命、建设、改革实践过程中所激发出来的巨大的积极的主观能动力量。“人无精神则不立”，精神作为党员领导干部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动力指引，自然也是党员领导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内容构成。

一是要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艰苦奋斗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民族复兴的精神动力。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国家“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启的，“我们穷，底子薄，教育、科学、文化都落后，这就决定了我们还要有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③。因此党员领导干部始终保持过去“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④，团结带领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使中国实现了站起来、富起来的伟大飞跃。进入新时代，在强起来的追梦路上，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告诫党员领导干部要“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昂扬精神”^⑤。经过十年的卓绝努力，广大干部带领全国人民解决了长期以来没有解决的系列大事要事，党和国家的面貌焕然一新。新征程中，“无论我们将来物质生活多么丰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一定不能丢”^⑥。艰苦奋斗精神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精神能力，是其带领民众继续应对国内外复杂局势、风险挑战的制胜法宝。

二是要发扬斗争精神。恩格斯曾经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党员“要担任领导

① 《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

② 《胡锦涛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28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7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

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514页。

⑥ 习近平：《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革命传统和作风 弘扬延安精神》，《求是》2022年第24期。

职务还需要熟悉党的斗争条件,掌握这种斗争的方式”^①,将斗争精神作为担任党的领导干部的必备条件。1956年,受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这一“秘密报告”的影响,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较大动荡,但我们国家却保持了稳定发展,这主要得益于我们党有一支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党员干部队伍,从而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在选配领导班子时,特别注重选配那些“在斗争中经得起考验的人”,将“富于斗争精神”作为选拔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标准之一,从而确保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成功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轨道上来。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之一,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得以成功推进和拓展的精神动力之一。新时代,在斗争精神指引下,党员领导干部成功应对了一系列风险考验。今后,党员领导干部务必要继续保持斗争精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中,同一切损害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弱化党的领导,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等行为进行坚决斗争并取得斗争的最终胜利。

三、怎样提升: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提升党员领导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的方法论路径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已经开启,深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号角已经吹响,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进征程中,我国面临的风险挑战会不断增加,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会不断增大。为更好应对国内外复杂局势带给我国发展的深刻影响,我们有必要掌握提升党员领导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的科学方法,将已有经验运用到提升党员领导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的新实践,同时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新篇章提供强有力的组织支撑。

(一) 坚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提升呼应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有一支政治过硬、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干部队伍。”^②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在不断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时,始终注重在战略决策上加强顶层设计、统一领导,在战术选择上鼓励基层探索、实践创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为密切干群关系,提升党员领导干部联系群众的能力,毛泽东要求干部都要参加体力劳动。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浙江省金华市党员领导干部结合本市实际,探索形成了“生产劳动+科学实验”的劳动方式。毛泽东对此曾作出批示:“干部和群众一道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06页。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66页。

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①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中央提出了“四化”方针、德才兼备等党员领导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提升新标准。以此为指引，基层不断探索符合本地实际的党员领导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提升模式，譬如青岛探索形成了“课堂+基地+实践”的“三位一体”模式，常宁探索形成了“三考三评三公”的“三三三”模式，为党中央不断完善党员领导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的顶层设计提供了实践参考。在新时代的十年发展过程中，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员领导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的相关论述为指导，各地继续探索提升新模式：四川犍为县形成了“四步衔接”（优选、细育、严管、善用）全链条模式，广州启动了“羊城村官上大学”工程，形成了“1+1+3”提升模式^②，塑造了可在全国推广、复制的关于提升基层党员领导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的“犍为模式”“广州模式”。新征程中，党员领导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顺利与否，因此需要党中央继续加强顶层设计，抓住“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问题、核心问题、重难点问题，做好战略规划，擘画好提升党员领导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的“蓝图”。同时，鼓励基层民众积极建言献策，鼓励各个地方结合自身实际，因地制宜，探索出适合本地党员领导干部提升现代化建设能力的有效路径。只要正确处理好“上”与“下”的关系，实现“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的良性互动，就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加快建成一支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党员干部队伍。

自上而下侧重于“上”，即顶层设计，其为党员领导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的提升规定方向和原则。自下而上侧重于“下”，即基层探索，其为党员领导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的提升积累经验和办法。两者的有机结合体现了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内蕴对中央决策部署贯彻的坚定性与落实的创造性之间的内在统一，是提升党员领导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必须坚持的方法论原则。

（二）坚持自我革命与胸怀“国之大者”相结合的提升主体论

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优势，是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之一，是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党员领导干部作为党组织的“关键少数”，必须要永葆自我革命精神，敢于刀刃向内，坚持问题导向，在自我革命中解决自身问题，提高自身能力，锻造过硬本领。问题导向是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根本表现，是提升党员领导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的逻辑起点。在中国式现代化

^①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四九年十月～一九六六年五月）》第43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70页。

^② “1+1+3”模式，即“一个标准”——“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农村基层党员干部培养标准；“一个机制”——“多方联动”的领导管理机制；“三个维度”——政治素质提升、能力培养和作风锻造。

的不断推进中，党员领导干部在现代化建设能力方面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有些干部治理能力和专业能力明显跟不上，有些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还不够，有些干部的群众工作本领不够强，有些干部担当作为的底气不足，等等。对此，党中央对症下药，理论学习、主题教育、干部轮训、实践锻炼等多措并举，帮助党员领导干部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新征程中，党员领导干部面对的风险挑战会愈益增加，更需发扬自我革命精神。通过理论学习和作风建设，净化思想和行为，巩固自身信仰和党性，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能力。通过专业训练和知识学习，优化自身专业知识结构，解决本领恐慌问题，不断增强自我完善能力。通过政治历练和先进性建设，始终做到“两个维护”，增强拒腐防变能力，明确自我革新方向。通过实践锻炼和斗争磨砺，发现自身短板与不足，不断提高防风险、迎挑战、抗打压能力，提供自我革命的内生动力。

在坚持自我革命的同时，还要始终胸怀“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要自觉讲政治，对“国之大者”一定要心中有数。结合总书记的相关论述，不难发现，“国之大者”就是关系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要事，“国之大者”为党员领导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提升提供了方向指引。结合新征程的奋斗目标，党员领导干部要在牢牢把握民族复兴的“国之大局”基础上继续发扬担当和斗争精神，敢于负责，在机遇面前主动出击，在困难面前迎难而上，在风险面前积极应对；在牢牢把握人民幸福的“国之大事”基础上，积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树立为民谋福的正确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在牢牢把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国之大事”基础上，纠正某些干部对新发展格局的错误认识和不当判断，消除某些地方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提升干部的大局意识；在牢牢把握保护环境的“国之大事”基础上，加强对“双碳”基础知识、实现路径和工作要求的学习。

坚持自我革命与胸怀“国之大者”是党员领导干部提升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内生动力，广大干部在“国之大者”的方向指引下，通过不断加强理论学习、专业学习、政治训练、实践锻炼，在“自身硬”的锻造过程中解决能力不足、本领恐慌的问题。

（三）坚持完善制度与改善环境相结合的提升保障论

完善制度侧重于硬保障，着力解决党员领导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提升“能”的问题；改善环境侧重于软支撑，着力解决党员领导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提升“行”的问题。“能”与“行”同向发力，确保党员领导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高质量提升。

一方面，要完善相关制度。“经国序民，正其制度。”“有制”才能“有治”，“善制”方能“有效”，完善的制度体系是不断提升党员领导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的有效支撑。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多次强调要“改革现

行的干部工作制度，建立有利于提拔年轻干部的制度”^①，要“加快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步伐，努力推进干部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②。科学合理的制度建设确保我们党将现代化建设能力过硬的优秀人才选入了干部队伍，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和拓展提供了组织保障。“任何一制度之创立，必然有其外在的需要，必然有其内在的用意，则是断无可疑的。”^③新征程中，为确保党的中心任务顺利推进，需要继续加强和完善干部工作制度建设。完善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常态化工作机制和干部担当作为激励机制，真正把能力过硬、敢于担当负责之人选拔到党员干部队伍中；完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真正确立以实际绩效为导向的考评机制；完善干部教育培训制度，针对干部的知识空白、能力短板、经验盲区等，开展精准化培训；完善待遇保障制度，尤其是要健全艰苦地区和基层党员干部的待遇机制，使其工作无后顾之忧；完善干部心理健康培训和心理疏导干预机制，帮助干部提高心理自我调节能力和抗压能力。

另一方面，要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工作环境是干部干事创业的实践场域，诚如恩格斯所言，党员领导干部“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④。置身于社会关系中的党员领导干部，自身现代化建设能力的提升必然要受到各种环境氛围的影响和环境因素的制约，其中必会是消极因素与积极因素并存。在提升党员领导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的过程中，要不断改善工作环境，变消极阻碍因素为积极推进因素，为党员领导干部成长、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氛围。具体地讲，要显隐结合。就显性环境而言，既要营造尊重人才、见贤思齐、鼓励创新、容许失误的和谐工作环境，又要营造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关爱干部、心情舒畅的正确用人环境。就隐性环境而言，要注重树立积极向上的主流舆论导向，营造以干事创业为荣的舆论环境。在良好工作氛围中不断增加党员领导干部的职业认同感和幸福获得感，使其将内在感受转化为能力提升的动力。

综上，中国式现代化与提升党员领导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之间内在统一、相互支撑，拓宽了我们关于中国式现代化何以能、何以行的研究视角。但是，提升党员领导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作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极为重要的“正题”和“论题”，因以往在党的文件和文献中鲜有表述，尚需我们在科学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与提升党员领导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有机统一的基础上，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密切结合中深入研究和阐释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提升党员领导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的理论基础、文化渊源、历史演变、现实推进以及重要意义，厘清现代化建设、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等基础概念，明晰党员领导干部现代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6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76页。

③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0页。

化建设素质与党员领导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的辩证关系等一系列基础性问题。唯此，方能充分呈现提升党员领导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的政治智慧和学理依循，深刻揭示中国式现代化为什么能够成功的能力密码和组织逻辑，为新征程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方向指引和实践牵引。

The Scientific Implications of Improving the Modernization Ability of Party's Leading Cadres in the New Era

—Based on the Analytical Perspective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Feng Hongwei

Abstract: The modernization ability of party's leading cadres refers to the ability to fully and accurately adhere to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nd effectively promote it. Historically, it is the strategic demand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o improve party's leading cadres' modernization abil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requires that party's leading cadres must have excellent ability to lead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s the direction guide to improve the modernization ability of party's leading cadres. It provides practical basis for the content generation of the modernization ability of party's leading cadres from three aspects: value pursuit, process development and externalization.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nd the improvement of party's leading cadres' modernization ability support and are consistent with each other, which is one of the magic weapons of the successful creation of the Chinese new path to modernization. As we embark on a new journey of modernization, we must follow the guidance of the Marxist methodology, combine top-down with bottom-up, combine self-revolution with bearing in mind greatness of the country, combine institutional improvement with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continue to enhance the ability of party's leading cadres in modernization, and help achieve the second centenary goal on schedule.

Keywords: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Party's Leading Cadres; Modernization Ability; Improving Path

[责任编辑: 闫惠惠]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内涵、维度与实现路径^{*}

刘 勇^{**}

【摘 要】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和根本要求，更是一种社会状态和发展趋势。在一定历史时期，社会文化繁荣，社会风气向好，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精神境界不断提升，在个人身心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上取得长足进步，这样的社会是走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社会。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三个维度是个人、社群与国家，它们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共同统一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创建之中。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上，个人精神生活富裕是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首要前提，社群共建共享是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基本路径，国家统筹全局是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

【关键词】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内涵；维度；实现路径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①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对共同富裕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从比较强调共同富裕的物质生活方面，到强调共同富裕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个方面。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②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人民物质生活富裕和人民精神生活富裕是共同富裕的两个基本方面，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共同富裕的题中之义。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共同富裕的重要方面和题中之义，而共同富裕

^{*} 本文系2023年度浙江省社科联研究课题“精神共富的内涵、维度与实现路径研究”（课题号：2023B038）阶段性成果。

^{**} 刘勇，宁波财经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② 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求是》2021年第20期。

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可以认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当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或者说由物质生活共同富裕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构成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① 这更加深刻揭示了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两个方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本质规定性。新时代以来,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重要意义的认识已经达到一个新高度,概而言之,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和根本要求。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本质性意义,从学理上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内涵、维度与实现路径加以研究和阐述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工作。

一、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内涵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有自己的特质和深刻内涵,这是我们探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丰富内容和实现路径的理论前提。

(一)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特质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描述全体社会成员的精神状态达到一定富有程度的概念,是一种全体社会成员特定的精神心理活动和状态。作为全体社会成员特定的精神心理活动和状态,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具有本质性特征,也就是特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特质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即意识性、社会性、时代性、主体性及生成性。第一,意识性。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与物质生活共同富裕对应的精神状态,物质生活共同富裕主要表现为人们的客观物质性活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主要表现为人们的精神意识活动。物质生活共同富裕具有外显性和形象性,看得见、摸得着。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具有内倾性和无形性,潜藏隐含在人们的意识之中,即使在特定条件下具象化为人们的言行举止,仍然需要透视这些言行举止后面的精神信息才能准确把握。第二,社会性。人们的精神心理活动是社会的产物,人们的思想意识与特定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密切联系,不存在脱离特定社会关系和社会运动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第三,时代性。人们的精神心理活动受到时代条件的影响与制约,不同时代的人们在精神和心理活动上具有不同的特点和表现,而同一时代的人们在精神风貌和精神气质上往往具有某些共性。我国改革开放前与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精神气质明显不同就是这个道理。第四,主体性。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2~23页。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人们的主体感觉和内心感受,心理状态怎么样,精神富有还是精神匮乏,只有主体才能真切感知。第五,生成性。人们的精神心理活动具有能动的生长性和生成性,人们可以通过自我调适保持心情愉快,可以通过自我成长提升精神境界和创造精神财富。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内涵的阐释应该建立在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五个方面特质的全面准确理解之上。

(二)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内涵

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内涵的认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进而逐渐深化的。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一直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至党的十八大召开前,我国在总体富裕上取得了巨大历史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走向共同富裕逐渐成为全体社会的现实目标,精神生活富裕作为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和本质特征,逐渐进入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视野。2012年12月,浙江省公布《中共浙江省委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 扎实推进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现代化浙江建设的决定》,提出推进“两富”现代化浙江建设,即建设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现代化浙江。在这之后的两年时间内,出现了关于精神富裕、精神富有内涵的一些讨论。赵洪祝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我们所说的精神富有,就是要使全体社会成员普遍受到良好的教育,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养、民主法治素养、思想道德素养和生态文明素养,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项权益得到切实保障,过上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拥有共同的精神家园。”^① 这里的精神富有是指全体社会成员的精神富有,精神富有具体表现为社会成员普遍受到良好教育、普遍具有较高素养、普遍得到权益保障、普遍过上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张伟斌、陈华兴认为:“精神富有是指人们在社会实践活动过程中主观世界不断洗练完善、精神内容不断向上向善的过程和状态,是人的知、情、意不断丰富提升,社会的真、善、美不断显现完臻的过程和状态。”^② 这里主要强调人们内心的修养状态和社会的真善美状态。陈雪珍认为:“精神富有是主体(包括个人、群体、社会)在一定的社会实践活动中,通过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所呈现出来的在思想道德、文化素质、知识水平、理想信念、价值观念、文明和谐等精神方面的意愿与追求,并在此过程中创造精神财富,获得精神满足与享受。”^③ 这里特别指出主体创造精神财富,主体获得精神满足与享受,精神富裕的生成性和主体性特质得到较好强调。

2021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

① 赵洪祝:《努力建设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现代化社会》,《人民日报》2012年6月13日。

② 张伟斌、陈华兴:《试论精神富有和精神富有的社会》,《浙江学刊》2012年第6期。

③ 陈雪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引领精神富有建设》,《社会科学家》2013年第3期。

区的意见》发布,支持鼓励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之后关于精神富裕内涵的阐述以胡坚为代表,“精神富有就是人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主观世界不断得到改造完善,精神需求不断得到满足,精神生活不断得到充实提高的过程和状态”^①。这里的精神富有强调人们主观世界的改造完善和精神生活的充实。

综上,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内涵的阐释应该尽量兼顾意识性、社会性、时代性、主体性、生成性五方面特质。可以说,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一种社会状态和发展趋势。在一定历史时期,社会文化繁荣,社会风气向好,人民群众的幸福感不断增强,精神境界不断提升,在个人身心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上取得长足进步,这样的社会是走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社会。

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三个维度及其相互关系

对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学理学术研究,目前处于起步阶段。这一阶段,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内涵无疑是讨论的中心。如果继续深入研究下去,就不能不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维度着手。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维度即考察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视角,如果不从多个视角来切入分析,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讨论就不能从一般认识深入到具体认识,也就无法使研究变得更为具体深刻。

(一)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三个维度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维度包括个人、社群和国家三个层面,只有从这三个层面分析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才能更加具体深刻地认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1.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个人维度

从个人维度看,能否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与个人精神位态直接相关。“位态”是位置和状态的合称,一定的位置代表一定的层级和一定的状态。个人精神位态就是个人的思想道德和精神境界所达到的位置和状态,就是个人精神处在某个位置和层级的状态。社会中每个人的精神境界都有一定位置和层级,不同层级的精神位态表征的是个人修养和精神境界所达到的不同层级。不同的人在同一时段的精神位态层级可能不同,同一个人在不同人生阶段的精神位态层级也可能不同。在目前和将来一段时间,人们的个人精神位态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层级:第一层级,精神匮乏。这一精神位态的人缺少良好的个人修养和心理素质,心理容易失衡,负面情绪较多,人际关系紧张。第二层级,精神温饱。这一精神位态的人具有较好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心理素质,心态比较平和,正面情绪较多,人际关系正常,能够自我调适和自我平衡。第三层级,精神富裕。这一精神位态的人具有良好的科学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和心理素质,具有积极乐观

^① 胡坚:《在共同富裕中实现精神富有》,《宁波日报》2021年9月9日。

的心态和良好的人际关系，具有一定的文化创造力和影响力，能够传播正能量和正向影响他人。第四层级，精神富强。这一精神位态的人具有相当高的精神境界，具备相当强的精神文化创造力和影响力，能够为社会实现精神富有和他人精神位态提升发挥建设性作用。

2.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社群维度

从社群维度看，能否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与社群精神风貌密切相关。“社群”是社会群体、社会单元及社会组织的简称，社群精神风貌是指社会群体展现出的精神风貌，包括社会关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社会观念、社会道德等方面的风气和面貌。社群是实体性与精神性的统一。就其实体性而言，社群是一些社会人群的单元和组织，主要表现为企业、政党、团体、组织、协会、社区、家族和家庭等存在形式。同时，社群还表现为精神性的社群风貌，即社群之内或社群之间人与人交往连接而形成的社会关系、社会风气和社会风貌。社会群体、社会单元及社会组织在运行过程中，以运行机制、规章规定、习俗习惯等方式连接和组织社群成员开展各种活动，并在活动中形成某种社会关系、社会风尚、精神风貌和文化氛围。社会群体、社会单元及社会组织的活动或者直接是或者伴随着人们的精神文化活动，因而社群活动内在地具有价值观念、思想情感和心理变化。社群精神风貌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塑造主要在于社群的氛围和风气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心理心态。在共同富裕背景下，社群精神风貌进一步向好对人们迈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

3.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国家维度

从国家维度看，能否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与国家精神气象密切相关。国家精神气象，亦可称为国家文化气象，是指国家在文化建设上通过改善文化条件、创设文化环境与推进文化创新，在国家精神文化气质上所表现出来的气度与形象。不同国家的精神气象有所不同，同一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精神气象也有所不同。中国与美国、日本、印度的精神气象差异很大。中国近代与古代的精神气象差异很大，近代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精神气象差异也很大，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国家精神气象因塑造而成，国家精神气象的塑造主要通过物化形态和非物化形态两种形式。物化形态塑造就是中央和地方政府投入财政以改善文化设施、发展文化产业与创造文化产品，为人们的精神富裕提供文化条件和文化环境；非物化形态塑造就是国家发挥全局统筹、政策制定与价值引导的作用，为全社会精神文化建设提供政治方向、价值导向和文化氛围。在共同富裕背景下，国家精神气象的进一步塑造对人民的精神生活起着引领作用。

（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三个维度之间的关系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个人、社群和国家三个维度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共同统一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创建之中。第一，个人精神生活富裕是社群和国家

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前提。社群和国家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离不开每一个人的精神生活富裕，因为人民是由无数个体组成，离开每一个人的群体和全体不存在，离开每一个个人精神生活富裕的群体和全体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也不存在。个人精神生活富裕是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最小单元，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好比一座高楼大厦，个人精神生活富裕好比其中的每个房间。没有个人精神生活富裕，就没有社群和国家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第二，社群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个人精神生活富裕与国家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基础。社群是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组织，它以群体性的风气影响和塑造生活于其中的个体，不存在离开社群的抽象个体。同时，个体精神位态提升对社群精神风貌向好起着积极作用，社群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也离不开个体精神上的创造与贡献。社群是国家与社会的基本单元，人们生活在国家与社会中，具体落实为生活在各种社会群体和社会关系之中。国家精神气象对个体的引导往往通过社群来实现。没有社群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就没有个体精神生活富裕与国家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第三，国家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个人与社群精神生活富裕的保障。国家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体现在国家精神气象上，就是国家在文化建设上改善文化条件、创设文化环境与推进文化创新而展现出非凡的气度与形象。国家精神气象为个人精神位态提升和社群精神风貌向好提供制度保障、政策依据、价值导向、文化环境、文化设施等综合保障。如果没有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领导和文化建设上的创设，个人和社群就难以实现精神生活富裕。同时，个人和群体精神生活的丰富充实也对国家文化气象的进一步建设起到积极作用。

三、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

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要从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三个维度着手，个人精神生活富裕是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首要前提，社群共建共享是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基本路径，国家统筹全局是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

（一）个人精神生活富裕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首要前提

个人精神生活富裕是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首要前提，实现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要从实现个人精神生活富裕做起。个人在新时代应该利用各种社会条件，自觉提升科学文化素养，自觉提升思想道德素养，自觉提升心理健康水平，实现精神生活的自我富裕，进而促进全体人民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1. 自觉提升科学文化素养

科学文化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阶梯，科学文化素养是现代社会人们的必备素养。我国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进，科学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上的重要作用与日俱增。国家和社会一直把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素养作为一项重大任务，人民群众为了自己的物质文化生活质量也应该自觉提升科学文化素养。第一，自觉贯彻终身学习理念。社会发展需要人民群众终身学习。青少年应该接受良好的科学文化教育，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成人应该进一步增长专业知识，并且要不断更新知识结构。老年人应该学习生活必需的知识，以适应社会的发展进步。让学习陪伴人民群众一生，就会让人民群众一生精神富裕。第二，自觉养成读书习惯。读书有助于提升人民群众的人文素养和综合素质。当今社会生活节奏加快，人们被各种快餐文化紧紧包围，很难有时间从容读书。随着我国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推进，人民群众将会有更多的闲暇时间，这为读书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人民群众自觉养成读书习惯，享受读书的乐趣，在读书过程中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使自己成为一个精神富裕的人。

2. 自觉提升思想道德素养

思想道德是一个人的重要素养。一个人的思想道德素养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思想认识、道德品质等方面，而一个人的幸福感往往来源于对自身的道德认同。人民群众为了提高自身的精神生活质量，需要自觉提升思想道德素质。第一，自觉接受和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的主流价值观念，也是指导人民群众的基本价值观念。只有一个人的价值观与全社会的价值观相向而行，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样才可能心情愉悦、幸福满足。第二，自觉提升道德水平。个人的道德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个人的行为方式。每个人对自己的道德水准都可以做到自觉自醒、自我认知、自我批判。未来精神共同富裕社会的建设，需要人民群众具有较高的道德水准，自觉提升道德水平将成为人民群众的精神追求。良好的自我道德修养，将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与满足感。

3. 自觉提升心理健康水平

个人的心理健康与否、健康水平如何，对个人精神生活质量影响很大。当代社会竞争激烈，社会矛盾突出，人们的压力大，心理问题丛生。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推进，既对人民的心理健康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也是对人民心理健康的促进。第一，自觉保持心理平衡。一个人在工作、生活、学习中往往会遇到各种不理想的事情，如果心理素质不够好，会引起心理失衡，给自己和他人造成困扰。所以需要更加自觉关注、察觉自己的心理状态和变化，及时调整心理心态，让自己的心理始终保持平衡。第二，自觉传递正向情绪。在生活中人们的情绪往往互相感染和影响，消极的情绪传递给他人，可能会让他人也变得消极起来，积极的情绪传递给他人，可能会让他人也变得积极起来。随着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建设的推进，人们要增加正向的情绪，同时也要把正向的情绪传递给他人，大家互相传递正向情绪，个人精神生活富裕就会扩展成为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二）社群共建共享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基本路径

社群是人民群众的组织 and 活动单元，在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建设中，社群将成为人民群众精神生活富裕的共同体。人民群众以社群共建共享来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以家庭共建共享实现家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以学校共建共享实现师生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以单位共建共享实现员工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以社区共建共享实现居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以网群共建共享实现网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1. 以家庭共建共享实现家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家庭是一个特殊社群，其以血亲关系为纽带，既是家人生存、繁衍、生活的场所，又是家人之间精神生产、精神塑造的载体。家庭是一个人的精神文化的起源地，对个人精神生活的影响重大而深远。家庭氛围、家风家教对个人生活和思想的影响不言而喻，个人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往往和家庭密切相关。第一，培育优良的家风家教。家庭的家风家教对一个人的成长不容忽视，古代孔子、孟子、岳飞等历史人物的精神养成与其母亲的正确教导、教诲分不开，同样也有很多因家风家教不良而对个人造成负面影响的反面例子。倡导家庭培育优良的家风家教，让家人在人生起步之处就浸润和享受精神富裕。第二，培育和谐的家庭关系。家庭的成员互为家人，家人之间在精神生活上可以实现共建共享。和谐的家庭关系包括和谐的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兄弟关系、婆媳关系、丈婿关系、亲家关系等，对于家庭稳定和家人幸福非常关键。家庭和谐而形成家庭的能量和氛围，对家人的精神心理影响无形而潜移默化。第三，培育富裕的家庭精神文化。家庭精神匮乏则难免家人精神共同匮乏，家庭精神富裕则可能家人精神共同富裕。实现人民精神共同富裕要从家庭迈出第一步，倡导家庭成为创造和传递正能量的社群，倡导家庭成员为家庭贡献精神财富，以家庭共建共享实现家人精神共同富裕。

2. 以学校共建共享实现师生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学校是个人学习成长的社群，基本构成是教师和学生。现代社会中，个人要在学校受教育的时间持续十余年，因而学校教育对个人精神塑造起着重要作用。目前各级学校的基本职能是科学文化教育、思想道德教育以及心理健康教育。随着我国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建设的推进，学校师生将成为精神富裕共同体。未来的各级学校，除了已有教育功能之外，将逐步建设为精神富裕共同体，教师和学生将成为学校精神富裕共同体的基本构成。第一，要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建设作为学校的一项基本工作。各级学校要将校园文化建设、学风建设、校风建设统一纳入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建设，在学校形成自觉创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风气。第二，要建设和谐的校园人际关系。校园人际关系包括师生关系、生生关系、师生关系等，这些关系的和谐有序将提升师生的幸福感和获得感。第三，要在课程

体系中适当设置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内容。要根据各级学校和学生的身心特点,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意识、理念、知识等有机渗透到课程体系中。第四,要将学校建设成为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培育基地和示范基地。学校是传播知识文化的地方,也是实现精神富裕的地方。学校培育和实现师生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本身是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建设的组成部分。同时,因为学校特殊的育人职能,所以学校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对全社会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具有示范作用。

3. 以单位共建共享实现员工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单位是人们工作的社群和组织,是人们的职场根据地。现代社会是工业社会,人们的职业和事业主要通过单位实现。单位的基本关系是职场关系,包括上下级关系、同事关系、员企关系、主雇关系等。单位的主要职能是生产、经营、销售、服务、创造生产力等。在工作单位和职场,人们通过努力和打拼获得劳动报酬或营收盈利,以满足个人及家庭的物质文化消费需要。随着我国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建设的推进,单位将承担起建设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职能。单位是一个职场共同体,未来将成为实现精神生活富裕的共同体。第一,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建设成为单位的一项基本工作。单位不但要满足人民的工作和事业发展需要,还要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要,肩负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职能。第二,单位要营造良好的职场关系。职场关系关乎人的幸福和生活质量,良性的职场关系可以提高人民的幸福感和生活质量。在上下级关系、同事关系、员企关系、主雇关系等关系中形成良性循环,可以保证单位共同体的基本精神生活富裕。第三,单位成为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重要培育基地。将工作单位建设成为员工精神成长的地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共建的地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共享的地方。未来的工作单位将不仅满足人民对物质生活共同富裕的需要,也将满足人民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需要。

4. 以社区共建共享实现居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社区是人民群众的居住区域和场所,是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场所。社区中的主要社会关系有邻里关系、居民关系、业主与物业关系等。社区的主要职能是供人们居住和生活。随着我国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不断推进,社区将逐步承担更多的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培育和建设职能。社区居民在建设和培育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将结成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共同体。第一,社区职能从原有职能扩展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育人基地。社区是人们除工作单位之外的又一主要生活单元,人们工作之外的业余和休闲时间大部分在社区度过。社区是人们社会化的重要场域和步骤,人们在家庭之外的社会生活首先发生在社区,社区是人们从家庭走向社会的中介,人们跨过社区才能进入更加广阔的社会。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能不重视社区的育人功能,今后社区将担负更多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培育职能,让人民群众在社区实现精神生活富裕,为进入更广阔的社会

生活奠定精神文化基础。第二,培育和谐的社区社会关系。在社区,邻里关系、居民关系、业主与物业关系的和谐与否事关人民群众精神生活质量的高低。如果社区建立起良好的社群关系,邻里和睦、居民之间和气、业主与物业和谐,将对和谐社区建设起到帮助和促进作用。第三,营造追求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文化氛围。社区内部人与人之间在精神文化上互相影响和塑造。如果社区营造追求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文化氛围,就会促进居民主动追求精神生活富裕,居民之间互相给予正向影响,最终实现社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5. 以网群共建共享实现网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网群就是网络社群,是人们依托网络建立起来的社会单元和群体。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网群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人们的工作、生活、学习几乎离不开网群。网群的种类和性质丰富多样,每一网群都具有特定的功能,同一网群的人们结成某种特定的关系。网群在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建设必须重视网群。第一,让网群承担起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建设职能。不同的网群有不同的职能,主要满足人们某一方面的物质文化需要。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成为人民群众追求的趋势下,网群作为人民群众重要的交际交流空间,也具有建设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功能,理应承担起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建设职能。第二,让网群成为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网络培育基地。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活动有线上与线下之别,线下各种社群是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培育基地,线上各种网群也是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网络培育基地。利用好网群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培育功能,就可以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培育和建设基地全覆盖,既覆盖人民群众的实体社群,也覆盖人民群众的虚拟社群,这样就可以全过程和全方位地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建设。

(三) 国家统筹全局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

国家对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建设有着特殊作用,能够统筹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建设全局。国家统筹全局是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主要体现在强化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统筹规划、夯实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物质基础、深化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价值引领、营造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文化氛围及建构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话语体系。

1. 强化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统筹规划

国家层面要统筹规划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全局。一是从全局角度进一步定位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在共同富裕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富裕和人民群众精神生活富裕是共同富裕的两个基本点,只有这两个基本点都达成,才是真正的、完整的、以人为本的共同富裕。社会各界在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建设的

实践中,要从全局角度定位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在共同富裕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二是要出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建设方案。由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具有特殊性,很难制定出像远景目标规划和五年计划这样的可量化目标,但是国家制定一个总体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建设方案非常有必要。目前我国人民总体上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如何,在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上哪些方面是比较好的、哪些方面是比较薄弱的,哪些方面和环节需要进一步建设,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建设目标、建设举措和建设步骤,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评价标准,等等,这些基本内容要体现在建设方案之中。三是要建立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建设体系。要统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及生态各个领域来共同达成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建设是一项全体社会的系统工程,不仅仅是文化建设的问题,更是全社会协调发展和有序推进的问题。国家要统筹精神文明建设、文化建设,将已有文化建设机制纳入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建设轨道,建立统一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建设体系。

2. 夯实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物质基础

国家要夯实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共同富裕既是物质生活的共同富裕,也是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二者密不可分,互为条件。人民物质生活共同富裕是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建立在物质生活相对富裕的基础之上。从历史和现实看,个别人的精神生活富裕可以在物质条件极端匮乏的情况下实现,但局限于极少数精神位态、精神境界、精神修养极高的人,绝大多数普通人几乎无法在物质条件匮乏的情况下实现精神生活富裕。无论古代还是当代,社会生活中的确存在极少数“贫而乐”的人,但就社会整体而言,脱离一定的物质条件实现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不现实的。“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社会整体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必须建立在物质相对富裕基础之上。因此,必须夯实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3. 深化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价值引领

国家要深化对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价值引领。国家要在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建设上提供政治方向、价值导向。首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建设,确保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政治方向。我国将要实现的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体现和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我国人民将要实现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将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精神文化有本质区别,也是对历史上中国社会精神文化的传承、转化、发展、超越。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和重要标识。其次,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核心价值观,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要体现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核与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核心价值体系将体现在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各个方面，体现在人民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每个环节和细节之中，同群众的生活与思想融为一体。

4. 营造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文化氛围

国家要营造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文化氛围。国家营造全社会追求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文化气象和文化氛围，让社会呈现出崇尚精神文化和精神财富的气象，营造出追求精神成长和积淀精神财富的文化氛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兴国之要，发展是硬道理，正是因为我国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才在4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正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共同富裕是我们的远景目标。在迈向共同富裕的征程中，全体人民物质生活共同富裕有待于人民群众的奋斗才能变成现实，物质生活共同富裕在国家战略和人民生活中处于中心位置，也是人民群众的自觉追求和奋斗目标。同时，共同富裕既是物质生活的共同富裕，也是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国家要营造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文化氛围，使追求精神财富和精神生活富裕成为一种社会潮流和风尚，引导人民群众把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也作为自觉追求和奋斗目标。

5. 建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话语体系

国家要建构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话语体系。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和物质生活共同富裕是共同富裕的两个基本点，二者缺一不可。就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而言，实现人民物质生活共同富裕对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具有更基础、更本源的作用，没有人民物质生活共同富裕就没有人民共同富裕。当前人们在共同富裕的认知上，对人民物质生活共同富裕重要性的认识比较深刻，但往往对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认识不足、重视不够。目前在话语体系上，物质生活共同富裕拥有独立的话语体系，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从属于物质生活共同富裕话语体系。一般情况下，讨论共同富裕往往仅指物质生活共同富裕或顺带提及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难以在以物质生活共同富裕为中心的共同富裕概念体系中凸显其重要地位。若要提高对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要价值和重要地位的认识，改变目前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从属于物质生活共同富裕话语体系的现状，就必须建立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独立的话语体系、概念体系、理论体系，既要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建设的体制化、体系化，又要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研究的专门化、专业化。

The Connotation, Dimension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Spiritual Common Prosperity

Liu Yong

Abstract: Spiritual common prosperity is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socialism and the important feature and fundamental requirement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Spiritual common prosperity is a social state and development trend, which means that during a certain historical period, social culture boom, social atmosphere is improving, the happiness of the people is constantly increasing, the spiritual realm of the people is constantly improving, and significan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personal physical and mental harmony, human social harmony, and human natural harmony. Such a society is moving towards spiritual common prosperity.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spiritual common prosperity are individuals, communities, and countries, which are both distinct and interconnected, and are collectively unified in the creation of spiritual common prosperity. On the path of achieving spiritual common prosperity, personal spiritual prosperity is the primary prerequisite for people's spiritual common prosperity,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of community is the basic path for people's spiritual common prosperity, and national overall planning is the fundamental guarantee for people's spiritual common prosperity.

Keywords: Spiritual Common Prosperity; Connotation; Dimension; Implementation Path

[责任编辑: 吴文新]

先秦儒家义利观视域下的共同富裕研究^{*}

李圣强 李琳^{**}

【摘要】“义利之辨”历来是儒家的核心论题之一。先秦儒家没有将义与利看作是简单的对立或取舍关系，儒家义利观归根结底体现为一种“义以为上”，义即是为利之获取而设置的道德规范和政治原则。儒家义利观视域下的第三次分配要体现分配正义，第三次分配须着眼于均衡而不是平均，“富而教之”是第三次分配内化为道德自律的重要路径。儒家义利观强调社会的整体利益，把整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共同富裕思想是对“大同”社会理想和儒家义利观的传承性创新，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系统性路径，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关键词】儒家义利观；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

“义利之辨”历来是儒家的核心论题之一。朱熹说：“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朱子全书》）程颐指出：“孟子辨舜、跖之分，只在义利之间。”（《二程集》）南宋张栻说：“学者潜心孔孟，必得其门而入，愚以为莫先于义利之辨。”（《孟子讲义序》）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了司马迁对孟子义利之辨的感想：“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太史公在此明确指出，义利价值观关乎国家治乱之根源。《淮南子·汜论训》谓：“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太史公论六家之要旨曰：“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儒学乃履践性极强的政治哲学，参与国家治理是儒家与生俱来之使命。儒家之所以重视义利之辨，是因为

^{*} 本文系山东省社科联2023年度人文社会科学课题合作专项高校德育教育研究专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批判性思维课程论证式案例教学研究”（课题编号：2023—DYZX—25）阶段性成果。

^{**} 李圣强，中国哲学博士，潍坊科技学院农圣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传统文化；李琳，管理学硕士，潍坊科技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传统文化。

儒家认为义利价值观的建构关乎治国理民之要务，与儒家“救天下之弊”“务为治”的志向抱负紧密相关。陈来先生认为，“这个义利观作为价值观，它是贯通在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次……既是治国理政的价值观，又是社会关系的价值观，也是人生道德选择的价值观”^①。

一、先秦儒家义利观

不同时代的儒家对“义利之辨”提出了不尽相同的主张，但其基本精神与以孔子、孟子和荀子等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精神联系。历代儒家论先秦儒家之义利观，辨析最多的就是孔孟荀关于义利之论断，即孔子提出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孟子反驳梁惠王的“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荀子的“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等，即把义与利放在或对立，或二者取舍其一，或二者孰轻孰重的角度论之。“自孟子以后，儒学的义利之辨越来越突出道德伦理的绝对价值，在很多情况下将物质利益置于道德的对立面。”^②

但是，如果把孟子与梁惠王的对话放在“礼崩乐坏”之现实环境下、治国理政之高度上来分析，义与利应该不是简单的对立或取舍关系。孟子在各诸侯国“礼崩乐坏”且纷纷逐利之常态下说“亦有仁义而已矣”，不是局限于与梁惠王讨论“义”与“利”孰轻孰重，而是给逐利之行为设置了一个称之为“义”的伦理规范和政治原则。孟子所阐明的儒家先义后利的价值观，就对象而言，主要指向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指向官员，而不是针对民众。尤其是义利之辨所引申的公私之辨，主要针对的是承担公共事务责任的官员。对于民众，儒家始终强调“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肯定民众利欲需求的合理性。孟子的仁政王道思想以此为基础，强调民众的合理利欲需求。“所以在孟子思想中强调义利之辨和重视民欲民利是没有对立的。”^③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其中的“义”就是指统治者行使政治权利需要遵守的伦理规范与政治原则。儒家“义利之辨”归根结底体现为一种“义以为上”（《论语·阳货》），“义”即为利之获取而设置的道德规范和政治原则。此道德规范和政治原则具体而言就是强调国家、社会的整体利

^① 陈来：《孟子辨义利思想的现代价值——“大家对话——义与利”之一》，《博览群书》2020年第8期。

^② 李军时：《马克思主义哲学道德观视域下的儒学义利之辨》，《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③ 陈来：《孟子辨义利思想的现代价值——“大家对话——义与利”之一》，《博览群书》2020年第8期。

益,把整体利益置于个人或局部利益之上。所以说,孟子与梁惠王的这段对话实际上也是从治国理民的角度强调正确的义利价值观之建构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

儒家义利观彰显了儒家对“大同社会”理想社会模式的政治追求。何为“义”?何为“利”?孔子在“大同社会”理想社会模式中描绘得很具体、很清楚。“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礼记·礼运》)这就是为逐利行为设置的具体伦理规范。在“义”的约束与规范之下,理想社会模式的“利”就是:“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睦。”(《礼记·礼运》)《系辞传》亦曰:“崇高莫大乎富贵。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儒家将人民和国家的富有看作是最高的事业,儒家义利观立足于人类社会总体和谐发展之高度,追求的是“公利”,是“义”,具体而言就是:国家和人民富有,社会和谐有序。儒学宏大的义利价值观,应该是儒学历久弥新、被历朝历代奉为治国理政之圭臬的原因之一。

“以义求利”确定了利之获取的价值标准和行为原则,但并没有否认物质利益在维系人们生存和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地位。“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见利思义”(《论语·宪问》),这些都表明孔子没有反对民众追求富裕,反对的是忽视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而一味谋求私利的行为,“义”是为利益追求设置的一个道德界限。《孟子》开篇言“义利之辨”,孟子最后的结论是“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孟子·梁惠王上》)、“怀仁义以相接也”(《孟子·告子下》);荀子则讲“先义而后利者荣”(《荀子·荣辱》)、“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荀子·大略》)。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社会,如果对利益的追求没有道德规范来约束,就会导致这个社会各阶层陷入无休止的利益争夺之中。

先秦儒家视“德治”为治权合法性的核心要素。^①儒家圣贤历来追求“道洽政治,泽润生民”(《尚书·毕命》)的理想,认为只有给民众带来福泽的政治才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先秦儒家将“义”设置为关乎治权合法性的伦理原则和政治原则,先秦儒家义利观体现的是儒家对理想政治的追求,体现的是对“大同社会”理想社会模式的追求。“马克思主义哲学道德观和儒学义利之辨都强调社会的整体利益,把整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②

① 参见李圣强:《〈周易〉经传德治思想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0年。

② 李军时:《马克思主义哲学道德观视域下的儒学义利之辨》,《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二、共同富裕思想是对儒家义利观的传承性创新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称《决议》）指出，“党中央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突出优势，是我们站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文化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系列重要论述凸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对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意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精神力量，文化复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表征之一。传统文化唯有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才能推陈出新，才能契合时代需求，才能回应时代挑战，才能彰显与时俱进的时代价值。

《决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新时代，“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传承转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要扎扎实实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各环节”^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始终坚定人民立场，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⑤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要求切实坚持人民根本利益至上的原则。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强调，全党必须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小康”承载着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孜孜追求的美好生活愿望，习近平总书记把全面脱贫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小康’这个概念，就出自《礼记·礼运》，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追求的理想社会状态。使用‘小康’这个概念来确立中国的发展目标，既符合中国发展实际，也容易得到最广大人民理

①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46 页。

②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6 页。

③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24 页。

④ 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127 页。

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4 卷，外文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133 页。

解和支持”^①。《礼记·礼运》描述了“大同社会”理想社会模式，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共同富裕与“大同”社会追求是相通的，与儒家义利观也是相通的，“共享大同是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的理想”^②。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自古以来我国人民的一个基本理想”^③。通过消除贫困、共享发展达到共同富裕，是对“大同”社会理想和儒家义利观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共同富裕的传统价值观推向了新的境界。

2018年出席中非企业家大会开幕式时，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题为《共同迈向富裕之路》的演讲，强调要支持非洲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2019年，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惠民利民、安民富民是中华文明鲜明的价值导向”^④。“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安民”“富民”是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执政规律，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社会主义中国要达到的最终目标，同样是世界各国谋求发展的需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以来就有“兼济天下”“天下为公”“协和万邦”“万国咸宁”的追求，中华文化中关于“世界大同”的追求蕴含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萌芽，为今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具有实践意义的文化资源、思想资源、哲学资源。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的系统性实现路径将为建构与维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价值导向和中国方案。中国共同富裕的系统性实现路径打破了西方模式一统天下的“神话”，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式现代化富裕、幸福、均衡、文明、和谐的民生画卷。

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实践性生成逻辑，也有文化生成逻辑。前者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后者则是马克思主义与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长期探索和奋斗中取得的伟大成果。儒家视国家和人民富有为崇高的事业，有着非常清晰的“庶而富之，富而教之”的富民逻辑。中国式现代化是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实现过程将为人类整体意识的确立、人类困境的解答提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资源和实践经验，为人类社会由工业文明迈向生态文明历史进程中重大问题的解决提供中国方案。

三、儒家义利观视域下的第三次分配

“儒家讲的义最初就是合理分配的制度、规则。就人类社会的共同生活而言，

①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83页。

②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110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214页。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471页。

物质利益与关于物质利益的合宜分配制度的义，这两者都是不可缺少的。”^① 先秦儒家义利观蕴含着分配正义的思想，以儒家为代表的思想家群体对何为分配正义、社会分配的原则是什么以及如何实现分配正义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思考。

（一）儒家义利观的分配正义思想

“儒家的义利之辨与‘大同’理想中的‘天下为公’在逻辑上具有一致之处：儒家的义利观希望人们重视公义，以公义为动机来安排自己的行为；而‘天下为公’同样要求人们从动机上要以‘公’为方向，只有人人都为‘公’，天下才能真正属于‘公’，而不是一家一姓之天下。可见，义利之辨中的公义高于私利，大同理想中的‘私’让位于‘公’，都是以公共性优先作为指导性原则所作的价值选择。质言之，‘大同’理想与儒家的义利观一样，都是人们将‘如何更好地成全公共生活’作为自己过好私人生活的前提性思考。”^② 从一定意义上讲，义利之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公私之辨，故而程颐说：“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二程集》）陆九渊也从反向来说：“又曰公私，其实即义利也。”（《陆九渊集》）凡涉及群己关系、公私之辨的话题，儒家之义利价值观大多倾向于约束个体的部分利益来成全他人或公共利益。儒家义利观彰显了公共性优先原则，“大同社会”的理想社会模式彰显了共同体的存在是个体存在的基础，儒家所强调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彰显了一种公共性优先的逻辑理路，公共性优先的原则正是儒家思想的特质所在。当然，儒家义利观视域中“公—私”也是相对的、辩证的关系。陈来认为：“‘公’是超出私人的、指向更大社群的利益的价值。如个人是私、家庭是公；家庭是私、国家是公，等等。社群的公、国家社稷的公是更大的公，最大的公是天下的公道、公平、公益，故说‘天下为公’。”^③

先秦儒家义利观的基础在于社会性，在社会性的公共生活中，所有人都需要让渡部分自己的利益来实现社会的均衡与和谐。当然，利益包括但不限于财富，儒家既强调保护利益创造者的权利，又重视用合理的分配制度来分配利益。儒家一方面强调“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另一方面又强调“为仁由己”，即个人的价值自觉，也即道德自律。道德自律，是以德性的要求作为人之所以为人的安身立命之本的精神追求。儒家追求的就是一种基于道德自律的“公平”和合理的“秩序”，合起来就是指“公平”的“秩序”。

① 李祥俊：《儒家义利之辨的概念含义、问题层次与价值取向》，《学习与实践》2019年第1期。

② 朱承：《义利之辨与儒家公共性思想的展开》，《哲学动态》2019年第5期。

③ 陈来：《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55页。

“宋明理学提倡‘存天理、灭人欲’，主张人们克制私欲、成就大公，其实质就是倡导人们适当放弃个体的利益以达成公共正义，成全普遍之‘理’，落实普遍‘良知’，最终促成公共之善，而个体在公共之善的实现中同时也实现了自己的价值。”^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强调在追求自己个人利益的过程中兼顾和成全他人及群体的利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强调取之有道，不以伤害他人及群体利益为底线。中国文化的以人为本，不是主张以个人为本，而是强调以群体为本，所以在价值上群体是高于个人的。^②

（二）共同富裕须着眼于均衡而不是平均

孔子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余英时先生释之曰：“‘和’不是整齐划一，‘君子和不同’，所以‘和’首先肯定了人有不同。‘均’也不是机械的平均，而是均衡。”^③

共同富裕不是简单的财富平均分配，而是要在全社会营造自强上进、劳动光荣的社会风气。针对一些贫困群众“等、靠、要”思想严重以及争戴“贫困帽”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幸福是奋斗出来的，脱贫致富不能等靠要，既然党的政策好，就要努力向前跑。”^④共同富裕不是同等富裕、不是无差别的平均富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上有一些人说，目前贫富差距是主要矛盾，因此‘分好蛋糕比做大蛋糕更重要’，主张分配优先于发展。这种说法不符合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⑤共同富裕不是简单的“均贫富”，也不是过度福利，更不是所有地区、所有人都同时达到一个标准的富裕。“均贫富”和过度福利均会影响效率与公平的兼顾，进而影响发展的原动力。

（三）“宜”是儒家分配正义思想的鲜明特质

《礼记·中庸》说：“义者，宜也。”先秦儒家义利观认为，作为道德范畴的“义”就是适宜、正当。《文言》曰：“‘利者’，义之和。”朱熹揭示说：“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其宜，不相妨害。”（《朱子全书》）“宜”就是儒家分配正义思想的鲜明特质。“《梁惠王上》更注重从治国理政，从政治关系来强调义利关系正确解决的重要性。但是《告子下》这一段，他把义利问题更加社会化，更

① 朱承：《义利之辨与儒家公共性思想的展开》，《哲学动态》2019年第5期。

② 参见陈来：《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54页。

③ 余英时：《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

④ 石羚：《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人民日报》2019年6月3日。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2页。

加普遍化,成为人与人相处的普遍原则。”^①从治国理政着眼的社会价值观建设,不会否认市场经济有其法则,而是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警惕市场法则侵入家庭、学校、团体和社会,变成人与人关系的普遍法则。也可以说,正是由于市场经济有一种力量力图跨界而影响整个社会,所以更需要有另外一种力量来驾驭它。我们不反对“利”的合理取得,我们支持正确“义利观”基础上的义利双行、义利兼得,但是我们也应该警惕资本以遵守市场经济法则为借口在民生领域(如教育、医疗)、国防及安全领域的无序扩张和野蛮侵蚀,经济领域范围内的利益追求不能泛化到社会各个领域,不能无视社会的整体利益。

(四)“富而教之”是第三次分配内化为道德自律的重要路径

“富而教之”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齐民要术》序言中引用《诗经》和《尚书》的记载曰:“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论语·子路》记有孔子对“富民”的态度:“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孔子与冉有的对话说明,民众富裕的同时要对他们进行道德教育和文化教育。

“富而教之”的重点在乡村,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教而富之,是农民安居乐业、社会有序发展的重要路径。扶贫不是慈善救济,要“引导和支持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依靠自己的双手开创美好明天”^②。主张通过教化以使人民富起来的“教民致富”思想,实际上是儒学“富而教之”思想在农业生产领域的具体呈现。“取地之财而节用焉,抚教万民而利海之”(《孔子家语》),乡村振兴可以借鉴儒家采取的劝教之策,劝农耕织,教民富庶。《论语·先进》载:“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孔子反对卿大夫一级统治者无限度地聚敛财富。“富而教之”也包括对先富者的教育,第三次分配要重视对先富者的义利观教育,要发挥道德文化的内在驱动力。“富而教之”是第三次分配内化为道德自律的重要路径,其重点在鼓励社会资本、民间力量自愿投入民间捐赠、慈善事业等,起到改善分配结构的补充作用,有利于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有利于打破一些部门和行业的垄断,有利于扼制资本过度扩张和渗透。同时,发展是解决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第三次分配就是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使发展成果更具有全社会的普惠性。因此可以说,作为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安

^① 陈来:《孟子辨义利思想的现代价值——“大家对话——义与利”之一》,《博览群书》2020年第8期。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85页。

排,第三次分配既强调保护利益创造者的权利,又重视用合理的分配制度来分配利益,维护社会稳定。这也意味着,就主动让渡部分利益以成就公义、成就良好的公共生活而言,儒家的义利观依然具有现实的生命力。

四、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系统性路径

我们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物质生活脱贫,但在人的素质的全面提升、制度建设、法治水平、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塑方面,距离一个“更加文明更加富强的”目标尚有很大差距。四十多年来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王学典先生把它概括为“不加约束和控制的发展主义”^①。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下一阶段具体的、清晰的奋斗目标就是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大报告庄严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重要特征,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系统性路径。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并指出这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发展的战略目标。现代化经济体系主要体现了高度的系统性和生态性,它牵涉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唯有坚持系统性思维,才能推动高质量发展,进而实现共同富裕。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人民和国家的富有看作是崇高的事业,共同富裕思想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性创新。共同富裕需要经济、社会、自然环境等各要素的共同支撑,实现共同富裕离不开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才能打牢共同富裕的文化基础、产业基础、经济基础、物质基础,它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系统性路径。共同富裕与高质量发展密不可分,高质量发展才能保证共同富裕的可持续性。

共同富裕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民生问题的方方面面,既包括衣食住行等物质财富,又包括教育、文化、获得感、幸福感等精神财富,更体现在就业、医疗、养老等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每个方面均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宏伟目标的最终实现靠的是高质量发展及其扎扎实实的发展成果。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只有高质量发展才能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高质量发展体现了发展的系统性、协调性、平衡性,是加强共同富裕整体性推进的系统性路径,其系统性体现在几个重要维度。

第一,高质量发展要充分认识到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目标任务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经济发展新常态所需要的发展动力和创新动力,数量型、外向型、粗放型的传统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转换过程中要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社会新矛盾增多、“三期叠加”、区域发展不均衡

^① 王学典:《全党工作重心的第四次转移与文化自信的提出》,《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等复杂局面。这些情况说明，共同富裕的实现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实现共同富裕必然要经过长期面对各种风险与挑战的历史进程。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提出，“实现共同富裕，要统筹考虑需要和可能，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循序渐进”^①。共同富裕这一目标任务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唯有高质量发展这一系统性路径才能真正克服。

第二，高质量发展要认识到共同富裕这一目标任务的全面性和全局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核心和落脚点就在于“全面”二字。共同富裕的特征就是不让任何人在脱贫致富的道路上掉队，需要做好各个领域、各个区域、各个民族全过程的协调推进。共同富裕是全社会的事，不是一部分人的事情，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不仅仅是物质生活的富裕，也包括精神生活的富裕。儒家义利观强调社会的整体利益，把整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共同富裕是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必须体现出共同性和全面性，也就是说，每个贫困地区、每个贫困群众、每个民族都富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作为远景目标提出来，并制定了促进共同富裕的具体行动纲要。

第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决议》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共同富裕不仅仅是一个口号，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真实可感的事实。”^②社会保障是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兜底网，作为促进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最后一道防线，对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起到重要的常态化兜底作用。要从实际出发，不断适应新变化，切实托住社会保障这个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履行好保基本、保底线、保民生的兜底责任。”^③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教育等就是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最关切的与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直接相关的兜底性民生问题。

群众是否具备国际尊严也是影响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因素，这就要求共同富裕的实现应具备全球性视野。我国近代的屈辱史和当今发展的全球化告诉我们，做好中国的事情必须树立世界眼光，要把新时代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愿景和远景放到全球视野中来谋划。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构建世界各国同呼吸、共命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消除各个国家的贫穷落后，使全世界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共享富足安康。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171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171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63页。

第四,绿色发展、与自然和谐相处是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基础性理念,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并非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是和谐共生、和谐统一的关系。都江堰水利工程完美地诠释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和谐双赢,既维系了自然生态的平衡,又满足了人类生产和生活的需求,是古人在处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问题上的典型代表。2021年9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全面小康》白皮书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是全面小康最亮丽的底色。《决议》强调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要“更加自觉地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①。

第五,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都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孔子高度评价“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的国家治理思维,主张遂民之欲、足民之求、兴民之利、去民之害、“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倡导“足食”“足兵”,洋溢着对庶民物质利益的关心与人道精神。孟子也告诫统治者从己之所欲所乐推广到民之所欲所乐,他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

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共同富裕一直是党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六中全会再次强调“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实践主体。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高质量发展的动力、进程、目的都要体现出人民主体性。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一定是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历史进程,是人的全面发展和所有人全面发展的历史进程,“人民至上”是这一历史进程中最鲜明的价值取向。高质量发展有丰富的路径与实践方式,无论哪种路径与方式,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都要贯穿于高质量发展的方方面面,使人的全面发展的内涵不断丰富。高质量发展的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诉求,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在“以人民为中心”这一点上是统一的、一致的。

^①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51页。

A Study of Common Prosper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re Qin Confucianists' View of Justice and Benefit

Li Shengqiang Li Lin

Abstract: “The debate between justice and benefit” has always been one of the core topics of Confucianism. The third distribution under the Confucian concept of justice and benefit should reflect the distribution justice. The third distribution should focus on balance rather than average. “Rich but educated” is an important path for the internalization of the third distribution into moral self-discipline. The Confucian values of justice and benefit emphasize the overall interests of the society and put the overall interests above the personal interests.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is a systematic path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Keywords: Confucian Concept of Justice and Benefit; Common Prosperity;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李谷悦]

论毛泽东的中医药观及其哲学基础^{*}

马晓慧 程 旺^{**}

【摘 要】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特色组成部分，毛泽东中医药观实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结合的理论典范。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立场，提出“团结中西医”的工作方针与“中西医结合”的发展理念；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为指引，强调中医药批判继承与创新发展的相统一；以唯物史观为价值向度，始终立足人民发展中医药，提出从文化遗产角度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从哲学原理的角度深化对毛泽东中医药观的理解和研究，有助于推进对毛泽东中医药论述思想精义的透彻理解，有助于深入领会马克思主义中医药观的立场观点方法，更好地为新时代“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提供理论思路。

【关键词】毛泽东；中医药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医药学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①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与奠基人，他在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进程中对中医药给予了极大关注和高度评价，对今天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仍具有重大的指导价值。他以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哲思与远见确立了“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的历史定位，创造性地提出“团结中西医”“中西医合作”的工作方针及“中西医结合”“发展中国的医药科学”的发展理念，在中医药实践中坚持人民立场，在中医药文化发展中坚持传承性与创新性的辩证统一，为中医药事业的现代化发展开辟了道路。以往关于毛泽东中医药观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其理论脉络、历史背景、思想贡献及其当代价值等

^{*} 本文系2022年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22JDSZK164）、北京中医药大学“解码中医”揭榜挂帅重点项目（2022-JYB-JBRW-009）阶段性成果。

^{**} 马晓慧，北京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程旺，北京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6页。

方面，而少有从哲学基础层面去深探其中医药观的理论渊源及生成机制。^①毛泽东是非常善于哲学运思的理论家，深入探究其中医药观背后内蕴的哲学原理根基，对于透彻理解毛泽东中医药思想论述的思想精义、深入领会马克思主义中医药观的立场观点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一、“团结中西医”：实事求是与实践检验

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已经关注到中医中药问题。他从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出发，认识到中医药的使用是解决战时医疗资源不足的重要途径，并首次提出“中西两法治疗”的实践方案和“团结中西医”的工作方针。中医药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成功实践以及长期以来对维护和增进我国人民身体健康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坚定了毛泽东对中医药的信任，肯定了中医药的科学性。可以说，毛泽东是站在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立场看待与评价中医药的。

（一）实事求是认识和发展中医药的思想方法

实事求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主要内容。从内涵上讲，实事求是既指唯物论基础上的一切从实际出发，也指唯物史观基础上的一切从基本国情出发。毛泽东关于重视与发展中医药的相关论断，是建立在实事求是的观察与分析基础之上的正确论断。他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国情现实与中医药发展现状提出不同的工作方案与战略方针。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便开始关注中医药问题，当时低下的医疗卫生水平与根据地被封锁围堵所导致的医药奇缺现状，迫使他提出“医院设在山上”，以便于利用井冈山上的丰富物产就地取材自制中草药土方。在当时缺医少药的困境之下，中医药作为一种治病救人的方案进入毛泽东的视野。他强调“草医草药要重视起来”，并在实践层面首次明确提出“中西两法治疗”^②，本质是为了解决伤病战士的医疗问题与保证根据地人民身体健康的现实需要^③，体现了一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现实关切。延安时期，随着医疗队伍的壮大，中西医之间出现相互歧视的普遍问题。面对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医学冲突，毛泽东意识到处理好中西医关系问题不仅是医疗卫生工作的内容，也是团结组织群众工作的重要内容，由此他强调“这两种医生要合作”，并逐步确立了“中西医合

① 参见马晓慧、程旺：《从哲学角度看毛泽东为何重视中医药》，《中国中医药报》2023年4月28日。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页。

③ 1933年11月，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一文中指出：“疾病是苏区中一大仇敌，因为它减弱我们的革命力量。如长冈乡一样，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0页）由此可见，这一时期毛泽东关注的首要问题是革命力量的保存与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在有限的条件下做好医疗卫生工作是其有力保障。

作”的方针。^①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西医少,广大人民迫切需要,在目前是依靠中医”^②的现实国情,提出“必须很好地团结中医,提高中医,搞好中医工作,才能担负起几亿人口的艰巨卫生工作任务”^③。在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上,毛泽东根据医疗卫生事业建设与发展的需求,确定“团结中西医”为卫生工作的重要方针。同时,他提出“团结中医的目的,是为了发展中国医药科学”^④,并开始有意识地推动中医药纳入国家公共卫生体系以谋求中医药的发展。从“中西两法治疗”的实践方式到“团结中西医”的工作方针,从治病救人的方案到发展中国医药科学,毛泽东对于中医药定位与发展的相关论述始终都围绕现实需求与具体国情而展开。国情这个最大的“实际”是毛泽东中医药观的基本出发点,也是其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具体体现。

(二) 实践是检验中医药有效性与科学性的标准

毛泽东对中医药情有独钟,长期以来他所经历与见证的中医药成功实践进一步加深了他对中医药的肯定,逐步形成了中国医药学是科学的认识。毛泽东一生有多次中医药治疗疾病的亲身经历,尤其是他力排众议接受著名中医李鼎铭为他治愈关节炎与胃病的事迹为人所熟知,这些中医临床实践经历奠定了他对中医药的信任。革命时期充分发挥中医中药的作用开展军民伤病救治的实践,让毛泽东见证了中医药临床实践的有效性,更加增强了他对中医药的信心。1953年12月,毛泽东在听取时任卫生部副部长贺诚汇报工作时认为:“中医的金、木、水、火、土是不合理的,西医说大脑、小脑、细胞、细菌是科学的。什么是科学?有系统的、正确的知识,这才是科学。”^⑤1955年4月,毛泽东与针灸专家朱璉谈话时提出:“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是科学的。”^⑥1954年,毛泽东明确指示要建立中医研究机构;1959年底,中国中医研究院正式成立。1959年,《人民日报》社论明确提出:“在我国的医药学遗产里面,有大量的具有科学性的精华,我们必须把这些精华认真地吸收起来。”^⑦可以说,毛泽东关于中医药是科学的肯定与评价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真理性认识,体现了毛泽东重现实、重实践的哲学观。

① 1944年5月24日,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提出“这两种医生要合作”,被视为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提出“中西医合作”的方针。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5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5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58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5~206页。

⑥ 韩洪洪:《毛泽东:把中医提到对全世界有贡献的高度》,《中国中医药报》2014年11月19日。

⑦ 《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人民日报》1959年1月25日。

早在1913年,青年毛泽东受湖湘学派注重经世务实学风的熏陶与感染,在《讲堂录》的笔记本中记载“心知不能行,谈之不过动听,不如默尔为愈”^①,体现了他早期“行重于知”的知行观。1937年,毛泽东融合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中国传统知行观撰写《实践论》,深刻分析了实践的直接现实性,认为“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②,明确提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③。以实践为基础验证认识的真理性,是实事求是原则在认识论上的基本要求,也成为毛泽东判定中医药价值的重要标准。延安时期,面对中西医宗派之争的问题,他指出:“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作用都是要治好病。治不好病还有医术问题,不能因为治不好病就不赞成中医或者不赞成西医。能把娃娃养大,把生病的人治好,中医我们奖励,西医我们也奖励。”^④这也再次从实践角度强调“中西医合作”的必要性。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医不科学”“中医中药没有科学根据”等观点还有一定社会影响。面对祖国医学被轻视与排斥的现状,毛泽东提出“看不起中医是不对的”,“中西医比较起来,中医有几千年的历史,而西医传入中国不过几十年,直到今天我国人民疾病诊疗仍靠中医的仍占五万万以上,依靠西医的则仅数千万(而且多半在城市里)。因此,若就中国有史以来的卫生教育事业来说,中医的贡献与功劳是很大的”。^⑤他肯定了中医药在我国人民卫生保健工作中的伟大贡献,并进一步要求贯彻中央关于“团结中西医”的指示,在实践中纠正人们对于中医药的偏见、发展中医药。毛泽东个人接受中医诊治的愈疾经历与中医药在国家卫生事业中的成功实践以一种直接现实的方式验证了中医药的有效性与科学性,证明了毛泽东“中医中药好”论断的正确性,为此后他持续推动发展中医药的相关论述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中国医药学是古人在2000多年的实践积累与理论淬炼中形成的对人类生命现象的规律性认识,其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一直承担着国人疾病治疗、强身健体的重要职责。毛泽东尊重历史事实、立足国情,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创造性地提出“团结中西医”的工作方针,坚定不移地肯定并支持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体现了一代领导人实事求是的哲学自觉与坚定的文化自信。当前,随着科技进步与现代医学的发展,中医药的处境也发生了深刻变化,这要求我们须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认识到中医药的独特优势与作用,尤其是要肯定近些年中医药在我国疫情防控中发挥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新形势下坚持“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⑥,坚持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8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4页。

⑤ 游和平:《毛泽东对中医药情有独钟》,《党史博览》2007年第11期。

⑥ 习近平:《构建起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 为维护人民健康提供有力保障》,《求知》2020年第10期。

“传承精华，守正创新”，走一条可持续的中医药发展之路。

二、“中西医结合”：批判继承与辩证发展

毛泽东立足国情与现实，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提出“团结中西医”的工作方针，将中医药的地位与价值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同时，他也辩证地看到中医药的历史局限性，认识到中西医各有所长、各有所失，主张以西方近代科学研究与发展中医药，对中医药进行辩证地总结与继承，并由此正式提出“中西医结合”的理念。毛泽东主张在批判继承中辩证发展中医药，为此后中国医药学的传承、创新与发展指明了方向。

（一）以辩证的态度批判地继承中医药

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方法，它“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①，主张从多视角、多维度综合批判地考察事物的内在矛盾、基本关系及其发展规律。毛泽东自觉运用辩证法全面真实地看待中医药的继承与发展问题，在正确处理中医药的肯定性因素与局限性、中西医的得失问题等方面，彰显了辩证法的思维特质。首先，面对学界评价中医的各种声音，毛泽东充分肯定中医药作为古代传统文化精华的价值与贡献：“我们中国如果说有东西贡献全世界，我看中医是一项。”^②他旗帜鲜明地强调：“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③面对中医经验无法得到有效研究与推广的现状，毛泽东作出指示：“中国医学的经验是很丰富的，它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要有同志去整理它”，“针灸是中医里面的精华之精华，要好好地推广、研究，它将来的前途很广”。^④毛泽东对中药、中医典籍也非常重视，专门作出重要批示：“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与发展，我国中药有几千年的历史，是祖国极宝贵的财富，如果任其衰落下去，那是我们的罪过。中医书籍应进行整理。应组织有学问的中医，有计划有重点地先将某些有用的，从古文译成现代文，时机成熟时应组织他们结合自己的经验编出一套系统的中医医书来。”^⑤毛泽东重视中医药，要求总结中医药经验、继承与保护中医药典籍，这是对中医药的积极传承与肯定。同时，他也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到了中医药的历史局限

① 马克思：《资本论》（节选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7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5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62页。

④ 韩洪洪：《毛泽东：把中医提到对全世界有贡献的高度》，《中国中医药报》2014年11月19日。

⑤ 华钟甫、梁峻编著：《中国中医研究院院史》，中医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

性：“中医是在农业与手工业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①，它奠基于古代朴素唯物论，含有古代朴素辩证法思想的所有弱点，“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还不可能有完备的理论，因而不能完全解释宇宙”^②。因而“看不起中医是错误的。把中医提得过高了，也是不适当的”^③。毛泽东最终立足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指出我们必须批判地接受这份遗产，“把其积极的一面吸收过来加以发挥，使它科学化；另一面，对不合理的要研究、分析批判”^④。其次，对于中西医的长短得失问题，毛泽东也进行了辩证分析。他在《讲堂录》中谈道：“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专求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⑤因而，对新中国的医药事业发展而言，“必须要有西医参加，也要吸收有经验的中医，靠单方面是不够的，单有西医没有中医不行，有中医没有西医也不行”^⑥。同时，基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医疗实际以及对中西医学的辩证理解，毛泽东严厉批驳了将中医视为“封建医”的错误提法以及“限制和排挤中医”的种种举措，态度鲜明且决断地纠偏“中学西”，并重新确定“西学中”的卫生工作方针，保证了“中西医结合”研究与实践的切实开展。总之，在辩证认识中医药自身的肯定因素与否定因素、中西医各自理论得失的基础上，毛泽东将“团结中西医”的实践方针进一步提升到“中西医结合”的理论层面，实现了从实践到认识再到新的实践的双重飞跃，为未来我们如何全面正确地认识和发展中医药事业指明了方向。

（二）在批判继承中发展中国新医药学

辩证法的本质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这表明辩证法反对安于现状，而是包含着现存事物自我否定、不断发展、超越自身的内在逻辑，即辩证法对一切既成的形态都要求从不断运动与变化发展中去理解，从而以一种发展的新范式去容纳和保存旧范式中的所有积极成果。毛泽东从辩证发展的角度寻求中医药继承与保护的途径，他提出“中西医结合”的思想是为了在发展中保存与发扬中医药的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3页。

③ 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讨会组织委员会编：《毛泽东百周年纪念——全国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中），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93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5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97页。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58页。

积极因素,从而探求一条合理的中医药现代化之路。^①毛泽东认为中医药疗效突出,但“中医问题,不只是给几个人看好病的问题,而是文化遗产问题”^②。我们要继承好这份文化遗产就需要尊重中医、学习中医、研究中医、提高中医,在继承中完成中医药的创新,发展统一的中国新医学、新药学,“把中医提高到对全世界有贡献的问题”^③。毛泽东对于中医药发展工作作出指示:“要根据现代科学的理论,用科学方法来整理中医学的学理和总结它的临床经验,吸取它的精华,去掉它的糟粕,使它逐渐和现代医学科学合流,成为现代医学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④对于“合流”过程中中西医的矛盾地位,毛泽东也有着辩证的思考。他认识到“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⑤,提出我们“接受外来思想,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照搬,而必须根据具体条件加以采用,使之适合中国的实际”^⑥,从而“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⑦。就医学而言,是“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⑧,用中国人自己的头脑思考,在中医的土壤中“发展中国的新医学”。中药研究同样需要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毛泽东认为掌握中药也要有西医参与,也可以用化学方法,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忽视中医药整体观的基础。对中医药进行批判地总结与继承,是毛泽东中医药观的起点,在此基础上他以一种开放的态度提出“中西医结合”理念,在动态辩证中谋求中医药创新发展之路。

毛泽东以辩证的哲学思维敏锐地捕捉到中西医之得失短长,认为没有哪一种“医道”可以完全垄断医学真理,并由此提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必须要有西医与现代科学的参与,在“中西医结合”理念的指引下走出一条中国医学的现代化之路。毛泽东对中医药的合理定位以及对中西医关系的辩证认识重塑了近代以来国人对中医药的信心,开启了中医药融入现代医疗卫生体系的新格局。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到“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促进中医药更好地服务健康中国战略;强调“坚持中西医并重”“中西医药相互补充”,以“传承

① 1954年7月,毛泽东对中医工作的指示“必须把中医重视起来……团结中医的目的,是为了发展中国医药科学”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45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45页。

④ 《贯彻对待中医的正确政策》,《人民日报》1954年10月20日。

⑤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2页。

⑥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2页。

⑦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8页。

⑧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8页。

发展中医药事业”^①，“让中医药走向世界”^②，这正是对毛泽东中医药观的坚持与发展。

三、“重视中医”：人民立场与文化遗产

中医药的历史发展始终关涉医学与文化两个面向，毛泽东也始终立足于医学与文化这两个视角关注中医药的继承与发展。作为一门医学，它是中国古代几千年医学实践的经验总结与理论凝结，是中国几亿劳动人民的健康所系；作为一种文化，它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与文化自信工作的必要构成部分，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这体现了毛泽东中医药观的人民立场与高瞻远瞩的文化视角。

（一）发展中医药坚持人民立场

马克思指出，从事物质生产生活的“现实的人”是历史的经常的前提，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社会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至上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出发点与归宿。“中医问题，关系到几亿劳动人民防治疾病的问题”^③，毛泽东始终站在人民立场指导中医药事业的继承与发展。首先，毛泽东对中医药的支持和弘扬是出于人民卫生健康事业的需要。他曾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谈道：“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④以此为标准衡量当时边区的医疗状况，他认识到“仅仅依靠新医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⑤，必须“重视中医”，在医药工作方面实行统一战线的方针。毛泽东强调：“新医如果不关心人民的痛苦，不为人民训练医生，不联合边区现有的一千多个旧医和旧式兽医，并帮助他们进步，那就是实际上帮助巫神。”^⑥他一方面认为“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作用都是要治好病”^⑦，另一方面又关注到了中医相比于西医所具备的人道主义关怀优势，并把“为人民训练医生”提到医药工作的原则性高度。在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48 页。

② 《习近平在广东考察时强调 高举新时代改革开放旗帜 把改革开放不断推向深入》，《人民日报》2018 年 10 月 26 日。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 2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58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012 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012 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012 页。

⑦ 《毛泽东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54 页。

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①,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中医药观的人民立场。其次,中医药事业的继承与发展要依靠人民。毛泽东指示道:中国医药学历史悠久、内容丰富,“要有同志去整理它”^②,“要建立研究机构,要出版中医中药书籍”^③。这些工作都需要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与智慧。他还积极发动群众,支持西医学习中医,发展中国统一的医学以贡献于世界。毛泽东站在唯物史观的高度将群众路线与中医药发展工作相结合,指明中医药发展需要依靠人民、中医药的发展要为人民卫生工作服务,引领了中医药事业发展的价值方向。

(二) 从文化遗产的角度传承创新中医药文化

文化是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民族思想智慧的结晶。马克思指出,社会的发展“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④,文化的发展亦是如此。每一时代文化的发展必须以民族文化为基础吸收外来文化,在其已有的历史条件与现实前提下展开。这是唯物史观视域下文化发展的继承性与超越性特质。中国医药学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⑤。随着认识的深入,毛泽东越来越强调从文化层面来看待和发展中医药,如多次强调中医问题是“文化遗产问题”,“是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独立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一部分工作”^⑥,“要把中医提高到对全世界有贡献的问题”^⑦。对于否定中医药的历史虚无主义论调,毛泽东批评道:“不尊重民族文化遗产,这是极端卑鄙恶劣的资产阶级的心理在作怪。”^⑧他提倡从思想作风上转变,尊重中医、尊重我国悠久历史的文化遗产。毛泽东认识到,“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⑨,中国传统文化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因此对待传统文化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2~183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4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5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0页。

⑤ 王国强:《以高度文化自信推动中医药振兴发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人民日报》2017年2月24日。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58页。

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45页。

⑧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58页。

⑨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

主性的精华”^①，这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②。中医药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指出它“有丰富的内容，当然也有糟粕”^③，我们要创造自己的新医学就需要吸收其积极的因素，也需要学习西医的科学知识。他认为，“西医是近代的，有好的东西”^④，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⑤。这意味着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既要尊重自己的文化遗产，也要正确对待外来文化，在葆有民族文化之根的前提下展开文化创新。基于文化发展的继承性与超越性并重的立场，毛泽东主张尊重与保护民族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中医药文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医药观确立了以“传承精华、守正创新”为基调的发展方向。

中医药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毛泽东从民族文化遗产的高度看到了中医药文化的独特优势与蓬勃生命力，并给予其“宝库”的定位，凸显了中医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中医药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并强调中医药是中华文化之“瑰宝”，“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⑥，彰显了文化主体对自身文化的充分肯定与坚定自信，这对于我们在文化自信的视野下进一步推动中医药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四、结语

综上，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进行了深刻指引，一方面强调须从现实国情出发重视与发展中医药，另一方面强调中医药作为民族文化遗产需要继承与发扬。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特色组成部分，毛泽东中医药观所蕴含的实事求是的哲学立场、辩证发展的哲学方法以及唯物史观的价值向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医药文化相结合的理论典范，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思想成果。我们应从哲学原理的角度进一步深化对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708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58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58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页。

⑥ 杜尚泽、李景卫：《习近平出席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中医孔子学院授牌仪式》，《人民日报》2010年6月21日。

毛泽东中医药观的理解和研究，更准确地认清马克思主义中医药观的理论逻辑^①，更好地为新时代“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提供理论思路。

Mao Zedong's View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Its Philosophical Basis

Ma Xiaohui Cheng Wang

Abstract: Mao Zedong's view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s a characteristic component of Mao Zedong Thought, reflects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Marxist philosophy. Based on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he put forward the working principle of “uniting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and the development idea of “integrating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addition to this, he emphasized the unity of critical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guided by Marxist dialectics and proposed to promote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heritage guided b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hich has established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inheriting the essence, keeping the integrity and innovating” for Marxist view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Keywords: Mao Zedong; View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Marxist Philosoph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责任编辑：吴文新]

^① 参见程旺：《论习近平关于中医药的重要论述及其启示》，《中医药文化》2020年第6期；张苏、程旺：《邓小平关于中医药的论述及其重要价值》，《中医药文化》2022年第3期。

**“大思政课”
相关研究**

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闲暇消费及其新动向

张文富*

【摘要】马克思主义认为，闲暇消费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大众闲暇消费是一扇窗子，通过这扇窗子来观察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可以了解到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诸多情况。现实生活中，大众闲暇消费给西方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以及社会生活都带来了巨大影响。我们发现，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闲暇消费虽然受到经济危机和政府财政紧缩政策的影响，但是仍然基本保持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形成的那种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闲暇消费也出现一些新动向，如知识性和精神性休闲活动增多、简约主义生活方式受到青睐、社会服务型活动成为很多人在闲暇时间的重要选择、民众在政治类和体育类休闲活动上持续保持较高参与度等。

【关键词】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大众闲暇消费；新动向

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消费主义生活方式虽然受到了主流社会的极力推崇，被资本媒体贴上了“时尚”的标签，但是因为经济周期率的内在作用、经济危机频繁爆发和各国政府实行福利型财政紧缩政策导致大量民众收入下降，再加上这种生活方式引起的一系列不良社会后果逐渐暴露出来，所以它越来越遭到普通民众的摒弃和舆论的批评。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各种环保的、简约化的消费方式在冷战结束后的西方世界出现，这是对消费主义的事实否定。与消费主义这种非理性生活方式不同，闲暇消费作为一种大多数现代人追求自身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志，已经成为普通民众工作之余不可或缺的生活内容。从马克思主义视野看，这种日常消费活动也深深地影响着西方国家亿万民众的精神世界和这些国家的整体

* 张文富，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代思潮和文化。

社会结构。深入考察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闲暇消费情况，可以为中国方兴未艾的闲暇消费走上健康发展之路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闲暇和闲暇消费

“闲暇”的英文是 leisure，该词源自拉丁文“licere”，有“被允许”或“自由的”之义。在西方，最早提出“闲暇”这一概念的是亚里士多德，他认为闲暇代表着“可支配的时间”以及“不受约束”，是人的一种生命状态，是相对于工作劳苦的状态，这种状态能够给人带来愉悦之感。他在《政治学》这部著作中讲道：“人的本性谋求的不仅是能够胜任劳作，而且是能够安然地享受闲暇。这里我们需要再次强调，闲暇是全部人生的唯一本原。假如两者都是必须的，那么闲暇也比劳作更可取，并且是后者的目的，于是需要思考人们应该做什么。”^①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闲暇是与劳作相对应的概念，是人生的理想追求，因为人在闲暇时才有时间沉思，才能够通过各种活动为自己带来真正的快乐。然而现实的问题是，只有占人口总量少数的有产阶级、精英人群才能享受这种快乐，因为他们不需要为生计操劳。美国社会学家凡勃伦把有无闲暇时间视为划分不同社会阶级的重要标准。不过在他看来，闲暇与沉思无关，而是与“悠闲的富裕”有关，拥有充分的时间和支配时间的自由是凸显身份地位的一项标志。

在马克思的词典里，闲暇一般被称为“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相对应。时间是一种无形财富，它本属于工人阶级，然而却被资本家阶级所占有，变成了一种剩余劳动时间。在人的全面发展语境下，马克思认为自由时间是“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②，“自由时间——不论是闲暇时间还是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自然要把占有它的人变为另一主体，于是他作为这另一主体又加入直接生产过程。对于正在成长的人来说，这个直接生产过程同时就是训练”^③。自由时间也是“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以至于星期日的休息时间”^④。马克思指出自由时间的重要价值在于，“它不仅对于恢复构成每个民族骨干的工人阶级的健康和体力是必需的，而且对于保证工人能够发展智力，进行社交活动以及社会和政治活动，也是必需的”^⑤。可见，马克思非常重视闲暇问题，并将其提高到人的教育和全面发展的高度。

在当代，“闲暇”一词一般被理解为不必进行劳动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进

①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颜一、秦典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5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03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04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06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68 页。

行这样那样休闲活动的消费时间。闲暇消费就是人们利用闲暇时间进行的日常生活消费,是人们除了基本生存活动如吃饭、睡觉、做家务和生产劳动之外所进行的消费活动,是“人们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根据自己的爱好,自由地进行享受和发展的活动”^①。这种消费的前提条件是既有可支配的时间,又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如充足的金钱财富等物质基础,它可以分为物质性消费和精神性消费两种类型。作为一种经济文化活动,闲暇消费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在生产力极端落后的远古时代,人类的祖先整日为了吃饱穿暖而进行农业种植、食物采集、捕鱼狩猎等活动,即便如此也难以保障自己的基本生活,因此那时的人类几乎与动物一样被自然界所主宰,极少有闲暇时间,所以就谈不上休闲。经过漫长的岁月之后,人类进化到了文明阶段,生产有了剩余,剥削阶级出现,他们作为特权阶级成为“有闲者”,才有机会从事普通人难以企及的休闲活动。从阶级诞生的远古时代到今天,有闲阶级即统治阶级的一部分杰出人员在休闲方面创造出各种各样的活动形式,如观看人兽搏斗、弈棋绘画、喝酒品茶、看戏观舞、游山玩水以及摔跤、打马球等文化体育活动。客观上,有闲阶级在进行休闲活动的过程中也为人类文化事业的发展和进步作出了贡献,他们创造出大量精神文化成果,大大丰富了人类的精神世界,推动了人类智慧在整体上的发展。

资本主义条件下普通劳动者的主体即工人阶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与奴隶和农奴一样,没有自由时间也没有支付能力进行闲暇消费。在近现代国际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地发展起来之后,随着八小时工作制度的实行、收入的增加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他们才逐渐有了进行闲暇消费的条件。

在马克思看来,休闲活动是人类能动地摆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一种生存方式,是人类解放程度的体现。他说,在未来的新社会,“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那时,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②。在早期资本主义时代,一般工人每天要劳作12~20个小时,即使如此都有可能无法养活他们自己及其家属,因而根本无法进行休闲和享受。马克思对这种剥夺工人自由时间(闲暇)、疯狂追逐剩余劳动的行为是持严厉批评态度的,他曾经表示:“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处置的自由时间,一生中除睡眠饮食等纯生理上必需的间断外,都是替资本家服务,那么,他就还不如一头役畜。”^③马克思在这里已经将工人有没有闲暇作为判断其是否成为真正的人和享有人权的一个重要指标。这是因为,从人的全面发展角度来看,一个健康的人既要满足生理方面发展和享受的需求,也要满足其精神发展和享受的需求,仅仅满足其中某一个方面的需求会造成人的片面发展。例如,一个人只是吃饱穿暖,却从没有精

① 尹世杰主编:《消费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7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1页。

神和文化方面的生活，不知道道德、文学、艺术、娱乐为何物，那他就跟一般动物没有什么区别；或者一个人虽然道德高尚，也颇有哲学修养和艺术天赋，但是却穷困潦倒，整日填不饱肚子，为生计发愁，这样的人是难以拥有丰富的精神生活的，同样不是一个完整的人。

闲暇消费与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及文化生活有着密切关系，它就像一扇窗户，打开它人们就可以看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马克思主义视野观察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闲暇消费及其带来的诸多影响和新动向，能够让我们加深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认识，从而为中国这个东方大国正在兴起的闲暇消费走向健康发展之路提供有益的启示。

二、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闲暇消费及其多重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西方国家，其经济经历了长达 20 多年的增长和进步。由于生产力的长足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大量增加，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得以从其攫取的垄断利润中拿出一部分以社会福利的形式分给普通民众，同时由于工人阶级的长期反抗，也迫使西方政府减轻了对本国工人阶级的剥削。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众多西方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普遍实行“双休日”（即每周休息两天）制度，周工作时间平均减少到 35 ~ 40 小时甚至更少；同时，工人的工资收入和福利收入也在绝对量上有了明显增加，“福利资本主义”的社会保障制度减少了民众扩大消费的后顾之忧。这样一来，一般劳动者既有了闲暇时间，又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来进行闲暇消费。与此同时，各种各样的消费经济形式被资本开发出来以满足市场的需要，从而使整个社会的闲暇消费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状况。进入 21 世纪以来，尤其是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财政压力越来越大，高工资高福利高消费经济模式难以为继，政府不断压缩用于民生的财政支出，但是总体而言旧的福利资本主义制度仍然在维持运行，因而作为西方经济社会体制一部分的大众闲暇消费生活方式继续发挥着其独特的社会作用。作为一种经济文化活动，大众闲暇消费与西方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其必然对后者造成这样那样的影响。

（一）大众闲暇消费给西方经济生活带来的影响

人们进行闲暇消费既是为了满足自己恢复体力和智力的需要，也是为了满足其提高生活水平的需要。而人的需要是生产发展的动力，也是市场繁荣的必要条件，客观上为市场创造了商业机会。资本非常敏锐地感觉到可以通过民众的闲暇消费活动赚钱，因而他们便对各种各样的休闲项目进行商业开发。现代社会用于民众闲暇消费的商品及服务是五花八门的，其形式多样化已经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地步。文化方面，包括休闲阅读、都市电影院、歌舞剧院、各种商业歌舞表

演、卡拉 OK 练歌厅、酒吧、电子游戏室、博彩业、文物古玩收藏业等；体育方面，有各种各样商业性的体育赛事（尤其是足球、篮球、乒乓球、橄榄球、棒球、赛马运动等）、极限运动（如冲浪、蹦极、翼装飞行等）、拓展性运动（如攀岩、滑冰、滑雪、滑草）等；旅游方面，大大小小的旅游公司被建立起来，众多自然景观、人文景观被商家开发出来成为旅游产品；养生保健方面，各种各样的健身馆、养生馆、水疗足疗按摩店等被作为新兴服务业开发出来。在现代化的资本主义阶段，大部分休闲活动都是商业性的。不少资本主义国家近几十年来文化产业、体育产业和旅游产业都呈快速增长势头，这与民众扩大了休闲消费规模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以体育产业中的足球产业为例，全世界仅足球产业实现的价值就达 5000 亿美元之巨（2015 年数据）。^① 美国著名跨国电影和文化旅游业巨头迪士尼公司市值高达 2000 多亿美元，其推出的电影、游乐园等文化产品和休闲游乐产品为其带来了巨额利润。

一般来说，西方国家民众已经形成了比较固定的闲暇消费习惯，他们平时节衣缩食、拼命工作，而在进行闲暇消费（如旅游）的时候则出手阔绰、毫不吝啬。民众不断高涨的闲暇消费热情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维持西方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这些国家消费经济的发达与此有着密切关系。一般来说，相对于农业、养殖业及制造业而言，文化旅游产业的投资回报率更高、获取利润更快。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近几十年来许多西方国家将文旅产业作为自己的支柱产业，资本在这方面也积极进行投资，从而使得休闲经济或曰闲暇消费经济在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中所占份额居高不下。

（二）大众闲暇消费给西方国家带来的政治和文化影响

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结构是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它们共同构成一个社会有机体。这是因为作为社会有机体最为关键的部分，人本身是有血有肉的，它是由一系列经济、政治、文化因素共同作用所形成的社会动物。因此，当一个人进行物质的或者精神的活动时，其政治观念是不可能不受影响的；同样道理，当他在进行政治性活动时，其经济和文化观念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文化也是如此，个人的文化观念会对其政治和经济行为带来决定性的影响。闲暇消费作为人的一种经济行为，一方面是在一定的文化理念支配下发生的，另一方面也会对消费者本人的政治观念造成影响。

首先，大众闲暇消费重塑了人们的政治价值观。闲暇消费包含大量精神文化消费，如观看和欣赏各种文艺作品以及在网上进行电子游戏等，这些消费活动中的消费对象本身都是意识形态载体，它们内在地包含着各种形式的价值观。电

^① 参见《足球产业的未来市场有多大，究竟有多大的能量？》，2019 年 4 月 11 日，http://www.sohu.com/a/306476928_505583。

影、电视剧、音乐、小说等文化产品就是这样，电子游戏中塑造不同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等也有如此功能。因此，消费者在进行文化消费的同时，必然会潜移默化地被那些文化产品里包含的价值观所影响。电影这种文化消费品是各种文化产品中最具有意识形态渗透性的，很多国家都高度重视电影作品的制作和传播，甚至将其提升到国家安全的层面进行战略规划，这足以说明问题。美国的好莱坞影片风行全世界，有些人认为这种现象只是一个市场行为，但实际情况则是美国的垄断寡头重金投资拍摄大量电影绝不仅仅是为了赚钱，他们还要通过一部部电影将美国统治阶级的核心价值观输出到世界各地。例如，好莱坞电影在冷战结束之后风靡全世界，在很多国家电影市场上都能够占据半壁江山，这既给美国垄断资本带来滚滚财源，又非常有效地推销了美国文化及资本的价值观，使得整个世界的“美国化”不断加深。电子游戏中包含的意识形态因子也是非常丰富的。例如，电子游戏《钢铁雄心4》把斯大林刻画为一个独裁者角色，与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天皇裕仁相提并论。在该游戏中，美国总统罗斯福则以“民主国家”领袖的面目出现，其政治寓意十分明显。西方国家开发的电子游戏涉及历史人物时，多会将反西方的民族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及其民众设计为反面对象。

闲暇消费对象中的文化产品包含丰富多彩的意识形态内容，这些产品会对人们的政治价值观产生重大的形塑作用。例如，一个人在游览本国的名山大川、历史古迹、人文风情的过程中会自然产生诸如爱国主义和故土意识这样的文化情愫；政治性建筑物（如政治领袖纪念堂、先烈纪念碑、名人塑像等）及各种博物馆等文化消费对象对于探访者而言其文化政治意义也是毋庸置疑的。以美国为例，民众在闲暇时间除了通过观看好莱坞电影、各种电视剧、电视选秀和脱口秀之类的节目来消磨时光外，也会去全国各地的免费图书馆、博物馆、纪念堂、美术馆、国家公园等场所。人们在这些地方度过自己的闲暇时光，就不知不觉地培育和生成了美国人的民族自豪感与爱国主义情怀，这比乏味的说教所取得的教育效果要好得多。美国这个多元文化并存、多种族共处的移民型国家能够在世界舞台上长期维持统一而不分裂，恐怕与垄断资本在闲暇消费领域长期对民众进行潜移默化的意识形态教化分不开。

其次，大众闲暇消费弥补了西方民众精神上的空虚，同时也使他们的政治敏感性降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盲目的、自发的竞争型经济体制，它一方面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构成纯粹的利益关系，使他们相互之间难以相互信任；另一方面，它造成社会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性，进而又使每个人陷入对未来的严重不安和惶恐之中。为了填补精神生活上的空虚，很多人便通过闲暇消费寻找寄托。西方社会民众在体育消费上的盛况就说明了这一点，很多人愿意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在体育赛事上却乐此不疲，如果仅仅从体育本身和兴趣爱好层面去解释这种现象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像美国职业篮球联赛（NBA）、以世界杯为代表的各种大型足球赛事、以英国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为代表的各种世界网球赛事往往都能

够吸引成千上万的观众参加，甚至有时候会造成万人空巷的盛大景象。民众的目光被吸引到体育赛场，沉浸其中的他们经常会为比赛结果而疯狂发泄或喜或悲的情绪，有时候他们组成狂热的球迷队伍，做出许多令政府和公众头疼的事情。很多年轻人将大量时间花在酗酒、观看色情和暴力性质的影视剧（或者演出、杂志等）这种物欲性的消费生活上，其所造成的影响与狂热的体育消费带来的影响是类似的，即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非理性心理欲求，同时钝化了他们的政治嗅觉。近年来，西方国家政治体系越来越走向娱乐化、文化体系越来越物欲化和浅薄化，这恐怕与全社会的政治文化认知系统趋于退化有一定关系。

（三）大众闲暇消费在西方社会生活层面带来的影响

首先，不同的闲暇消费方式将西方社会不同人群的身份和地位区分开来。以什么样的方式和层次进行闲暇消费是体现和巩固一个人社会身份和地位的重要途径。一个人的社会身份和地位从根本上来说是由其在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决定的。生产决定消费，有什么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就会有什么样的消费制度。因此，资本家阶级及其家庭成员的消费模式与一般劳动者的消费模式是有根本不同的，他们往往以穿戴名贵服饰、住豪宅、乘用高档交通工具（如豪车、私人飞机、豪华游艇）等来标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告诉我你买了什么，我就知道你是谁”，这句话准确而形象地道出了消费的社会区分功能。有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在消费上趋同了，例如他们会穿同样花枝招展的服装、观看同样的电视节目，这导致前者的思想被后者所同化。这种说法值得商榷。从表面上看，不同的阶级所穿戴的服饰差别不大，因为资产阶级的时尚消费确实会被一般工人阶级群众模仿，但是这种模仿仅仅是形式上的模仿；从消费的内容和性质上看，资产阶级家庭的消费等级会远远高于工人阶级家庭，这可以从他们所用物品的质量、品牌、价格等方面看出来。例如工人阶级出身的妇女一般不会佩戴昂贵的宝石项链、开豪华轿车出门，而资产阶级家庭也不会穿廉价衣服、开低端汽车出门会客，这是由人们的经济实力决定的，并不是个人爱好的问题。以体育运动这种闲暇消费模式为例，一般而言，像高尔夫球、网球、赛马等运动项目的场地要求比较高，参与人数非常有限，收费又比较昂贵，所以被称为贵族化运动，大部分工人阶级因为经济原因不会去参与。而一般廉价的球类运动如篮球、乒乓球等运动项目则会吸引大量工人阶级群众参与，所以被人们视为平民化运动。在现实生活中，西方社会那些富裕阶层常常通过一些贵族化体育消费来显示自己不同于一般人的消费力和社会地位。社会分层就在这样的消费生活中得以确立。

其次，大众闲暇消费大大促进了西方社会各阶级的社会化进程。由于现代西方社会在技术上的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和经济生活上的分散化、自由化、市场化不断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疏远了，“原子化”社会形成，人与人关

系紧密的传统“熟人社会”被人与人关系松散的“生人社会”取代。但是，人毕竟是社会性的动物，合群是其重要的属性，因此走出家庭、走向社会进行交往活动是现代人的必然选择。通过闲暇消费，例如参加文化娱乐活动、参与集体性竞技体育运动、参观访问、游览名胜古迹等，都可以促使一个人在精神上成熟起来，学会如何从容地与人交往、如何正确地看待和处理社会事务，换言之，就是实现人的社会化。罗素说道：“闲暇的好处并不仅仅将在这些特殊的事例中显现出来。普通男女因为能有机会过幸福的生活，将变得更和蔼，少作弄人，少动不动就用怀疑的目光去看旁人。”^①一般西方国家民众并不理会闲暇消费在学理上有这样那样的重要作用，他们重视自己的闲暇时光并尽可能多地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去旅游、参加体育活动、搞各种派对活动等，这是他们的社会风气和文化传统。即使世界发生了巨大的事变，如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严重经济危机、战争危机，人们也仍然不会忘记忙里偷闲地进行他们想要的消费生活方式。当然，通过这些休闲生活，他们既实现了恢复体力和愉悦身心的目的，也推动自己融入社会。有益的闲暇消费活动，如体育运动和广泛多样的社会交往活动，也使人们的体格变得健壮、性格趋于外向。

三、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闲暇消费的新动向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逻辑的影响无处不在，西方社会民众的闲暇消费会在资本逻辑作用下沿着一条异化的路线走下去，例如他们会将过度消费、炫耀性消费等不合理消费行为当作一种时尚来追求。20世纪50~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繁荣发展阶段，消费主义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在社会上不断滋长蔓延，闲暇消费的异化是广泛存在的。当时的一些学术著作对于这一问题有过深刻的分析和评论，例如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弗洛姆的《健全的社会》等著作都对这种异化的生活方式进行过非常辛辣的批判。不过，人类社会历史不是直线向前发展，而是沿着一条曲线向前运动，很多事情在不同历史阶段就会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局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发现欧美国家许多民众的闲暇生活方式已经大大不同于几十年前批判理论家们所描绘的那种情况。

（一）知识性和精神性休闲活动增多

在西方人心中，闲暇消费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们认为，闲暇是对国民智力的一项长期投资，是释放一个民族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必要前提。不少民众更加倾向于学习型的休闲活动，把大量时间花在读书、进行艺术欣赏、参观博物馆等

^① [英] 伯特兰·罗素：《悠闲颂》，李金波、蔡晓译，中国工人出版社1993年版，第14页。

活动中。他们并不将全部闲暇时间消磨在酗酒、狂欢、看电视、打牌等享乐活动上，而是拿出一部分时间用在读书、作诗、朗诵等高雅活动中，还有很多人会去艺术馆欣赏艺术品、去电影院观影、去音乐厅观看演出、参观博物馆等，希望在这些人文色彩浓厚的地方开阔视野和增长知识。在西方主要国家，图书馆和博物馆这类公益性场所很多，老百姓也经常光顾这些地方。例如在英国，共有 5000 多家公共图书馆，还有 8500 多个仅面向学生、研究人员和官员开放的资料档案馆，60% 的居民经常去所在地区的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共有藏书 1.28 亿册，每年借出书籍约 4.8 亿册次。法国共有市立图书馆 2795 家，雇用 2.3 万人，藏书近 9700 万册，另外还有覆盖农村地区的 90 家省立图书馆。美国则有约 9000 个公共图书馆。仅仅在纽约的曼哈顿区就有 47 家公共图书馆和 100 多家私立图书馆。^① 西方发达国家民众爱好读书，将读书作为自己重要的闲暇活动，这得到了很多有出国经历的中国人的印证。^② 除了有大量图书馆和博物馆供民众进行文化休闲消费，西方国家政府往往也会花费巨资筹建大量艺术馆和音乐厅，这些设施为民众提供了休闲的场所，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其生活质量、提高其文化素养。

（二）浪费性消费减少，简约主义生活方式受到青睐

随着近几十年来环保理念、生态消费理念不断得到宣传和普及，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开始反对浪费现象，垃圾分类得到民众推崇，简约主义的生活方式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赞成。曾几何时，在消费主义的发源地美国，人们将拥有称心的工作、舒适的房子、豪华的车子当作“美国梦”最具体的定义。如今，却有许多美国人特别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中间社会阶层，甚至是一些富豪，都开始选择“少做一点、少赚一点、少花一点”的“自愿简单”的生活。很多家庭并不以拥有所谓的豪车为荣耀，而是喜欢开一辆方便实用的皮卡车外出旅行。鼓吹“清心寡欲、自然简朴”生活方式的《清贫思想》一书于 1992 年在日本问世，很快走红。虽然日美等发达国家并非所有人都崇尚简约主义生活方式，但是上述情况可以说明一个问题：近些年西方人在生活方式特别是在闲暇生活上已经发生了变化，很多人已经告别了消费主义。

（三）社会服务型活动成为很多人在闲暇时间寻找生活意义的一项重要选择

在西方国家，民众在假日或者休息日从事志愿者活动与慈善事业并不是一件困难或少见的事情，而是很多人司空见惯的事情。国际上对志愿者活动的本质有

^① 参见马惠娣：《走向人文关怀的休闲经济》，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43 页。

^② 参见《美国何以能成为阅读大国？》，2013 年 3 月 28 日，http://www.wenming.cn/book/pdjj/201303/t20130328_1145278.shtml。

这样的界定：志愿、不为报酬、利他。做志愿者活动须满足以下条件：有余暇、余力、余财、余能等，此外还必须是精神富有者。在欧美国家，志愿者活动早在19世纪就已经推广开来，成为重要的社会现象。以美国为例，人们自愿组成各式各样的社团组织，为的是开展社区服务活动，对弱势群体进行帮助、募捐、做义工、筹办节庆活动、助学、为教堂做服务生、参加环保、动物救治等等。志愿者和志愿者活动在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上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为社会的黏合剂、文明的助推器，是美国社会政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亦是美国人的休闲生活方式之一。^① 据报道，美国在1991年有9420万人或占美国人口51%的成年人曾经为各种事业和组织机构提供某种服务。一般志愿者每周提供4.2个小时的服务，该年度美国人总计将205亿个小时用于志愿服务活动，这些时间相当于900万个专职雇员所作出的经济贡献。如果以美元来计算，则相当于生产了1760亿美元的价值。^② 在慈善捐助方面，美国人民“乐善好施”的一面体现得很明显。据报道，2014年美国慈善捐款总额为3583亿美元，创60年慈善捐款最高纪录。这些善款的来源有个人、富人遗产、基金会、公司，主体是个人捐款，达到2585亿美元。^③ 这种情况似乎令人费解，因为这种利他主义行为与美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即个人主义是矛盾的。经过深入分析我们会发现，很多美国人从事志愿者活动和慈善捐助，是为了寻找生活的意义和自己存在的价值。而富豪进行社会捐助，不但有利于提高自己的社会声望，还可以借此逃避高昂的遗产税。有美国研究人员对这种文化现象作出了如此解释：像当志愿者、捐赠善款、环境保护、动物保护、做义工等活动，所产生的“友善”“愉悦”“充实感”“价值”带动“金钱”向善。大量的资金虽然没有进入物质生产领域，但形成了大量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在维护社会生态关系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政治参与类活动增多

西方社会是多元文化并存的，每个人在生活方式的选择上是多样化的，追求个性化是很多人的价值准绳。一方面，民众对于资产阶级政客的政治作秀——总统大选或者议会选举活动很不满，并以不投票来进行抗议。另一方面，仍然有不少民众踊跃参加一些政客组织的政治集会，同时他们也会积极参与到有可能改变其国家命运的其他政治运动中来。2011年发生在美国纽约及其他城市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吸引了无数的学生、教师、工人，甚至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

① 参见马惠娣：《走向人文关怀的休闲经济》，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页。

② 参见[美]杰里米·里夫金：《工作的终结——后市场时代的来临》，王寅通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275～276页。

③ 参见田野：《美国人慈善捐款都用在哪儿》，2016年1月5日，<http://news.hexun.com/2016-01-05/181600115.html>。

利茨这样的著名人士也参与其中。比起美国人,法国人的政治参与热情明显要强烈得多。有这样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法国人一年四季都有特定的“活动”安排,即春天工作、夏天度假、秋天罢工、冬天过节。这样概括法国人的生活方式可能带有夸张的成分,但是它的确能说明一些问题,即法国人每年都会花费大量时间参与政治活动和外出进行闲暇消费,这是他们的社会传统。2018年下半年到2019年初持续半年之久的“黄背心运动”是一场大规模的、持续时间长的政治抗议活动,运动首日就有28万人参加。该运动也波及比利时和加拿大等国。

西方国家民众参与政治活动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一般政治现象。许多参与者并没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他们之所以参与其中,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为了追求一种新的政治利益分配制度,而是出于满足自己政治需要的考虑——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他们只是希望通过这种政治生活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态度和发泄自己的政治情绪而已。“占领华尔街”运动中许多人敲锣打鼓地游行,俨然像过狂欢节。游行中人们打的横幅或者标语牌鲜见激烈的政治诉求,更多的则是一些温和的不满之词:控诉金融领域的贪污腐败,要求加强金融监管;控诉经济不平等现象,要求缩小贫富差距;控诉社会不公,要求社会公正;控诉失业率上升,要求增加就业岗位;控诉人民权利被剥夺,要求还权于民;控诉钱权政体,要求民主政体;控诉警察暴行,要求保护和服务公民;控诉对外战争,要求人类和平;控诉环境污染,要求保护环境;控诉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和欺骗,要求推翻资本主义制度。^①从中可以看出,参加抗议的美国人的主要诉求偏重于经济领域,大多数人表达的是对社会不公平和金融垄断资本的不满,与19世纪和20世纪的国际工人运动相比,其对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批判和反思水平明显低了许多。例如,在1848年欧洲革命中,法国工人群众在巴黎街头提出的口号是“建立社会共和国”,而2011年美国各地发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出现的最激进的口号则是“消灭富人”(End the Rich)、“和平革命不可能的话,暴力革命不可避免”(Those Who Make Peaceful Revolution Impossible Make Violent Revolution Inevitable)。但这就是美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政治表达,其目的主要是满足他们的政治生活需要。

(五) 体育类休闲活动增多

欧美国家民众在其闲暇时间参与体育活动是相对比较积极的,虽然这里面也有商业资本的推波助澜,许多体育运动和比赛充满商业味道,但是从总体上来看,人们追求体育活动的休闲性、发展性是主流,它为增强民众体质提供了便利条件。以美国和英国为例,其民众参与休闲体育活动的景况十分热烈,在西方发

^① 参见谭扬芳:《从“占领华尔街”运动的100条标语口号看美国民众的十大诉求》,《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2年第5期。

达国家中很有代表性。在美国,人们有很强烈的健身意识,国际健康及运动俱乐部协会(International Health, Racquet, and Sportsclub Association, IHRSA)年度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1月,美国拥有3万多家健身中心,比2005年增长13%;会员人数从4130万人增加到5020万人,增加21.5%,而同期美国人口只增加了2%。在美国,最受欢迎的运动当属曲棍球、篮球、橄榄球、棒球、冰球等团体类项目,这些运动在商业资本和媒体的助推下,每年都吸引了无数参与者和观众。英国人参与休闲体育的程度也相当高,约有60%的英国人参加某种形式的体育锻炼活动。英格兰体育局(Sport England)调查数据显示,2015年英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活动的人数大约有1650万人,有约12%的此类人群注册成为健身房或者体育俱乐部的会员,民众喜爱的体育活动包括游泳、健身、瑜伽、斯诺克等。英国人体育运动主要依托各种体育俱乐部开展,英国有多达48600家足球俱乐部,约300万会员;有2000余家网球俱乐部,会员超过200万人;此外,台球、棒球、保龄球俱乐部也数量众多。英国有3738处公共休闲体育中心,共有健身会员250多万人。^①从民众参加体育运动的盛况可以看出,西方发达国家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是很重视体育这种闲暇消费活动的,这也解释了这些国家的民众体质为什么能够在世界上位居前列、其人均寿命何以能够超越很多发展中国家。除了这些国家物质生产力发达能够为民众生活水平提高创造物质前提这一因素之外,人们在闲暇消费、休闲活动中锻炼身体、陶冶情操恐怕也是重要原因,这也是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表现。

四、余论

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民众日常生活领域的闲暇消费方式一方面仍然基本保持着过去的传统,另一方面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这是因为随着全球生态问题加剧和环保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经济危机不断袭扰导致人们的收入减少,西方部分民众在闲暇消费方面逐渐开始摒弃消费主义,多元化的消费模式如简约生活方式、绿色消费(生态消费)开始受到关注甚至追捧。但是由于这种新型生活方式并不符合资本的利益和价值原则,其整体发展道路必然不会顺利。我们看到,当前世界上各种自然资源越来越被纳入资本积累的轨道,政府消费政策上的亲资本倾向仍然在强化,各种异化的消费模式仍然在持续发挥其社会政治作用。在新冠疫情期间,不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遭到重创,旅游业和餐饮业之类的消费经济所受的冲击更为严重。为了提振经济,相关国家政府纷纷通过财政补贴的手段向居民发放数量不菲的现金或者消费券,鼓励人们走出家门、走进

^① 参见周阳、谢卫:《欧美发达国家休闲体育产业发展启示——以美英澳三国为视角》,《人民论坛》2016年第14期。

各种消费场所，企图通过扩大民众的消费规模来拯救其日益走向颓势的经济体系。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消费爱国论”便堂而皇之地再次走上前台，各种非理性消费、浪费性消费不但不被视为可耻行为，反而可能被认为是在为国家做贡献。在强大的资本逻辑面前，任何环保理论、传统文化都显得不堪一击。

当前中国社会的大众闲暇消费正如火如荼地发展着，如何引导这一经济文化活动朝着健康的方向进行，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事实上，中国广大民众的闲暇消费存在跟风、非理性、层次较低等问题。通过研究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闲暇消费，我们获得以下启示：其一，要积极发展民众的精神性闲暇消费，以促进人们的精神文明水平；其二，创造条件推动更多民众参加各种休闲体育运动，以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其三，引导民众发展健康的节俭主义生活方式，摒弃非理性闲暇消费；其四，鼓励成立更多的志愿者服务组织，促使民众在业余时间有更多机会参加志愿者社会服务活动，增加社会正能量。通过以上科学合理的政策安排，中国社会的大众闲暇消费活动必会走出一条新路，超越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相关做法，以大大提升人民的思想道德水平，改善人民的身体素质和知识结构，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The Mass Leisure Consumption and Its New Trend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Capitalist Society

Zhang Wenfu

Abstract: According to Marxism, leisure consumption is the product of the development, and social life of modern capitalist economy and society. The mass leisure consumption is a window through which we can observe the contemporary capitalist society and learn a lot about the internal situation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 In real life, mass leisure consumption has brought great influence on the economic, politic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life of western countries. We find that although the mass leisure consumption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capitalist society is affected by the economic crisis and the government's fiscal austerity policy, it still basically maintains the way formed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here are also some new trends in the mass leisure consumption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capitalist society, such as the increase of intellectual and spiritual leisure activities, the favor of minimalist

lifestyle, social service activitie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choice for many people in leisure time, and the public keeps a high level of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al and sports leisure activities, and so on.

Keywords: Contemporary Western Capitalist Society; Mass Leisure Consumption; New Trend

[责任编辑: 吴文新]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治理： 内涵、价值和路径^{*}

尹铁燕^{**}

【摘要】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治理可以从理论基础、现实要求、基本范畴三个方面进行内涵拓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化思想、中国乡村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要论述共同构成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治理的理论基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治理的现实要求包括加强党对乡村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协同作用，创新乡村文化治理的内容、方法和运行机制。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治理的基本范畴包括治理主体、治理目标、治理属性、服务内容、治理技术、治理空间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治理是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立场的生动体现，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是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证，是保障公平、享有平等文化权的重要方式。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治理的实践路径主要包括构建乡村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乡村文化自组织、乡村居民等协同治理的多元治理共同体，加强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拓宽乡村文化治理空间，培育乡村文化治理人才。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治理；多元治理共同体

实现乡村文化振兴、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一项重要内容。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

^{*} 本文系2021年贵州省研究生科研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治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以贵州省为例”（项目编号：黔教合YJSKYJJ〔2021〕099）阶段性成果。

^{**} 尹铁燕，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建设。

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①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离不开乡村文化振兴,要“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②。乡村治理围绕促进乡村产业振兴、乡村人才振兴、乡村文化振兴、乡村生态振兴、乡村组织振兴等问题展开。^③ 乡村文化治理是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途径,而什么是乡村文化治理、如何开展乡村文化治理,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治理就是要将乡村文化作为乡村文化振兴的发展引擎和智力支持。探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治理的理论内涵、价值意蕴和实践路径,对于乡村文化振兴、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治理的内涵拓展

准确把握乡村文化治理的科学内涵是推动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的理论前提。新时代乡村文化治理就是要实现传统乡村到现代乡村的根本转变,而乡村居民的思想转变是重构现代文明关系的前提和基础。“乡村文化治理的核心是实现从传统乡村文明向现代乡村文明转型和重建乡村文明关系的现代秩序。”^④ 新时代乡村文化治理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文化建设及其治理的思想为指导,坚持“以文化人”的基本理念,坚持以乡村文化为治理的重要载体,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民众参与的多元乡村文化治理共同体,进而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治理可以从理论基础、现实要求、基本范畴三个方面进行内涵拓展。

(一)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治理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蕴含着丰富的乡村文化治理思想。马克思强调“以文化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批判了粗陋的共产主义思想,指出:“共产主义是被扬弃了的私有财产的积极表现;起先它是作为普遍的私有财产出现的。”^⑤ 马克思反对将私有财产进行简单机械的平均分配。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精神生产资料的阶级性,认为“支配着物质生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42~43页。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1页。

③ 参见龚梦:《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的百年演进及基本经验》,《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④ 胡惠林:《乡村文化治理:乡村振兴中的治理文明变革》,《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0期。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3页。

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①。精神生产资料的阶级性也决定了文化的阶级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的“共产主义的幽灵”就是一个坚持共产主义思想的文化主体。他们认为，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一切生产和消费都具备了世界性的特质，精神生产也不例外，“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②。马克思、恩格斯着重强调了文化主体的阶级性和精神生产的公平性。

中国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丰富的乡村文化治理思想，对于推进乡村文化治理起着重要的作用。乡村传统文化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是始终以实体形式存在的乡村传统建筑文化，包括古迹、建筑群、遗址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文化成就的重要标志，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建筑、书法、音乐、绘画、雕刻、剪纸、体育、舞蹈、武术、杂技、戏曲、民俗、服饰等。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于传统乡村社会文明之中，是乡村居民对传统乡村的精神寄托和思想表达。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要论述中蕴含了丰富的乡村文化治理思想。他非常重视乡村文化治理，强调党对乡村文化治理的全面领导，注重发挥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文化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第一，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他指出：“我们要深入挖掘、继承、创新优秀传统乡土文化……要把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有机结合起来，把我国农耕文明优秀遗产和现代文明要素结合起来，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让我国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在新时代展现其魅力和风采。”^③第二，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农耕文化，“农耕文化是我国农业的宝贵财富，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不能丢，而且要不断发扬光大”^④。第三，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不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强基层场地设施建设，“要把农村小喇叭、小广播建起来，深入推进广播电视村村通、农家书屋、乡镇综合文化站等重点文化惠民工程，加快图书馆、文化馆、体育馆、少年文化宫等建设，使各族群众在业余时间有个好的去处，使未成年人能够就近经常参加文化体育活动”^⑤。总之，需要重视挖掘乡土文化和农耕文化，把健全乡村文化公共服务体系作为推动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要内容。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③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406～407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78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87页。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治理的现实要求

加强党对乡村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是乡村文化治理的根本要求。党对乡村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要通过乡村基层党组织予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管农村工作是我们的传统。这个传统不能丢。”^① 党对乡村文化工作的领导是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想保证和精神支撑，党性原则贯穿于乡村文化治理的全过程。在乡村文化治理中，要充分发挥“第一书记”在乡村文化建设及其治理中的引领示范作用。党的领导是乡村文化治理的鲜明特质和最大优势，党对乡村文化工作的领导关键在于构建乡村文化治理领导权的理论体系、解释体系和传播体系，全面提升党对乡村文化工作的理论创新力、理论阐释力和话语传播力。

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协同作用是乡村文化治理的基本要求。治理不同于管理，管理多强调单一主体的功能发挥，而治理强调多元主体的协同作用。乡村文化治理需要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乡村文化自组织、乡村居民等充分参与的乡村文化治理共同体。党委是新时代乡村文化治理的核心主体；政府在乡村文化治理中起主导作用，负责具体乡村文化事业的统筹安排和具体执行；乡村文化自组织的参与有利于激发乡村文化治理的生机活力，确保乡村文化治理良性有序发展；乡村居民是乡村治理的关键主体，在乡村文化治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乡村文化治理中，应始终坚持把乡村居民的根本利益诉求作为文化治理的行动逻辑，构建乡村居民充分参与的利益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

创新乡村文化治理的内容、方法和运行机制是乡村文化治理的必然要求。创新是提升乡村文化治理水平的根本动力。一是嵌入式的治理模式。现代信息技术、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能够嵌入现代乡村文化治理中，创新乡村文化治理的内容和方法。二是运用制度体系规范乡村文化治理的行动逻辑。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组织制度体系、文化创新制度体系能够嵌入乡村文化治理中，构建有效的乡土文化资源整合机制、多主体间协同机制、制度保障机制等，引领乡村文化治理制度化建设的方向。三是乡村文化治理的话语传播内容体系。话语建构是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要嵌入机制。“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自然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观等内容为构建乡村文化治理的话语传播内容体系提供了学理支撑，对于进一步丰富乡村文化治理的话语内容具有重大意义。

（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治理的基本范畴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治理的基本范畴包括治理主体、治理目标、治理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85页。

属性、服务内容、治理技术、治理空间等。从治理主体维度看，乡村文化治理的主体是乡村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村委会、乡村居民等共同构成的多元治理共同体。从治理目标（客体）维度看，乡村文化治理是对“乡村文化”进行治理，实现乡村居民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进而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广大乡村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乡村文化治理的根本目标是重构乡村居民的文化价值观，构建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乡村社会。”^①从治理属性维度看，乡村文化治理包含双重属性，即工具属性和内容属性。一方面，乡村文化可以作为一种治理工具，利用乡村文化推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另一方面，文化可以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容。乡村社会富裕不仅仅表现为物质富裕，还表现为精神富裕。乡村居民要满足物质需求，就需要实现产业兴旺；乡村居民要满足精神需求，就需要推动乡村文化振兴。从服务内容维度看，乡村文化治理包括对物质文化遗产的治理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治理。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要实现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有机统一。政府供给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原则，真正使政府供给与乡村居民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保持一致，从而提供有针对性的、精准化的产品供给和服务供给。从治理技术维度看，乡村文化治理需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对传统乡村文化进行信息化、数字化治理，实现乡村文化数字化。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文化治理中，实现乡村文化的共建共治共享，重构乡村文化治理的体制机制，进而推动乡村文化治理的现代化转型。从治理空间维度看，乡村空间治理包括物质空间治理、社会空间治理和文化空间治理。乡村文化的空间治理是乡村空间治理的重要内容，乡村文化空间是乡村居民开展文化活动的重要场所。乡村文化空间治理的核心要义是实现价值观的重塑，将乡村文化回归乡村居民这个重要的治理主体，保障乡村居民的文化权益。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治理的价值意蕴

乡村文化治理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精神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推动构建美丽乡村、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治理的价值意蕴体现在：乡村文化治理是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立场的生动体现；乡村文化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乡村文化治理是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证；乡村文化治理是保障公平、享有平等文化权的重要方式。

（一）领导维度：乡村文化治理是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立场的生动体现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文化治理成为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战

^① 尹铁燕：《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研究论纲》，《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

略的重要手段。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乡村文化治理的最大优势。“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① 乡村文化治理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保障乡村居民的文化权益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实现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② 推动乡村文化振兴要体现党对乡村工作的全面领导。乡村文化治理必须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作为乡村治理的精神基础和文化底色。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仅仅体现在对物质生活的满足上，更体现在精神生活品质的提升上，精神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对文化的需求。发展乡村文化是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要方面。坚持党在乡村文化治理中的领导地位，形成党领导乡村文化建设的制度体系。从主体上看，乡村居民是乡村文化治理的核心主体，自身具有历史主动性，能自主选择文化内容、组织方式、参与方式等。从客体角度看，乡村居民的个体文化需求是治理的对象。从方式上看，乡村文化治理具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治理方式。元宇宙开辟了乡村文化治理的虚拟空间，乡村文化治理不仅包括“线下治理”，还包含“线上治理”。

（二）国家维度：乡村文化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文化是一个国家进步的思想灵魂，乡村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根基。运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赋能乡村治理，是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体现的是乡村文化治理作为具有工具属性的治理形式所要达到的外延性目标，也即乡村文化治理在整个社会领域所要实现的目标。”^③ 从基本范畴看，乡村文化治理是乡村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治理的基本构成要素。乡村文化本身可以作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工具，利用乡村文化治理乡村，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进而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乡村文化治理的主体是人，必须充分发挥人的历史主动性，做到“以文化人”，实现人的现代化。同时，人的现代化倒逼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乡村文化具有中国文化的区域性特色，体现中国文化的特质。传统乡村是充满本土特色的文化价值体，乡村文化充分诠释了乡村的本质属性和鲜明特质。区域性知识是乡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利用区域性知识助力乡村文化治理，进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0页。

②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8页。

③ 张波、李群群：《乡村文化治理的行动逻辑与机制创新》，《山东社会科学》2022年第3期。

（三）社会维度：乡村文化治理是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证

文化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乡村文化治理是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证，是实现中华文化振兴的重要手段。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乡风文明。乡村社会遭遇到的深层次困境是文化危机。由于乡村社会的流动性较大，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能够享受到便捷、高效、丰富的城市文化服务。过年过节回乡之后，往往对乡村单调的农耕生活无所适从。离土离乡的农民工逐步适应了城市的文化生态，对乡村文化生态产生了格格不入的思想困境。城乡文化差异导致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在思想碰撞中出现种种认识偏差和困惑，乡村社会的传统伦理道德已经难以维持现代乡村社会新秩序。因此，重构乡村文化价值体系、建立应对乡村文化危机的治理机制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另外，具备现代化治理能力的人才应是乡村文化治理体系建构的核心要素，乡村文化治理的价值在于利用好人才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全局，利用更多优惠政策吸引优秀人才扎根乡村，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同时，新时代乡村文化治理能够运用现代化的大数据技术和大数据思维，构建乡村文化治理的数字化评价体系，从而建立起数字化乡村文化治理的长效评价机制，开辟乡村文化治理的新境界。

（四）个人维度：乡村文化治理是保障公平、享有平等文化权的重要方式

从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微观角度来看，乡村文化治理是唤醒乡村居民权利意识的重要手段。文化权是乡村居民享有的基本权利。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要目标就是要激活乡村居民的文化权利意识，充分发挥乡村居民在文化治理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乡村文化治理是乡村居民享有平等文化权利的重要保障。要实现文化治理现代化，就必须构建乡村文化治理现代化的制度体系，持续推进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乡村文化治理是促进乡村居民身心和谐发展的生动体现，乡村文化治理的过程也是乡村居民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过程。乡村社会需要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和社会关系，发挥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利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乡村居民的文化价值观，培育好乡村居民的文化主体意识。“在乡村，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通过乡村文化治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乡风民俗、村规民约、家规家训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旨在内化为村民的道德情感，外化为行动自觉。”^①同时，还要进一步完善乡村公共服务，构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乡村文化治理有利于实现乡村居民对乡村建设的文化认同，重塑乡村文明和乡村信任。乡村文化治理是满足人民精

^① 陈勇军、郭彩琴：《乡村文化治理的国家嵌入：逻辑、路径及其限度》，《学术探索》2023年第2期。

神需求的必要手段。完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是乡村文化治理的前提和基础，要在乡村文化治理中重构乡村公共服务的物理空间、活动空间和网络空间，推动城乡文化融合发展。

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治理的实践路径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治理的实践路径主要包括构建乡村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乡村文化自组织和乡村居民等协同治理的多元治理共同体，加强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拓宽乡村文化治理空间，培育乡村文化治理人才。

（一）主体维度：构建多元治理共同体

乡村文化治理必须始终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基本原则，构建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乡村文化自组织和乡村居民共同参与的乡村文化治理共同体。“基层治理要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协同作用和公众参与作用，形成多元共治的新格局。”^①

在乡村文化治理中，要把党的领导摆在首位。乡村文化治理中党的领导必须通过乡村基层党组织予以落实。党在乡村的文化领导权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坚持党对乡村文化治理的全面领导是新时代乡村文化治理的基本特征。乡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乡村工作的基础，不断提升乡村基层党组织的文化组织力是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要举措。第一，乡村基层党组织要始终成为党领导乡村文化治理的桥梁和纽带。乡村基层党组织承担着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宣传教育群众的重任。在乡村文化治理中，乡村基层党组织要自觉、主动担负起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重要职责，各种利益关系的协调、乡村文化供给是否符合人民群众需求等方面都需要乡村基层党组织予以落实。第二，乡村基层党组织应引领乡村居民形成健康的社会文化心理，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观念。乡村基层党组织要引导乡村居民树立集体主义意识、社会主义意识，引导乡村居民明确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危害，坚定文化自信，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第三，乡村基层党组织应引领乡村社会风气。乡风文明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标准之一，也是新时代乡村治理的基本要求之一。乡村基层党组织要引导乡村居民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提倡移风易俗，崇尚文明健康的社会风气，开展健康向上的乡村文化活动并进行评比，树立文明乡风。第四，乡村基层党组织要引领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方向，建设经济发展、生态宜

^① 叶鹏飞：《秩序与活力：乡村文化治理的问题与反思》，《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居的美好乡村。乡村基层党组织要大力整治和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从根本上改变一些乡村脏乱差、基础设施落后、公共服务落后的局面。第五，乡村基层党组织要动员群众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在广大乡村形成学习农业生产技术的文化氛围。生产技术是发家致富的根本法宝。一方面，乡村基层党组织要做好群众思想工作，让广大人民群众意识到学习农业生产技术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乡村基层党组织要引领示范，聘请农业技术专家指导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利用先进生产技术开辟试验田，带头种植经济作物，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引领方向。

乡村文化治理中要把政府参与作为重要保证。政府是公共权力的执行者。“公共权力指由人民赋予，政府及其他公共部门掌握并行使，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或统治，旨在维护公共秩序、增进公共福祉的集体性权力。乡村文化治理过程嵌入公共权力体现了乡村文化治理的公共性意涵。”^① 基层政府是乡村社会公共权力的执行者，基层政府参与乡村文化治理以确保党的工作在基层得到全面落实。基层政府担负着实现乡村振兴的重任，必须充分调动基层政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基层政府并不是乡村文化治理的直接参与者，而是在乡村文化治理中发挥着引导、监督的作用。第一，基层政府应正确引导村委会开展具有地方特色、民族特色的文化活动。地方政府要结合实际情况，开展乡村节日文化活动、乡村礼仪文化活动、乡村权利制度文化活动。例如，2018年中国农民迎来了国家设立的首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基层政府可以统一组织各村举办相应庆典，由政府提供相应的经费支持。第二，基层政府应为乡村提供精准的文化供给和服务。基层政府要深入基层，全面了解不同村落乡村居民的精神文化需求。第三，基层政府要充分发挥乡村制度文化的社会作用，在乡村文化治理中把乡村文化治理的相关政策与乡村制度文化结合起来，重构乡村文化秩序和道德秩序。“乡村制度文化属于非物态文化，包括社会法律法规、纪律制度、道德准则、社会约定等。”^② 第四，基层政府在招商引资、旅游开发等方面起关键性作用。基层政府要结合地方实际，发展特色产业，结合地方特色进行旅游项目的合理开发，带动乡村经济、文化的发展。基层政府要善于开发独具地方特色的旅游资源，可以聘请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乡村旅游规划，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乡村旅游资源。第五，基层政府要不断加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弘扬孝文化，把孝道作为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要内容。基层政府可以定期组织“好媳妇”“好儿子”评选活动，在乡村社会形成儿女关爱老人的良好社会风气。基层政府要把孝道作为政府一项重要的日常工作来抓，可以设立德孝大讲堂，经常性开展关爱老人的活动，引领乡村社会传承和发展孝文化，把孝文化融入乡村居民的日常生活中。第六，基层政府要加

① 张波、丁晓洋：《乡村文化治理的公共性困境及其超越》，《理论探讨》2022年第2期。

② 包美霞编著：《乡村文化兴盛之路：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中原农民出版社、红旗出版社2019年版，第30页。

大乡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保证乡镇文化服务站、农家书屋、乡村健身广场等正常运营。乡镇文化服务站、农家书屋要经常性地补充图书,保证图书存量不断增加,尤其是要注重购买农业生产技术方面的实用书籍,配备图书管理员,了解借阅者的图书需求并采购阅读量较大的书籍,外借图书应由专人负责登记。第七,基层政府可以联系高校、企业、文艺组织等,定期开展“文化下乡”活动,活动内容应与乡村居民的生产生活紧密相连。第八,基层政府要建立乡村居民文化需求反馈机制,充分发挥村党支部、村委会的作用,全面了解乡村居民的个性化文化需求,开展“菜单式”“订单式”的公共文化服务。

乡村文化治理中要积极培育乡村文化自组织。乡村文化自组织是由乡村社会中具有共同爱好的文化行为主体聚集、共同承担弘扬这种文化责任的自发性社会组织。乡村文化自组织在维护乡村居民文化权益、丰富乡村居民文化生活、重构乡村文化秩序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应鼓励社区服务性组织、文化组织、娱乐组织、宗教组织等非正式组织参与乡村文化治理。非正式组织是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要外部力量,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农业技术支持、大众娱乐、凝聚人心等方面起关键性的作用。“文化自组织力量的发挥,在农民利益的汇集与表达、使得利益需求和获取更加规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乡村地区农民维护自身文化权益的有力武器。”^①

乡村居民的广泛参与是新时代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要特征,是传统乡村文化建设与现代乡村文化建设的显著区别。第一,驻村青年参与乡村文化治理。“驻村青年在乡村文化治理中扮演着文化风尚的引导者、政策资源的协调者、信息知识的传播者的重要角色。”^②乡村文化治理应成为驻村青年的一项重要工作,要建立相应的考核指标,纳入驻村青年的年终考核体系之中,作为驻村青年职业晋升的重要参考依据。驻村第一书记、大学生村官、驻村基层政府领导干部要充分发挥各自的专业本领,把自身的专业技能转化为乡村文化治理的先进理念,在乡村文化治理中起领头羊的作用。第二,乡村居民参与乡村文化治理。乡村居民是乡村文化治理的中坚力量,在乡村文化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满足乡村居民的文化服务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是乡村文化治理的价值旨归。第三,回乡青年参与乡村文化治理。回乡青年是最富活力、最具创造性的乡村社会群体。有些回乡青年接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具备相应的专业技能,能够为乡村文化治理注入活力。

(二) 内容维度:加强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从内容维度看,乡村文化治理主要表现为对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第一,传承和保护好传统古村落,加强文物保护,为乡村文化振

① 张波、李群群:《乡村文化治理的行动逻辑与机制创新》,《山东社会科学》2022年第3期。

② 王玉玲:《驻村青年参与乡村文化治理的路径探析》,《人民论坛》2021年第33期。

兴提供实践基础。同时，要充分利用古村落开展文化旅游活动，带动地方经济和文化发展。要对古村落实施整体性保护，打造古祠堂、古桥、古道、古树群、名人墓园等景点，以古井、古碾房、古石雕等历史文化微景观凸显乡村文化特色。第二，建立乡村文物保护的领导机构。对于有文物开采价值的乡村要组建文化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建立文物普查、巡查、保护机制。对于乡村不可移动的文物要设立专门的文物管理员，落实主体责任，强化文物损坏、丢失的责任追究。第三，乡村基层党组织要定期组织村民学习文物保护知识。通过乡村党政干部联席会议、群众大会等传播渠道，聘请文物保护专业工作人员对文物保护的相关知识进行集中宣讲。乡村基层党组织应增强文物保护意识，并把这种意识传达给广大人民群众。第四，以数字技术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数字技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新方法、新手段。要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内容进行立体化的数字展示，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内容数字可视化，把静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转化为具体、生动的视频，打造出“文化+科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智慧体验场景，大大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力、感知力。

（三）空间维度：拓宽乡村文化治理空间

建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是新时代乡村治理的基础性工程，是乡村居民参与乡村文化治理的实践基础。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是承载乡村文化记忆的物理场域和活动空间，对于形成和塑造乡村居民的地方身份认同具有重要价值。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形成不同的乡村文化价值认同，承载着不同的地方性知识体系。第一，加强乡村文化的空间生产。如何进行乡村文化空间的生产和再分配，事关每个乡村居民的文化权益。因此，乡村文化治理必然要求对乡村文化空间进行合理规划和安排。乡村文化空间治理需要做好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合理规划，广泛征求意见，全面了解乡村居民的文化需求，从而进行文化空间的合理布局，实现乡村文化资源的合理分配。由此可见，乡村文化治理需要不断开拓新的公共文化空间，从而使乡村居民有更多文化交流和文化分享的机会。第二，重塑乡村文化空间的价值取向。乡村文化空间应该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重塑乡村社会的精神面貌，利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乡村居民的日常行为规范。第三，实现乡村社会的空间正义。乡村社会的空间正义与乡村居民享有的空间权益密切相关，因而，乡村文化空间治理要实现乡村居民与城市居民享有平等的文化权益。第四，重塑在乡村文化空间中乡村居民的文化记忆。文化记忆是对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史的美好回忆，记录了乡村居民祖祖辈辈的生活。乡村文化记忆是对人们生产生活的真实写照，对于塑造乡村居民的文化身份认同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第五，培育乡村居民的文化情感。乡村文化治理本身是一种情感治理，乡村文化空间充满了历史记忆。即使在外务工，乡村居民也会时常怀念家乡

的一草一木,这就是乡村记忆衍生出来的乡村文化情感。第六,调动乡村居民的文化参与。必须充分调动乡村居民的文化参与,实现乡村居民有更多文化交流和文化分享的机会。乡村居民通过文化参与,获得对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文化价值体验和认同,从而对乡村文化产生深厚的文化情感。

(四) 教育维度:培育乡村文化治理人才

乡村文化治理的关键靠人才,人才的培养靠教育,教育是塑造乡村居民文化品格、提高乡村居民文化素养的重要手段。乡村文化治理必然要求实现乡村人才振兴,人是乡村文化治理中最活跃、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

第一,培育人才、留住人才,创造有利于各类人才成长和发挥作用的良好社会环境。乡村文化治理中必须发挥各类人才的作用。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要“培育挖掘乡土文化本土人才,支持乡村文化能人。加强基层文化队伍培训,培养一支懂文艺爱农村爱农民、专兼职相结合的农村文化工作队伍”^①。第二,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乡村文化工作队伍,不断提升人才的专业素养。乡村文化治理急需掌握现代农业生产技术的技术性人才。与此同时,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也离不开专业人才的培养。“传承人是历史的活化石,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立之本。”^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需要建立一支来自乡村、愿意回归乡村的文化建设队伍。第三,构建乡村人才培育体系,大力提升乡村居民的文化素养。注重乡村内部的人才培养,不断增强乡村文化治理的内生动力。鼓励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的高校定期为乡村居民开展有针对性的专业培训,使乡村居民掌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原理和相关技能。第四,鼓励外部人才资源嵌入,注重从高校毕业生中吸纳人才,增强乡村文化治理的外在动力和外部活力。大力培养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理论研究、技艺传承和文创设计等相关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广大乡村创新创业,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到乡村发展的职业规划,引导其树立正确的职业观。第五,加快乡村文化振兴的课程体系建设,构建乡村文化治理人才培养的教材体系和教学体系,从而构建完善的乡村文化治理教育体系。第六,在乡村中小学开设地方特色文化课程。鼓励乡村中小学教师自主开发地方文化特色课程,把地方特色文化纳入中小学义务教育全过程。第七,大力推进数字乡村文化建设,利用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文化治理,建立“技术赋能”乡村文化治理的体制机制。提升乡村服务人员的网络素养,为乡村文化治理的“技术赋能”提供人才保障。

^①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65页。

^② 王冉、郑扬:《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应用价值——以邯郸歌舞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为例》,《河北学刊》2013年第1期。

四、结语

中国共产党推进乡村文化治理是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①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历史征程中，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容，乡村文化治理还面临诸多困境和难题，有待学界进一步破解。例如，城乡文化的二元结构问题、村庄“空心化”导致的文化主体缺失问题、乡村“三留守”导致的家庭教育缺失问题、乡村教育滞后导致的文化落后问题、乡村精英（人才）流失导致的文化领导困境问题。此外，乡村文化治理的分析框架还有待进一步创新和发展。在乡村文化治理中，由于缺乏乡村共通文化叙事结构，难以构建共同的文化价值理念并形成乡村文化共同体。新时代加强乡村文化治理体系建设，在实践中形成乡村文化治理共同体，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乡村文化治理研究要着力构建乡村文化治理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逐步形成乡村文化治理的基本框架、研究范式、实践模式。

The CPC's Rural Cultur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Connotation, Value and Path

Yin Tieyan

Abstract: CPC's rural cultur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can be expanded from three aspects: theoretical basis, practical requirements and basic categories. The realistic requirements of CPC's rural cultur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include strengthening the Party's overall leadership over rural cultural work, giving play to the synergy of multiple governance subjects, and innovating the content, methods and operating mechanism of rural cultural governance. The basic categories of CPC's rural cultur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include governance subject, governance goal, governance attribute, service content, governance technology, governance space, etc. CPC's rural cultur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is a vivid manifestation of the people-centered value position, an inevitable choice to realize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0～31页。

governance, an important guarantee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rur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bility, and an important way to ensure the fair enjoyment of equal cultural rights. The practical path of CPC's rural cultur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mainly includes building a multi-governance community with coordinated governance of rural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grass-roots governments, self-organization of rural culture, rural residents, etc.; strengthening the protection of material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xpanding the space for rural cultural governance; cultivating talents in rural cultural governance.

Keywords: CPC; Rural Cultural Governance; A Community of Diverse Governance

[责任编辑: 于少青]

“大思政课”实践教学の学理基础研究

焦 佩 衣安琪*

【摘 要】“大思政课”是思政教育理念的重大创新，强调在“思政小课堂”之外善用“社会大课堂”。“大思政课”实践教学是贯通“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的桥梁和纽带，有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马克思主义实践论阐释了社会大课堂的实践场域及其知行合一的育人效果；教育学强调遵循教育教学规律与学生成长成才规律，指引“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守正创新，尊重教育规律、时代因素、技术因素，服务立德树人；社会学论述了实践教学的社会化作用，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为“大思政课”实践教学提供了技术指导；教育管理学的角色理论和过程管理理论为保障“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实干落实，提升教育管理能力提供了理论依据。深入探索“大思政课”实践教学の学理基础，对深刻把握理论规律，增强实践育人的实效性，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宗旨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大思政课”；实践教学；社会大课堂

2021年3月6日，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时，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强调“思政课不仅应该在课堂上讲，也应该在社会生活中来讲”。^①这些重要论述一方面指明了“大思政课”的改革創新向度，另一方面强调了实践教学在改革创新中的重要作用。事实上，实践教学在“大思政课”的各个维度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育人队伍上，“大思政课”重视形成全社会的合力，实践导师必不可少；在育人内容上，“大思政课”的实践内容与理论内容缺一不可；在育人方式上，“大思政课”需要实现讲授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在育人时空上，“大思政

* 焦佩，法学博士，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比较；衣安琪，硕士，烟台职业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课教学。

① 杜尚泽：《“‘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微镜头·习近平总书记两会“下团组”·“两会”现场观察），《人民日报》2021年3月7日。

课”打破了课内与课外、校内与校外的界限。然而,学界对实践教学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教学改革经验总结的层面,学理探讨不足,不利于深刻把握“大思政课”的规律。为了更加深刻把握“大思政课”实践教学的理论规律,本文试图从哲学、教育学、社会学和管理学四个方面,进一步探索“大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学理基础。

一、“大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哲学理论基础

实践是哲学研究的重要概念,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是开启了哲学的实践转向,将实践看作人现实活动的本身,为“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奠定了哲学理论基础。

(一) 为拓宽“大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存在场域提供理论基础

实践是人类的存在方式,是认识的唯一源泉。“大思政课”的教育过程也是一种围绕“立德树人”而展开的实践活动,将实践范围由课堂学习扩展到社会学习,让社会生活成为培养时代新人的实践场域,育人内容和过程将变得更具感染力、全面性和时代性。

首先,实践教学让“大思政课”更具感染力。“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①,实践活动是社会生活的基础,没有社会实践就没有人类社会。社会生活提供的实践场域充满鲜活生动的现实问题,道德准则变为身边鲜活的道德榜样,法治理论变为具体的司法实践,历史经验通过博物馆得以生动再现,改革开放在各地都有典型案例。将“大思政课”放在社会实践场域中,教学内容自然变得丰满且具有亲和力,课本上干巴巴的理论也就变得生动活泼起来,使教学的感染力得以提升。

其次,实践教学让“大思政课”更具全面性。只有没被理论化的实践,没有无法指向实践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认为,不同的实践形式构成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物质生产实践决定着社会的基本性质和面貌,社会政治实践处理人们之间的政治关系,科学文化实践创造精神文化产品。今天,我们强调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未来,我们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实践比课堂理论提供的教育范围和内容更加广阔与全面,将这些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素材融入思政课堂,会使思政教育变得更加全面和丰富。譬如学生在参观访问、劳动体验、调查研究中增长见闻、提高能力,进而达到在观照人的全面发展的意境中实现“立德树人”目标的进一步升华。

最后,实践教学让“大思政课”更具时代性。社会生活瞬息万变,与时代同频共振。理论存在滞后问题,社会不存在滞后问题,只有通过实践才能确保认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5页。

识与现实同步。当前,我们正在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这一伟大的社会实践为“大思政课”实践教学提供了鲜活的素材。深入社会大课堂的思政教学,拉近了理论和现实的距离,有助于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培养能够担当起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二) 为提升“大思政课”实践教学的效果提供理论基础

实践将“知”与“行”结合在一起,与思政教育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目标不谋而合。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知行合一”与经世致用不仅是一种世界观,而且是一种治学态度,主张认识事物的道理与实行其事密不可分,把握世界的规律与运用规律改造世界密不可分,这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认识论不谋而合。据此,强调“大思政课”中实践教学的作用,不仅可以提升在知识维度上的育人效果,而且可以提升行动维度上的育人效果。

一方面,通过社会大课堂学到的知识更加深刻和牢固。正如自然科学需要通过实验来加深学生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一样,人文社会领域也需要让学生在社会实践中共证和把握社会与人类思维的规律。亚里士多德将实践看作是判断善恶的政治伦理行动。康德将实践称为道德实践,为实践在道德教育中的作用提供了哲学基础。黑格尔将实践活动、人类劳动、社会生活和道德生活都纳入了实践范畴,提高了实践在认识论中的地位。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则进一步强调,人只有通过实践才能真正认识世界。当前,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影响人们认知的不再是信息掌握的多寡,而是信息判断能力的强弱。我们培养出的学生是志向高远还是随波逐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是否具有明辨是非的能力。而这种能力的获取,仅仅通过理论的学习是不够的,必须借助实践的力量。社会大课堂中蕴含的大量生动现实,为学生探讨理论之源和信念之基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社会实验室,由此习得的内容也就更加深刻和牢固。

另一方面,走入社会大课堂也就拥有了一个运用所学改造世界的舞台。“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马克思主义将实践视为人类能动改造客观世界的对象化活动,指明人通过实践彰显自身,展现本质,获得自我确证、自我实现、自我超越。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中,创造自身生活的物质条件,形成各种社会关系,推动人类历史发展。通过实践来学习的过程,也是一个将理论与实际再次结合的过程,是一个摆脱教条主义、解放思想的过程。正是在实践中学习,才能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对此,毛泽东曾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6页。

义。”^①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实践在青年成长成才过程中的重要性,指出“要坚持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用科学理论培养人,重视思政课的实践性,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教育引导青年立鸿鹄志,做奋斗者”^②。事实上,正是社会大课堂运用实践的手段将理论学习变为改造世界的行动,把科学思想理论转化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才提高了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实效。

二、“大思政课”实践教学的教育学理论基础

“大思政课”实践教学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提出来的,是推动思政教育工作守正创新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持续推进教学方法和教学能力的关键。这一理念围绕人才培养基本目标展开,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遵循教育教学规律与学生成长成才规律,具有多维教育价值。

(一) 为“大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创新改革方式提供理论基础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大思政课”实践教学是持续推进教学方法和教学能力改革,解决以往思政课教学面临的痛点和难点,推动思政教育工作守正创新的关键路径之一。

一方面,教育学在实践教学方面发展出探究式学习、服务式学习等多种理论模式,这些都可以运用在“大思政课”实践教学的改革中。首先,探究式学习是一种不仅可以获得知识和技能而且可以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学习方式,发挥学生在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中的自主性探索能力是核心和关键。^③探究学习强调“做中学”的特点,这与思政课培养学生政治认同、科学精神、法治意识、公共参与的教学目标相契合,可为“大思政课”实践教学改革提供思路。在以问题为导向的“大思政课”实践教学改革中,思政课教师将教学内容与教学目标相结合,选定主题开展实践活动,学生通过参与社会发展过程,发现、讨论、分析现实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提升了创新和探究能力。其次,服务式学习理论源于杜威的经验学习理论,是对杜威“做中学”教育理念的延伸,社会学习理论和认知理论也对服务学习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一种实践型教育教学方式,服务学习在教育目标的设置上不仅要包括学术层面,还要包括公民教育、价值观教育、人文教育等多个层面。^④在以服务为导向的“大思政课”实践教学改革中,学生通过社会参观、体验、志愿等活动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12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31页。

③ 参见郭莲花:《探究学习及其基本要素的研究》,《学科教育》2004年第1期。

④ 参见郝运、饶从满:《美国高校服务学习理论模式初探》,《比较教育研究》2009年第11期。

和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世界发展大势，明确使命与担当，真正树立起为人民、为国家服务的意识，提高思想道德素质，提高服务社会、服务国家的能力，将个人梦想与国家梦想相结合，自觉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另一方面，教育学在实践教学方面提出了诸多标准，这些都可以运用在“大思政课”实践教学的质量评价中。首先，教育学认为成功的实践教学需要“双师型”导师，即不仅对课堂知识了然于胸，而且有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这就要求提升思政课教师的水平以满足“大思政课”实践教学的需要。“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① 思政课教师肩负着为党为国育才的重任，“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时代的思政课教师既要做有理想信念、道德情操、扎实知识、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更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提出的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人格要正的“六要”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其次，教育学认为成功的实践教学需要有规范的过程管理制度，不仅要加强实践基地的规范建设，而且要有明确的实践任务和组织步骤，这为“大思政课”实践教学的操作规范提供了理论基础。“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在基地建设方面要拓宽思路，走出纪念馆和博物馆等展馆为主的陈见，依托政府、企业和社区建立起规范的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在实践过程的规范方面要制定任务书、执行规划和评价标准，使其规范化、精细化。

（二）为“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凸显育人规律提供理论基础

“大思政课”实践教学遵循思想政治教育规律，以“铸魂育人”的价值为导向，遵循了学生身心发展规律、认知规律，凸显了对育人规律的尊重，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的新形态。教育学对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探索，为“大思政课”实践教学提供了育人规律的遵循。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规律，需要综合考虑受教育者、教育环境、教育手段等多方面因素。同样，“大思政课”实践教学也要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尊重青年的成长规律，尊重教育的时代因素，尊重教育的技术因素。

首先，“大思政课”实践教学要尊重青年学生成长规律。当前，教学改革的核心是变革教与学的关系，如何充分调动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是研究的重点。21世纪成长起来的大学生是最富活力、最具创造性的群体，从这一特点出发，探究学生所思、所想、所求，是改变教与学关系的根本。当客观事物符合人的主观需要时，人们就会产生愉快、肯定的内心体验。“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尊重青年学生成长规律，适应了学生的认知习惯、接受方式，在把握培养方向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满足学生成长成才的需要，切实增强了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30页。

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和感召力。

其次,“大思政课”实践教学要尊重教育的时代因素。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是教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教育与社会的关系规律是教育必须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社会的变革会引起教育变革。思想政治教育要尊重教育的时代因素,紧跟时代发展、把准时代脉搏、回应时代呼唤,根据新时代新要求进行教育变革。“大思政课”是党和国家立足两个大局,顺应新时代人才培养的新要求,在遵循学生培养规律的基础上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思想政治理论本身同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立足不同时代,回应和解决时代课题,通过实践教学引导学生立足社会现实,紧跟时代步伐,体现了教学方法的与时俱进和改革创新。

最后,“大思政课”实践教学要尊重教育的技术因素。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推动了教育教学变革,让教育更加具有生命力。在信息方面,重视信息在教育中的价值,既能提供海量的教学资源,又能加强教师间、学校间的信息交流与传播。在技术方面,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教学形态,如课堂教学中翻转课堂等教学模式,智能课堂、学习通等软件的互动学习,课堂外的VR虚拟现实技术等实践教育。“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同样需要利用“互联网+”时代赋予思政教育工作独特的优势:建设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学科研管理数字化信息平台,搭建大资源平台;加快思政慕课建设,打造网络“大思政课”精品课程,开发翻转课堂混合模式,落实精准教学理念;善于使用VR技术、互动红色教育基地等,使学生通过沉浸式体验、实践式体验,创新实践教学方法,提高思政课的亲和力和吸引力,增强思政课的有效性。

三、“大思政课”实践教学的社会学理论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上思政课不能拿着文件宣读,没有生命、干巴巴的。”^①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秩序和社会变迁。田野调查,也就是实践,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在社会学看来,不走进社会大课堂的学习不可能是有效的学习,这为“大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必要性提供了理论支撑。

(一) 为“大思政课”实践教学的社会化功能提供理论基础

社会学将个人社会化看作教育的主要功能,这与“大思政课”实践教学的“立德树人”目标有相通之处。个人社会化是指个人在某一特定的社会发展中自我观念与学习该社会的生活方式并扮演社会角色。社会学关注人的社会化,认为

^① 杜尚泽:《“‘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微镜头·习近平总书记两会“下团组”·两会现场观察)》,《人民日报》2021年3月7日。

个体通过习得社会道德、政治、法律、生产与生活技能等,实现符合社会倡导和需要的道德社会化、政治社会化、法律社会化和性别社会化,实现从生物人向社会人的转变,最终成为一名合格的社会成员。

与此相应的是,“立德树人”中的“德”是扎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都是与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相适应的,也只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才能够被建构。换句话说,“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可以为学生创造社会化的条件,让他们在社会大课堂中发挥个人潜能,从事社会活动,实现个人成长,提升社会交往能力,运用所学理论与方法来分析与解决社会问题,增强社会责任感。

(二) 为“大思政课”实践教学的调研方法提供理论基础

田野调查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手段,这为“大思政课”实践教学的调研方法提供了借鉴。访谈、观察是田野调查最常见的方法。通过深度访谈和观察,置身于研究对象的情境之中,从作为社会行动者的访谈对象以及环境因素出发,透过现象探索本质,达到调查的最终目标。新时代要求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更加深入地把握时代脉搏,需要通过总结田野调查的发展经验,提倡继承和发展费孝通“将心比心”的田野调查,推动迈向人民的社会学的发展。^①

同样,田野调查适用于“大思政课”实践教学,且行之有效。“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并不局限于参观访问,更深层次的社会调查研究也是其应有之义。“大思政课”实践教学的社会调查研究扎根中国社会现实,引导学生通过访谈、观察等田野调查方法,认识和分析社会现象,产生认知,学习理论,校验理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究中国社会变动的规律,感受中国特色、中国力量、中国底蕴,厚植爱国情怀,收获青春感悟。

四、“大思政课”实践教学的管理学理论基础

“大思政课”实践教学的突出特征是“大”,需要协调参与主体的关系、健全运行过程的机制,以提高教学质量,实现教学目标。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企业 and 政府的计划、组织、领导、控制职能,协调各种管理要素,提升管理效率,这为“大思政课”实践教学提升管理活动的有效性提供了理论基础。

(一) 为“大思政课”实践教学的主体分工提供理论基础

盖·查尔斯、拉尔夫·林顿等人在教育管理领域提出了角色理论,认为在教育活动中不同的参与主体在不同岗位上扮演着一定的角色,通过各角色扮演参与

^① 参见周飞舟:《将心比心:论中国社会学的田野调查》,《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2期。

教学活动。拉尔夫·林顿指出：“角色——这是地位的动力方面。个体在社会中占有与他人地位相联系的一定地位，当个体根据他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而实现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时，他就扮演着相应的角色。”^①不同的角色在教育管理中处于不同的地位，具有不同的育人功能，但同样都具备着育人价值。这为“大思政课”实践教学中全员育人的实现提供了分工协同的理论基础。

“大思政课”实践教学要做到全员育人。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全社会都要担负起青少年成长成才的责任。”^②“大思政课”实践教学涉及学校、家庭、社会等多元主体，合理的分工协同是提高目标效率的基础。

学校是“大思政课”实践教学的保障，担任领导、组织的主阵地角色。学校管理是教育的核心，是教育管理主体。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主体由思政教育领导部门及其管理人员构成，手段包括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等方式，目的是对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进行有效整合而为立德树人提供服务。^③学校层面要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重要性，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对标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加强对“大思政课”的统筹协调。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辅导员等教育者，要秉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时代责任，提高教育管理能力，形成一以贯之的思想教育体系。

家庭是“大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基础，扮演着潜移默化的主抓手角色。家庭教育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事关民族和国家的未来，家庭、家教、家风对学生文化修养、行为习惯、道德品格的塑造有重要作用。因此，家庭与学校要建立家校协同育人机制，达成协同育人共识，提升家庭教育能力，通力合作，助力学生健康成长。

社会是“大思政课”实践教学最生动的课堂，扮演着社会锻炼主渠道角色。一方面，学生要走出校园，走进社会、了解社会、融入社会，锻炼自我；另一方面，学校可以联系党政领导、英雄人物、劳动模范、大国工匠等先进代表，进入课堂参与思政课教学，通过他们的自身经历和真情实感引导学生拓宽视野、提升品质。

总之，“大思政课”实践教学通过多元主体协同育人，发挥不同主体的育人功能，合理整合资源配置，高效管理，协同提高思政课教学的有效性。

（二）为“大思政课”实践教学的过程管理提供理论基础

古利克和厄威克研究教育的过程管理，将其分为计划、组织、人事、指挥、

① 熊德明：《冲突与调适：社会转型中的大学教师角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9页。

②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69页。

③ 参见陈万柏、张耀灿主编：《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5页。

协调、报告、预算等七个步骤。同样，陈孝彬和林昌华等我国教育管理理论研究者从教育过程出发，“认为教育管理学研究对象为教育管理的过程，此种认识来源于管理学中对于管理是一种过程的认识，所关注的是教育管理活动的过程，将过程与规律联系起来，教育管理学正是通过研究教育管理活动的过程从而得到教育管理规律”^①。这为“大思政课”实践教学中全过程育人和全方位育人的实现提供了理论基础。

一方面，“大思政课”实践教学要做到全过程育人。教育管理重视教育过程的价值和意义，这是实现教育目标的关键。教育管理是一个开放性的过程，学生成长的过程是一个完整阶段，各个教学阶段不是相互独立、封闭的环节，而是相互衔接的教育管理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指出：“在大中小学循序渐进、螺旋上升地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非常必要，是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保障。”^②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中，实践教学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在小学阶段注重启蒙性实践，在初高中阶段注重体验性实践，在大学阶段注重社会探究性实践。通过制定公平合理的教育过程，打破教学阶段的界限，推动思政课协同创新。

另一方面，“大思政课”实践教学要做到全方位育人。教育管理是一个互动合作的过程，其过程是复杂的，各个环节、各类因素相互关联、相互作用，这就要求管理主体相互合作，保证教育管理的质量与水平。教育管理者承担共同的育人使命，发挥着不同的职能，通过平等协商，共同完成教育管理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③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在要求，通识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与思政教师应当相互认可、理解与支持，在互动合作的过程中共同完成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大思政课”以实践教学和课程思政协同育人，充分发挥课程思政的德育功能，形成实践育人的全方位教育格局。

总之，“大思政课”实践教学是一个跨学科的理论问题，需要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中心，吸收哲学、教育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等多元理论，从学理上弄清楚“大思政课”的主体范围和相互关系、教育目标和手段路径、教育过程和规范要件、教育评价和努力方向等等。只有打下扎实的理论基础，“大思政课”实践教学才能行稳致远、事半功倍。

① 李旭、王娇：《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管理学学科建设的回顾与反思》，《教育学报》2019年第6期。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29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78页。

Research on Practical Teaching's Theoretical Basis of "Bi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Jiao Pei Yi Anqi

Abstract: The "bi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is a significant innovation in the concep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mphasizing the effective use of the "social classroom" beyond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mall classroom". The practical teaching of "bi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s a bridge and link that connect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mall classroom" and the "social classroom", and plays an irreplaceable key role. Marx's theory of practice explains the practice field of the social classroom and its effect of 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practice; Pedagogy emphasizes following the laws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as well as the laws of students' growth and development, guiding the practice and innov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respecting the laws of education, the factors of the times and the factors of technology, and serving to foster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Sociology discusses the socialized role of practical teaching, and the research method of Field research provides technical guidance for the practical teaching of "bi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The role theory and process management theory of educational management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ensuring the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of the "bi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and improving educational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deeply explore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practical teaching in the "bi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in order to deeply grasp the theoretical laws,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practical education, and implement the fundamental purpose of foster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Keywords: "Bi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Practical Teaching; Social Classroom

[责任编辑: 鲁法芹]

提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传播效度的多维路径优化^{*}

张意梵 周 琦^{**}

【摘要】当下学习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能只停留在经典研读、文本研究、理论学习层面，更要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经典走向大众、从文本走向生活、从理论走向传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路径起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构建“大传播主体”结构，解决“谁来传播”的问题；二是明确传播内容，回答“传播什么”的问题；三是实行传播方式的多样化，解决“怎么传播”的问题；四是整合传播媒介，保证传播通道的畅通；五是进行受众细分和策略选择，确保传播有的放矢。由此多维优化，不断提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传播的效度。

【关键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众化；传播

在当下主题教育中，学习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学习、文本研究、经典研读上，更要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经典走向大众、从文本走向生活、从理论走向传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如何提升其传播效度，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是当前主题教育的基础性、战略性、长远性工作。为此，亟须从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方式、传播媒介、传播受众等多维路径优化入手，不断提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传播的效度。

一、构建“大传播主体”结构，解决“谁来传播”的问题

传播主体的素质、信誉、形象、动机和组成结构，深刻影响着传播主体在传

^{*}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71批面上资助项目（2022M710337）阶段性成果。

^{**} 张意梵，教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周琦，北京交通大学语言与传播学院讲师，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化学、科学社会主义。

播过程中自觉和主动作用的发挥,从而决定传播效度的高低。在新时代语境下,针对传统的传播主体分散和主体布局条块分割等问题,亟须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建构“大传播主体”,以形成整体联动和协同效应。

(一) 巩固党委和宣传部门在传播中的组织领导地位

干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力量,在思想宣传工作方面具有关键的领导作用,肩负着直接的领导责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和国家的长期指导思想,各级党委特别是宣传部门要充分发挥在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重要作用,组织好、引导好、宣传好党的指导思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要“加强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全面领导,旗帜鲜明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①。党委和宣传部门的主要职能要转移到整合各主体力量和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传播活动的策划、组织、指导和监督上来,使之变成一个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鼓与呼的“智囊团”“参谋部”。这就要求各级党委在传播过程中肩负起相应的政治引导、组织领导、顶层设计的责任,加强对意识形态领域重大理论和实践论题的分析研判,在聚焦问题、解决问题中不断提高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力和水准;同时,作为党的思想宣传的专门机构,宣传思想部门承担着十分重要的宣传职责,要时刻铭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②,不能让广大人民群众的大脑被其他思想所占据。因此,宣传思想干部要“不断掌握新知识、熟悉新领域、开拓新视野,增强本领能力,加强调查研究,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③,跟随时代发展创新宣传思路,顺应人民意愿改善宣传方式,根据社会需求提升宣传效果,真正成为让人信服的行家里手。

(二) 发挥思政课教师校内传播向校外辐射的关键作用

思政课教师在意识形态传播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学校学生特别是高校学生是思想最活跃的群体,学生阶段也是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塑的重要时期,因此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学校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工作,每个学段都配有思政课教师。思政课教师具有专业的理论水平和教书育人的工作职责,并且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因此应充分运用好思政课教师这一群体,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传播,特别是要根据思政课教师的类型发挥不同思政课教师的作用。思政课教师队伍划可分为教学型、教学科研型、社会实践型三类:教学类教师队伍主要致力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校内传

①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342页。

② 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27页。

③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342页。

播,通过发挥学校课堂的平台优势推动理论落地,并以“大文科”建设为统领,以“大思政课”建设为基础,推动多学科多维解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蕴含的深刻道理学理哲理;教学科研类教师队伍主要致力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教学和科学理论研究,进一步提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术化强度、学理化深度、学科化高度,通过发挥教学与科研相促进的优势实现理论阐发和理论传播;社会实践类教师队伍主要致力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社会上的传播,通过发挥知识储备优势以促进理论走出校园和走向大众。以上三支队伍各有侧重,负责各自专长领域又相互协同,把追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传播的整体效果作为组织设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传播活动的终极目标诉求。

(三) 发现人民群众中蕴藏的积极的传播力量

中国共产党最重视人民群众,深刻认识到人民群众的需求是最根本的,人民群众的精神是伟大的,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在思想理论传播方面,人民大众既是信息传播的最终受体,同时也是终极意义上的传播主体。在大众传播时代,人民大众更是最主要的信息传播者,他们在传播的自发性、隐蔽性、可信性、有效性等方面都具有天然的优势。要想从根本上提升党的指导思想的传播效度,必须充分发挥人民大众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传播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快速发展,包括新媒体从业人员和网络‘意见领袖’在内的网络人士大量涌现”^①。一般来说,网络言论相对活跃的网民总是占少数,绝大部分是“沉默的大多数”。网络意见领袖作为对“沉默的大多数”施加巨大思想影响和引导作用的网络“活跃分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引导舆论走向、纠正各类错误认知,甚至引导网民“想什么”以及“怎么想”,因而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传播中具有重要作用。为此,要在社区和公民个人中发现一批既热心传播事业又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意见领袖”,最终横向组建一支年龄结构合理、学科背景互补、职业分布适宜、老中青结合的传播梯队,确保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传播事业薪火相传、后继有人。

二、明确传播内容,回答“传播什么”的问题

与一般传播内容相比,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内容除了具有学理性和科学性,也具有更强烈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增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35页。

加了其传播的难度。在新时代,能否根据受众特点整合传播内容,是体现传播主体水平的重要方面。

(一) 明确传播内容的传承性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守正与创新。要从马克思主义发展谱系中,阐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渊源以及两者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一是要强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解读。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所蕴含的科学方法仍然是我们今天战胜各种复杂问题的重要分析工具,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所勾勒的理想社会仍然是激励我们不断超越现存、超越自我的目标动力。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我们党肩负着繁重的执政使命的战略高度,多次强调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①。二是要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历史流变的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流变进程中形成的前后相继、一脉相承的理论形态。要引导大众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凝结着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以全新的视野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规律的认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②的深层价值意蕴。

(二) 注重传播内容的体系性

明确传播内容,应该注重传播内容的体系性,遵循“全面与重点相结合”的原则,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当作当下传播的重点内容。一方面,要引导大众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历史依据和现实根基,深刻理解其思想内容和科学理论体系,从而使人民群众真正懂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中、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创立并不断丰富发展的。在这一进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两个结合”,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另一方面,要使人民群众既对“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概括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了然于胸,也对概括阐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①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40页。

^②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2023年版)》,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8页。

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的“六个必须坚持”吃深悟透。使人民群众真正懂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不仅对党和人民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对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也具有重要引领和借鉴意义。

（三）强调传播内容的实践性

理论的作用在于指导实践，真正的理论必然具有改变现实的力量，这是理论的最高价值，也是理论最有吸引力的地方。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只有注重传播内容的实践性，才能让人民群众感兴趣，更好地被人民群众所吸收，才能转化为人民大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的强大精神动能。在当下主题教育过程中，我们不仅要深入学习研究宣传和创造性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力推进党的理论创新，还要注重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以问题为导向、以实践为指引，注重从如何能让广大人民群众真正领会、熟练掌握、学会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懂得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实践的角度进行宣传传播。因此，传播党的创新理论应该把抽象的理论以深入浅出、具有启发性、能够指导实践的方式方法进行传播，让人民大众能够将理论具象化为创新性的工作思路和行动策略，以此省察思想境界上的不足、理论认知上的偏差、工作思路上的差距，以学习成效推动工作成效，从而更好地观照现实，以问题为导向“破题解题”，这是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传播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三、实行传播方式的多样化，解决“怎么传播”的问题

近年来的相关研究表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传播方式是否恰当，与受众的关注程度、传播内容的吸引力之间显示出紧密的内在关联性。如果传播方式不恰当，即使传播内容具有科学性、真理性，往往也不能对受众产生持久吸引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创新，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②。这就要求创新传播形式，实现传播方式的多样化。

（一）实行“传导式”传播

传播范围是衡量传播效度的一个重要指标，而只有通过建立具有广泛性、全方位的传播机制才能确保传播的范围。这就需要建立能够实行“传导式”的传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②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340页。

播方式,以保障宣传的广泛性。通过“传导式”传播也意味着传播要纵向到底、横向到边。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宣讲团、基层党组织、第一书记等的示范引领作用,确保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传播纵向到底,确保传播过程中不变形、不走样,形成层层传导机制。近年来,各地基层组织根据自身的地方特色、发展实际、民众需求等,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传播进行了大量的实践探索,对其形成的各具代表性的传播风格,积累的可操作性强、对象性强、地域性强的传播路径,要及时进行总结、概括和提升,进一步宣传推广,以点带面转化为普遍性做法,形成整体效应。另一方面,机关、学校、企业、人民团体等要把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精神渗透到日常工作中去,更好地解决广大群众关心的热点、焦点和难点问题,确保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传播横向到边。特别是高校要注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传播与思政课程、课程思政、“大思政课”建设的有机衔接,确保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时融入课堂、照亮课堂,让课上知识与校园生活融合、与社会生活挂钩,形成从课堂到学校再到社会逐渐辐射的传播效应。

(二) 实行“生活化”传播

人们无时无刻不在生活,来自生活又回到生活是最接地气的思想传播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要注意把我们所提倡的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①按此逻辑,传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要注重生活化。日常生活最能够影响人们的认知、观念和行为,因而最好的传播方式就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生活化”传播。打个比方说,好的思想好比食盐,生活化传播方式好比高超的烹饪技艺,优秀的传播者善于把食盐放到色、香、味俱佳的菜肴当中,让人们不知不觉地吃下去,思想传播的功效就在里面了。例如,面对面的理论宣讲,要力求用灵动的语言表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力求从思想话语转化为“生活话语”,同时要注意增强互动环节,使一个人的“自说自话”转变为“多声部”的“同频共话”,让人民群众在不知不觉中感受和体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谛;在老百姓经常行走和游玩的地方,可以采用墙画、电子屏幕等形式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要义,让党的创新理论进入人民大众的眼睛、头脑、心灵;在城市和乡村的生活区域,可打造一批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的新时代故事叙事的文化长廊并逐步推广、辐射周边,让人民群众在轻松叙事中感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魅力和思想伟力。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65页。

（三）实行“仪式化”传播

仪式是人们开展活动的一种重要形式，能够烘托主题，让人更加专注地参与到一项活动之中，能够给人以现场触摸感，给人的感官带来更大的冲击力，让参与仪式的人更加清晰地记住仪式的内容，也让人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举行仪式的背后意蕴。因此，借助仪式推进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建立和规范一些礼仪制度，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庆典活动，传播主流价值，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和指导性，非常契合庄严肃穆的仪式场合。通过具有感染力又庄严肃穆的仪式、现场参与感和触摸感的程序与形式，让人民群众直接体验、学习和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蕴的立场观点方法，特别是其中的理论创新点、思想闪光点和经验结晶点。例如，在中华民族传统节日庆典、重大历史事件纪念活动、日常生活里的重要仪式中，可加入习近平总书记与主题相关的论述，朗诵、播放与主题相关的金句，这不仅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得到有效传播，更可以提升仪式的思想高度和“意义联想”，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重要理念深度嵌入人们的精神世界，在接受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洗礼的过程中不断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助力提升理论素养、思想品格和道德情操。

四、整合传播媒介，保证传播通道的畅通

媒介是信息传播的渠道，是保证信息能够传播开来进而决定传播广度和传播效度的重要因素。没有适当的传播媒介，就不能有效地将信息传达到接收主体，进而会影响接收主体对传播内容的认知度和接受度。随着数字化和信息化的发展，我们已然进入了一个公共传播“碎片化”和信息交流“扁平化”“多元化”的传播时代。这一重大变化不仅对旧有的传播理念和传播手段等提出了革新要求，也对整合传播媒介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一）充分发挥新兴媒体的技术优势

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思想宣传要跟上时代步伐。根据高新科技发展最新趋势，要注重研究、推进新兴媒介技术和新兴传播手段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传播中的应用，特别是通过大数据技术获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传播的真实现状，跟踪研究大数据对传播的影响，使大数据成为提升传播效果的利器。为此，政府要优先解决新媒体发展的技术瓶颈，追踪大数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65页。

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传播的复杂影响并提出应对思路；要加强网络不良信息的监管，提高监管水平，“科学认识网络传播规律，提高用网治网水平，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①；要加强高端的政治类专业网站网页建设，加大对马克思主义宣传普及类网站网页的财政扶持和政策倾斜力度；新闻媒体和公益类媒体要选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社会现实问题的恰当结合点，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契合人民所思所想；高校要高度重视微博、微信等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寻求利用“微传播”创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教学的新思路；培训机构要培养适应新媒体发展要求的复合型传播人才，提升应对网络风险意识和水平。

（二）深入挖掘传统媒体的内在潜力

在新媒体时代，虽然新兴媒体对传统媒体造成很大冲击，挤占了传统媒体的大部分传播空间，但是报纸、书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在信息稳定性、准确性、观感体验等方面依然具有新媒体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传播效能方面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说并没有过时。关键是在新技术和新媒体的影响下，要根据受众的阅读习惯、信息内容的传播形式、媒介的发展态势等方面实现观念和机制的转型，并根据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群体的受众的个性化传播需求，设定具有个性的传播内容。在受众选择媒体的新媒体时代，传播内容依然是传统媒体谋求突破的根本，低俗、暴力、虚假的内容只能带来一时的狂欢，更加全面、高质的内容才是赢得更多受众的法宝；要增强传统媒体与受众的互动渠道，通过设置沟通互动的平台和栏目，及时了解普通受众需求，提供更加贴近受众、贴近生活，更加接地气的服务；积极推动媒介融合，打造跨媒介传播集团，既发挥传统媒体的内容优势，又发挥新型媒体的传播效能，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传播的合力。

（三）严格信息把关与审查

思想传播媒介的差别在本质上只是传播方式的不同，而传播内容才是传播的关键，实现思想内容的有效传播才是传播的最终目的。在利用新兴媒体和传统媒体融合发展，信息传播渠道趋向多元化、自主化的大背景下，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传播，要注重对各种媒体的传播信息进行把关和审查。如果过多错误信息、不良思潮、有害观念充斥各种网络和社交媒体，必然会给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带来负面影响，甚至正面冲击公序良俗和社会美德。例如，近年来西方价值观通过各种便捷传播载体长驱直入，极大改变了党的创新理论传播生态。尤其是网络技术的发展增加了信息监管的复杂性，迅猛发展的网络载体为各种不良信息和反动思潮提

^①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339页。

供了滋生和传播的温床，使其能够在各种伪装下如鱼得水，不断侵蚀中国网民的价值体系。为此，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党的思想工作，充分认识不良信息和反动思潮在中亚国家“颜色革命”、西亚北非动乱中所起的负面作用，充分估量境外网络信息对大众的潜在影响。要充分利用技术手段反制网络媒体等不良干扰，进一步发挥新闻编辑、高校教师、宣传干事、社区管理人员等在信息把关、舆论引导和不良信息过滤中“守门人”的作用，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传播提供一个和谐、安全的外部环境。

五、进行受众细分和策略选择，确保传播有的放矢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传播是否取得实效，主要是根据受众接收传播内容后在态度、情感、价值观甚至行动模式等方面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来衡量的。在新媒体时代，受众往往根据个人兴趣爱好组成“小众化”的活动圈子，更加主动地根据自己利益需求接触了解自身感兴趣的传播内容。为此，必须树立以受众为中心的传播观，并针对大众传播、分众传播和人际传播进行不同的策略选择。

（一）注重大众传播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要转化为亿万人民群众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精神力量，必然要通过大众化传播这一路径。一般而言，大众传播是面向社会的，具有覆盖面广、传播速度快的特点。按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传播无缝衔接的原则，要积极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理论走向大众，在理论化与大众化之间建立沟通的桥梁。比如，对于广大农村地区这一传播的薄弱环节，理论工作者和宣讲人员要下足功夫，注重在传播内容上贴近农民生活，在要素呈现上契合农民认知结构，在话语表达上使农民喜闻乐见，在情感表达上激发农民“共情”；可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传播寓于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形式之中，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新举措等渗透进亲切的“故事”叙事之中，以收到亲切动人、入耳入脑之功效；也可结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传播打造以“乡村变迁史”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为主题的系列短视频，激发视觉的冲击感、历史的体验感和现实的触摸感，使农村群众在找到心灵归属感的同时增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情感认同。

（二）加强分众传播

大众传播是一般性传播，要想有效提升传播效度，除了进行大众广谱传播之

外,还要进行有针对性的分众传播。要把受众群体细分为不同类型的小众群体,结合受众具体特点制定更加富有个性特色的传播内容,实现分众传播。从很大程度上说,分众传播实现了从“以吸引大多数注意力为目标”到“以吸引某特殊群体注意力为目标”的转化,根据不同受众群体的特点进行策略选择,提高了传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例如,可结合基层群众的认知特点与身边发生的精准扶贫、防疫抗灾等生动事例,紧扣群众所思所盼,多视角、多向度解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而就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分众传播”而言,青年学生是极其重要的受众。以此受众为例,要深入分析青年学生这一群体自我意识强烈甚至叛逆心理较为普遍的突出特点,结合其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认知和认同情况,对其进行定向、定量、定点的理论宣传和教育引导;要基于网络身份的匿名性所真实反映的青年人的心理状况和思想脉动,通过网络舆情分析精准把握青年人的诉求,制定个性化的传播策略,如此才能提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传播的前瞻性和针对性。

(三) 引导人际传播

“我说我好不算好,人说我好才算好。”提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效果,要注重受众之间的传播,因为受众往往也是潜在的传播者。一般而言,受众之间的人际传播具有灵活性、直接性、直观性的特点。在新媒体迅猛发展的新时代,新媒体及相关传播技术对人际交往的过程产生了深刻影响,人的情感表达、思维方式和价值偏好等也因此发生了变化,这就为人际传播的理论构建和实践运用提出了新课题。“理念常常缓慢地渗入作为整体而存在的公众之中,更为重要的是,这往往是通过邻里之间的互动而得以实现的,大众媒介在这一过程中并没有产生任何明显的影响。”^① 具体而言,人际传播在功能、方式和手段等方面出现了种种新的特点,出现了不同于传统人际传播的传播现象。因此,要在掌握新媒体环境下人际传播新特点、新变化、新规律的基础上,引导民间力量以不同的角色和形式融入传播流程,特别是充分发挥“邻里”在人际传播中的重要作用。

综上,在主题教育中,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传播需要树立系统观念,需要执政党、政府、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以及社区、公民个人等联合起来,形成同向同行的整体合力,积极探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传播的规律,为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促进意识形态安全协同着力,为党和国家事业的长久安定繁荣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业长久、持续、稳定地提供思想统一、行动力统一的基础。

^① [美] 伊莱休·卡茨、[美] 保罗·F. 拉扎斯菲尔德:《人际影响:个人在大众传播中的作用》,张宁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页。

Multi-dimensional Optimization of the Publicity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Zhang Yifan Zhou Qi

Abstract: The learning and publicity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should not only rest on reading classics, studying texts and learning theories, but should rather promote the thought from the classics to the public, from the texts to life and from the theories to dissemination. The publicity of the new thought includes the following ways: first, constructing the structure of “big publicity subje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Who will publicize”; the second is to clarify the content in publicity to answer the question of “What to publicize”; the third is to diversify the means of publicity and solve the problem of “How to publicize”; the fourth is to integrate the media and ensure the smooth publicity channels; and the fifth is to carry out audience segmentation and strategic choices to ensure that publicity is targeted. Through the multi-dimensional optimization,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ublicity of Xi Jinping Thought will be constantly enhanced.

Keywords: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Popularity; Publicity

[责任编辑：靳贺]

新时代大学生传承红色革命文化的路径探析^{*}

陈 欣^{**}

【摘 要】红色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百年实践探索中形成的宝贵财富和优良传统，开展红色革命文化传承教育可以为新时代大学生成长成才提供力量源泉。红色革命文化以其特有的民族性、时代性和人民性为社会主义文化注入红色基因，并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鲜红的价值底色。在红色革命文化的传承过程中，党和国家通过多种方式对其进行传播和推广，这是红色革命文化自身力量的展现，也是历史发展与现实需要推动的结果。在对新时代大学生进行红色革命文化传承教育时，要坚持以“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为基本遵循，逐渐探索出坚持中国共产党对红色革命文化传承教育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主渠道主阵地作用和创新“两个转化”的传承教育方式的具体路径，以推进红色革命文化在新时代大学生中的传承。

【关键词】红色革命文化；中国共产党；新时代大学生；传承；路径

红色革命文化是新时代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力量源泉。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红色革命文化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以其特有的红色基因肩负起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的历史使命，并推动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诞生与发展。可以看出，传承红色革命文化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抓好青少年学习教育，着力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传承。”^①这就将传承红色革命文化的重任放在了青年人肩上，因为“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中国青年始

^{*} 本文系202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高校辅导员研究）“建党百年革命精神融入青年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究”（立项编号：21JDSZ3209）阶段性成果。

^{**} 陈欣，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与人的全面发展。

^①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6页。

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①。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新时代大学生将继续肩负起民族振兴的历史重担，不断坚定自身的理想信念、锤炼意志品质，努力成为党和国家事业的奋进者、开拓者和奉献者。伴随着国际上思想文化相互碰撞的加剧和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新时代大学生肩负起新的历史使命，具有新的思想特点及新的需要，这些变化都给红色革命文化的传承教育带来挑战。因此，要探索出红色革命文化在新时代大学生中传承教育的具体路径，让新时代大学生从红色基因中汲取思想智慧和精神力量，以实现自身的成长成才并推进红色革命文化的代代相传。

一、红色革命文化与传承

红色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探索历程中所形成的宝贵财富和优良传统，其产生和发展与我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形成了一种相互支撑的动态平衡关系。红色革命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刻的内涵及传承价值，其传承过程是一个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历时性实践进程，引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向着先进的方向发展。

（一）红色革命文化的内涵要义

红色革命文化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有着深刻的内涵。国内理论界对红色革命文化内涵的讨论一直都在进行，特别是从时间维度对其进行界定，主要从两个角度进行了解释：一是从狭义角度上看，认为红色革命文化特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化；二是从广义角度上看，认为红色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实践中取得的文化成果。本文根据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立论的第一句话“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②，对红色革命文化的内涵进行以下三方面的阐发，一是红色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经历了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实践后探索出的文化成果；二是红色革命文化是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于实践探索中对民族精神的深化与升华；三是红色革命文化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为中华民族重塑文化自信提供了力量之源。

红色革命文化具有民族性、时代性和人民性的特征。首先，红色革命文化的民族性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性转化与升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红色革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思想沃土和精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页。

^②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神之源,包括爱国主义精神、艰苦奋斗精神等。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红色革命文化又创造出具有时代特征的民族精神,让中华民族屹立在世界之林。其次,红色革命文化的时代性彰显出了自身因势而进、因时而新的生命力,并推动着时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同时,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推动其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为党和国家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最后,红色革命文化的人民性是其形成和发展的动力,反映出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价值宗旨。人民性是红色革命文化的基本特质。“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人民是我们事业发展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①坚持为人民服务,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进一步推动红色革命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发展。

红色革命文化与传承有其内在的相关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②文化本身具有传承性,其发展演变是一脉相承、承上启下的。红色革命文化是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并结合时代特征而生成的,具有鲜明的传承性。中国共产党是红色革命文化的真正传承者和弘扬者,能够根据历史的变迁不断发挥红色革命文化的优势和价值,以有效地解决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困境,这是一种动态的传承观。红色革命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传承,其所传承的红色基因却不仅仅是简单的复制,而是赋予了它新的时代新意。“传承是创新的活水源头,创新是传承的与时俱进。”^③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所创造的红色革命文化,不断引领中华民族向前发展,并在发展中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夯实了党的执政基础。

(二) 红色革命文化传承的具体形式

红色革命文化有其存在和传承的具体形式。其存在形式主要包括“精神、制度、器物”^④,而要将这一具体的红色革命文化传承下去,就需要有具体的传承形式。

一是通过创办报刊传承红色革命文化来提升其传承的广度和力度。报刊作为红色革命文化传承的主要方式,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了许多有影响力的报纸、期刊,以提升群众的斗争意识,传播革命火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了《前锋》《中国共产党党报》等报刊,虽然发行时间短暂,但其为党早期的宣传工作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及改革开放时期,《人民日报》《红旗》《求是》的创办,始终肩负起思想传播和宣传引领的作用,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提供中国方案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通

① 《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8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64页。

③ 李旻、张允熠:《论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思想理论教育》2017年第5期。

④ 马云志主编:《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12页。

过创办各类学校为红色革命文化的传承奠定人才基础。人是红色革命文化的创造主体和传播者,通过开展各类形式的教育培训可以激发人内心的追求、提升自身的觉悟,并为革命的动员工作夯实基础。这一时期党创办了许多革命与建设所需的军事学校、干部学校、职业技术学校等,为红色革命文化的传承提供了人才支撑。三是通过组织实践活动倡导红色革命文化传承的新风尚。宣传马克思主义与革命思想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将这一理论成果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示出来,其中文艺活动就是重要的传播形式。文艺活动主要包括活报剧、话剧、京剧、木偶戏等多种形式,打造了别开生面的红色革命文化传播渠道。此外,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纪念庆典活动。通过一些重大节日、典型人物、重要事件、遗址旧址等参观学习活动,培养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怀、增进人民的认同,以增强红色革命文化传承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四是通过加强红色革命文化的制度化、法制化建设,为其传承提供制度保障。中央出台的传承红色革命文化的相关政策,有力地推动了红色革命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各地区也相应出台了许多地方性法规,以保护和传承红色革命文化,对于坚定文化自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 红色革命文化传承的动力分析

需要是动机产生的前提和基础。红色革命文化得以传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现实需要的促进及其内在力量的驱动所共同推动的。从历史动力看,传承红色革命文化是历史发展的需要。红色革命文化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沃土,其发展与传承的文化形态都不可能完全脱离传统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传统还影响着红色革命文化的历史选择和发展方向。“任何一种文化,既要在继承与发展的选择过程中确立其源头性,又要在摒弃与修正的选择过程中开拓其发展性。”^①因此,进行文化选择成为传承红色革命文化的重要环节。进行文化选择主要是根据社会中存在的具体问题而进行的选择、摒弃和修正,这也赋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内涵与意义,推动了其现代化转型。在这个过程中,红色革命文化还坚决抵制和清除一些不良文化,以保障红色革命文化鲜明的民族特色及时代特征。

从现实动力看,传承红色革命文化是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②,这也成为推动红色革命文化传承的现实动力。鸦片战争以后,我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主权与领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人民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并走上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在这一实践过

^① 李霞:《论红色资源的文化价值及其实现》,《求实》2013年第3期。

^②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0页。

程中,红色革命文化不断形成和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①。因此,文化创新成为传承红色革命文化的关键核心。进行文化创新,主要是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对红色革命文化的主要内容、传播方式、传播载体等进行创新,这一创新成果反映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并提升了红色革命文化的吸引力、感召力和震撼力。在这个过程中,还将一些发展中涌现出的新的英雄人物及时代精神纳入红色革命文化,以拓展红色革命文化的内容,更有效地推动红色革命文化的传承。

从内在动力看,传承红色革命文化是其内在精神动力所驱动的。《“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中提到“文化是重要力量源泉,必须高扬思想旗帜、强化价值引领、激发奋斗精神,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进文化铸魂,增强全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创造力”^②。这突出了红色革命文化中所蕴含的精神力量,这一精神力量引领人们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这是各族人民为实现美好生活所需要的力量,也是红色革命文化传承的内在动力。而传承红色革命文化主要是通过将红色革命文化 with 教育相融合,让红色基因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融入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并且,创新红色革命文化的传播方式,以参观、游览等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对人们进行宣传,从而增强红色革命文化的感染力和吸引力。

二、红色革命文化在新时代大学生中传承教育的基本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③。因此,在对新时代大学生进行传承教育时就要坚持党的教育方针,以“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和为谁培养人”为基本遵循,让红色革命文化为新时代大学生成长成才明确目标、提供丰富的精神养料。同时,在大学生传承红色革命文化过程中坚持这一基本遵循,有利于推动红色革命文化的广泛传播,使其为更多人铸就奋楫笃行的精神之魂。

(一) 坚持以“培养什么人”作为传承教育的出发点

红色革命文化通过加强学生的理想信念、提升他们的道德情操、确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养成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等,增强新时代大学生的志

①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12月1日。

② 《中办国办印发〈“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人民日报》2022年8月17日。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6页。

气、骨气、底气，让他们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增强志气就要坚定新时代大学生的理想信念。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在实践中砥砺前行，最终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个过程中，虽然面临的困难不同、所处的社会阶段不同、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同，但其理想信念的内核始终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红色革命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深刻反映出坚定理想信念的重要价值，这是中国人志气的生动阐释，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源泉。新时代大学生是红色革命文化的弘扬者和传承人，不仅要从小理论层面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更要从实践的广度积极践行这一信仰，在面对艰难困苦时能够迎难而上、披荆斩棘，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

增强骨气就要不断提升新时代大学生的道德品质。红色革命文化作为先进的、积极的文化，对新时代大学生具有很强的教育意义。从革命、建设、改革到新时代，无数英雄人物以他们高尚的道德情操为新时代大学生做了榜样示范，以引领大学生学习红色革命文化，激励他们不断提升自身的道德品质，有助于大学生形成正确的社会主义道德观。中国共产党在百年的奋斗历程中构建了伟大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高尚的政治品质，这成为增强新时代大学生骨气的重要红色资源。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中，大学生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与更复杂的环境，这就需要他们不断从红色革命文化中汲取力量，以提升自身的道德品质、克服困难、增强骨气，自觉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

增强底气就要厚植新时代大学生的爱国情怀。红色革命文化的诞生是在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所产生的。红色革命文化中蕴含着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这是民族精神的核心，也是无数仁人志士救亡图存、报效祖国的结晶。爱国主义始终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是红色革命文化的主旋律。新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其最原始的动力就来自于爱国情怀，这是中华民族的最本质特征，也是红色革命文化最深层的底蕴。新时代大学生的底气正是来自中国共产党百年艰苦奋斗的伟大成就，以及为人民服务的奋斗宗旨，这是红色革命文化为新时代大学生成长成才提供的宝贵财富，引领着大学生正确认识世情、党情和国情，将自己的人生与国家的命运相联系，促进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统一，进一步激发大学生的爱国情怀。

（二）坚持以“怎样培养人”作为传承教育的中心环节

红色革命文化在社会实践中生成、发展、繁荣，其蕴含的红色基因具有鲜明的实践性，这不仅有效引领新时代大学生肩负起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也以丰富的育人经验为新时代大学生成长成才提供了方向指引。

坚持用红色革命文化为新时代大学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提供价值指引。中国共产党在百年的奋斗历程中，始终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选贤任能的人才培

养准则,为党和国家的发展繁荣提供了人才保障,也为新时代大学生传承红色革命文化指引了方向。红色革命文化与立德树人工作是紧密相连的,始终为培养党和国家需要的人才提供价值指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基因就是要传承。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经历了多少坎坷,创造了多少奇迹,要让后代牢记,我们要不忘初心,永远不可迷失了方向和道路”^①。新时代大学生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传承好红色基因是大学生的重要职责与首要任务,其中所蕴含的艰苦奋斗、勇于奉献、不屈不挠等一系列革命精神,也引导着新时代大学生向革命先辈学习。

坚持用红色革命文化为新时代大学生成长成才提供育人经验。红色革命文化蕴含着丰富的育人经验,这是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实践探索总结出的宝贵经验。对于新时代大学生的培养首先就要重视立德树人,“立德”是“树人”的前提和基础,“树人”是“立德”的价值旨归。新时代大学生应该坚守红色革命文化,真正做到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坚守自身的初心和使命。同时,也要勇于摒弃一些落后的、消极的思想观念,敢于结合实际、大胆革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传承和创新红色革命文化的成果,让红色革命文化始终具有先进性和革命性,为新时代大学生提供人生指引,也为其成长成才提供宝贵的经验启示。

坚持用红色革命文化为新时代大学生全面发展提供具体方式。党的教育方针始终强调教育与实践锻炼相结合的方式,在对新时代大学生进行理论教育的同时,提升其参与实践教育的机会,让大学生认识到现实中的具体困难及所处环境的复杂性,以激励自身的斗志、培养辩证的思维方式,能够用客观、公正、全面的立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并且,实践活动可以有效增进人民群众与大学生群体之间的情感,推动大学生思想进步,从而有利于提升大学生自身的专业知识,加强自身的行为规范,将培养思想政治素质放到突出位置。在新时代,多种社会思潮相互交织、碰撞,对大学生的思想意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就更需要通过理论教育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强化大学生的道德素养、坚定理想信念,将红色基因更好地传承下去。

(三) 坚持以“为谁培养人”作为传承教育的落脚点

红色革命文化具有鲜明的党性和人民性。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是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上形成的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也是红色革命文化的鲜明特征。同时,高等教育的主要职责包括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内容,其核心与使命也是强调为人民服务、为社

^① 《习近平李克强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分别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一些代表团审议》,《光明日报》2018年3月9日。

会服务，这与红色革命文化的鲜明特征相一致。

坚持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是新时代大学生践行党的根本宗旨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① 红色革命文化具有鲜明的人民性，革命实践的主体是人民，革命实践的成果由人民共享，革命实践的目的是实现人民生活幸福。新时代大学生是党和国家发展的新生力量，是传承红色基因的主力军，坚持为人民服务是新时代大学生的使命与担当，也体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因而，决定生产力向前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人，离开了人这个社会主体，人类社会的发展就失去了应有的价值。”^② 可以看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政治本色，也是红色革命文化的重要特征，只有明确“依靠谁、为了谁和服务谁”的根本性问题，才能引导新时代大学生确立为人民服务的价值理念，从而推动新时代大学生积极参与国家建设，并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出自己的贡献。

坚持增强“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是新时代大学生的首要任务。这一内容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符合我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并且，它不仅是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未来发展的思想基础。随着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国外环境日益复杂多样，出现了许多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红色革命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为人民服务，要让这一红色基因传承下去就需要新时代大学生增强“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将这种精神力量转化为实践动力，并始终秉持为人民服务的信念，以更有效地凝聚起党和人民的力量，从而推动红色革命文化在新时代大学生中的传承，不断提升新时代大学生辨别是非的能力，激发其创新精神，坚定自身理想信念，始终为祖国和人民砥砺前行。

三、红色革命文化在新时代大学生中传承教育的实现路径

红色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传承红色革命文化不仅要“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和为谁培养人”为基本遵循，还要探索出红色革命文化在新时代大学生中传承教育的具体路径，以推动红色革命文化代代相传。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对红色革命文化传承教育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是红色革命文化传承教育的主要践行者和引领者。“教育事业具

^①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8页。

^② 郑士鹏、蔺云帆：《中国共产党人民观百年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逻辑》，《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党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领导作用。”^① 特别是红色革命文化的传承教育，具有鲜明的党性和人民性，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为红色革命文化的传承教育提供保障。

坚持党的教育方针为红色革命文化的传承教育提供行动指南。中国共产党对红色革命文化传承教育的全面领导，有助于引领红色革命文化传承教育的政治方向和根本立场不动摇。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坚定的政治立场是红色革命文化得以传承的首要前提，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探索历程中得出的宝贵经验。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方针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所得出的创新性理论成果，这一成果也为新时代大学生“传承什么红色革命文化、怎么传承红色革命文化、为什么传承红色革命文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大学生而言，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党的教育方针根据新时代大学生自身成长成才的需要及社会中存在的具体问题，为新时代大学生提供了科学的实践指南，从而更有效地提升了新时代大学生的自身素养，激发他们传承红色革命文化的行动自觉。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为红色革命文化的传承教育提供基本原则。红色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理论成果，而群众路线作为党的生命线贯穿于党治国理政的全部活动之中。在新时代，传承红色革命文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对“我是谁、依靠谁、为了谁”群众路线的深刻回答，也是新时代大学生传承教育的根本目的。因此，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新时代大学生传承红色革命文化的基本原则。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有着独特的文化和国情，在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中思想文化相互交织、碰撞，给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了巨大的隐患。所以，“对内，我们要牢牢掌握国家意识形态领导权；对外，要掌握国际层面的意识形态主动权”^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立足新时代新使命，全方位开展新时代大学生红色革命文化传承教育，阐释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并不断构建科学的话语体系，以夯实党的执政基础，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二）充分运用主渠道和主阵地

红色革命文化在新时代大学生中进行传承教育，离不开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和高校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两个重要路径，其教育使命与红色革命文化传承教育的使命相一致，都是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① 秦惠民、曹翼飞：《建党百年来党的教育方针的传承与创新》，《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4期。

^② 唐爱军：《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风险 坚定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2年第7期。

高校思政课坚持立德树人,其根本任务旨在解决教育的根本问题——“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将革命文化讲深、讲透、讲活,以提升大学生革命文化教育的实效性。这就要坚持思政课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的教学原则,不断推动线上线下两种教学方式的相互融合,以提升思政课的亲和力与针对性。红色革命文化是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将中国的具体实际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而产生发展的,与大学生成长成才有着密切联系。只有让大学生深刻认识到今日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才能让他们真正认同革命文化,并激发他们学习革命文化的热情。为了提升思政课的教学效果,需要运用多种教学方式、更新教学内容,用最贴近新时代大学生的学习方式对其进行教授。如《那年那兔那些事儿》《五四特别版错位时空》等作品的播出,受到了无数大学生的欢迎,进一步激发了大学生学习红色革命文化的热情,这也为提升思政课的教学效果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教学材料。同时,还要灵活运用网络授课,不断推动资源开放、信息共享、过程交互、选择自主等网络教学,使其与现实教学相互配合,让教学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从而使红色革命文化浸润大学生的心田。

高校日常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开展多种活动,推动了新时代大学生“知”“行”的统一,以促进大学生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在实践活动中,大学生不仅可以将所学习的知识和技能在实践中进行检验,也可以在接触社会的活动中深切认识社会发展变化的面貌,获得直观的认识和感受。大学生群体作为社会中最具活力、最具发展潜能的群体,他们对社会的认识及对知识技能的转化能力,都直接影响着大学生群体力量的凝聚及发挥。这有助于大学生群体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大学生群体可以通过社会实践提升自身的思想政治素质。理论源于实践,只有在实践中不断接触事物,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并掌握其发展规律。

(三) 创新“两个转化”的传承教育方式

红色革命文化在新时代大学生中进行传承教育,需要通过创新“两个转化”的教育方式提升传承教育效果。“两个转化”主要是指红色革命文化话语的转化和红色革命文化网络媒介的转化,都是红色革命文化根据时代特征所作出的相应调整。

红色革命文化话语的转化有助于拓展其传承教育的广度和深度。红色革命文化在新时代大学生中的传承教育要不断创新话语表达形式,以更生活化、大众化的语言和形式推进红色革命文化的传承。红色革命文化的话语转化主要将历史文本话语向大众生活话语转化、灌输教育话语向情感互动话语转化,让红色革命文化以通俗化、大众化的话语形式出现在大学生的生活和学习中。同时,教育者要转变以往的灌输教育方式,以平等对话的沟通方式和动人的革命故事对大学生进

行情感培养,以提升红色革命文化传承教育的效果。这一话语转化能促进红色革命文化与时代特征紧密结合,及时回应现实中存在的社会问题,并丰富红色革命文化的时代内涵。具体来看,一是推动历史文本话语向大众生活话语转化。话语是指“在特定的社会、文化、历史环境下,人们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事件或这样一类现象”^①。红色革命文化具有重要的价值理念与思想理念,为了让大学生更有效地将红色革命文化内化为自身的行为,需要将红色革命文化的历史文本话语转化为大众话语,尤其是针对新时代大学生多样化、个性化的需要,要积极吸纳网络话语、流行话语等时尚元素,不断增强话语的趣味性和感染力,以发挥红色革命文化大众话语的价值和功能,从而提升大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让他们在新征程中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争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二是将灌输教育话语转化为情感互动话语。这就需要通过不断增强教育者话语情感的表达力,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以情感人、以情动人、以情育人的重要作用,让大学生对红色革命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并产生情感共鸣,以触动大学生的心灵。深度、枯燥的理论被转化为大学生感兴趣的话语,也拉近了教育者与大学生之间的关系,增进了大学生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情感,使大学生将红色革命文化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进而推动红色革命文化传承教育的实现。

红色革命文化网络媒介的转化主要是将以往的网络媒介向更高的平台推进,以更多样的传播方式、更丰富的传播内容、更生动的传播效果来提升红色革命文化对新时代大学生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元宇宙作为多种技术集成的生态系统,以虚拟现实技术、数据交互技术、情感沉浸技术等为支撑,不断构建超越物理世界的“元宇宙生态系统”,这在不同程度上也影响了高校红色革命文化教育的模式及方式,为大学生传承红色革命文化提供了新的路径。具体来看,一是元宇宙技术创设的革命文化教育动态场景,提升了大学生对红色革命文化的情感体验。部分高校运用元宇宙技术创建了“红色革命文化虚拟体验馆”“爱国主义教育体验馆”等,让大学生在身临其境中感受红色革命文化的深刻内涵,以此来提升他们的情感价值。二是元宇宙技术丰富了大学生红色革命文化传承教育的方式,拓宽了大学生学习的具体路径。大学生不仅可以在校内外参观元宇宙技术构建的红色革命文化体验馆,还可以自主使用一些辅助设备,体验AR、VR等技术,以满足自身多样化、个性化的需要。可以看出,未来元宇宙技术或将成为大学生红色革命文化教育的重要方式,对大学生红色革命文化传承教育发挥重要的作用。

^① 施旭:《文化话语研究:探索中国的理论、方法与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四、结语

红色革命文化连接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在新时代大学生中传承红色革命文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其主要内容是根据每一时代的特征不断创新发展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为人们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了精神养料。随着国内国际形势日益复杂多样，新时代大学生的需要也逐渐向多样化、多层化转变。为了培育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红色革命文化将继续发挥自身的功能，为新时代大学生明确奋斗目标、坚定理想信念，激励他们参与实践活动，并引导新时代大学生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肩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从而推动红色革命文化代代相传。

Analysis of College Students' Path in the New Era to Inherit the Culture of the Red Revolution

Chen Xin

Abstract: The red revolution culture is a valuable wealth and fine tradition form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hundred years of practical exploration led by th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in the country, and carrying out the inheritance and education of red revolution culture can provide a source of strength for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new era. The red revolutionary culture injects red genes into socialist culture with its unique national, epochal and people's nature, and gives the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 bright red value background. In the process of inheriting the Red Revolution culture,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have disseminated and promoted it in various ways, which is the display of the Red Revolution culture itself and the result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practical needs. When conducting education on the inheritance of the Red Revolution culture for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new era, it is necessary to adhere to the basic guidelines of "who to cultivate", "how to cultivate" and "for whom to cultivate", and gradually explore specific paths for adhering to the comprehensiv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ver the inheritance and education of the Red Revolution culture,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the main channel as the main front, and innovating the inheritance education method of "two

transformations”, so as to promote the inheritance of the Red Revolution culture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Red Revolution Cultur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New Era College Students; Inheritance; Path

[责任编辑: 靳贺]



动 态

坚持“六个相结合”，书写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研究的新篇章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研究丛书”评介

赵信彦 高 奇*

【摘要】“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研究丛书”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研究”的标志性阶段成果，本批次共出版六部著作。该套丛书坚持主题鲜明与结构严谨相结合，坚持历史考察与逻辑揭示相结合，坚持宏观建构与微观叙事相结合，坚持文化理论与具体实践相结合，坚持学理性与通俗易懂相结合，坚持个案分析与整体评述相结合，书写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研究的新篇章。这是一套主题鲜明、结构严谨、理论翔实、视野广博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研究佳作，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六个相结合”；评介

近日，由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研究团队首席专家周向军教授担任总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研究丛书”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该套丛书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研究”的标志性阶段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研究团队着力推出的重要创新性成果。该套丛书由首席专家、项目课题组成员、各部书稿负责人及其成员共同完成，近300万字。本批次共出版六部著作，分别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史》《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体系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研究》《马克思主义人文文化理论发展研究》《马克思主义科学文化理论发展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重大问题研究》。

* 赵信彦，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高奇，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科技哲学。

—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史研究》由何中华、周向军等著。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有一个完整的发展谱系,形成了自身的传承与创新逻辑。该书分为七章,梳理研究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文化理论。具体而言,主要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文化理论,普列汉诺夫文化理论,列宁文化理论,斯大林文化理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理论,毛泽东的文化理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理论。该书总结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发展史及其脉络,对于新时代进一步增进文化自信、坚定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体系研究》由周向军、郝立忠、高奇等著。该书分为上篇、中篇、下篇,研究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科学体系。上篇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体系中关于文化的一般性理论,主要阐述了文化的本质与特征、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文化的形态与形成、文化的功能与价值、文化的传播与选择、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等理论。中篇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体系中关于文化的特殊性理论,主要阐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世界文化与民族文化、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意识形态文化与非意识形态文化、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资本主义文化与社会社会主义文化等理论。下篇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体系中关于文化的个别性理论,主要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与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产生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道路等理论。该书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科学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理论借鉴价值。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研究》由傅永军、付文忠等著。该书主要研究政治的文化理论与批判的文化理论——从卢卡奇到哈贝马斯的发展,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中的“文化转向”“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发展中表现出来的两种文化研究范式,阐述文化理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发展和成就,并分析批判其中存在的问题。下篇主要研究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从霍尔到鲍德里亚的发展,具体而言,研究了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四种形态: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研究理论、詹姆逊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拉克劳与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的文化理论。该书主要围绕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在重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基础上,试图构建富有时代特色和生活气息的文化理论,这对拓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发展空间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人文文化理论发展研究》由谭好哲等著。人文文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除绪论外，该书包含三篇，分别是马克思主义艺术文化理论发展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文化理论发展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理论发展研究，每篇又分为历史发展、基本内容、问题与前景三个部分，全书共九章。该书的意图是在当代社会与文化发展的现实语境中对马克思主义人文文化理论的历史发展和理论贡献作出科学的梳理和建构，从而为当下的文化研究增添新的思想内容，为当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及其繁荣发展提供切实有力的指导和助力。

《马克思主义科学文化理论发展研究》由马佰莲等著。马克思主义科学文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重要内容，也是表征和展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代性的重要领域。该书分为五章，分别是科学文化的基本内涵和价值、马克思主义科学文化理论的形成与基本内容、马克思主义科学文化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研究传统的形成、马克思主义科学文化理论在中国的创新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文化与社会文化协同发展。该书可为制定科技政策提供理论借鉴，为当代科学实践中产生的理论问题的解决提供指导。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重大问题研究》由周向军、施秀莉等著。本书主要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重大问题中的四个基本问题：文化领导权问题、核心价值观问题、传统文化观问题、文化形态问题。此外，该书还介绍了一些其他重大问题，如文化自觉问题、现代性与社会主义精神问题等。该书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若干重大问题的研究，有助于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提供一定理论支持和对策建议。

二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①“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研究丛书”的出版之所以契合这一新的文化使命，之所以能够融会贯通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发展真谛，开辟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研究的新视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坚持“六个相结合”，书写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研究的新篇章。

其一，坚持主题鲜明与结构严谨相结合，清晰勾勒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

^①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民日报》2023年6月3日。

的研究全景。该套丛书围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的总主题,以六大分主题谋篇布局,出版六部著作,每部著作都有明确的结构和内容安排,既体现了各自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又体现了整体的协调性和连贯性。该套丛书系统阐发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的基本原理,提纲挈领地探讨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的实践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指导价值。

其二,坚持历史考察与逻辑揭示相结合,梳理和探索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的历史和规律。该套丛书注重运用历史方法考察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的脉络,在此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规律,着力实现逻辑与历史的有机统一。比如,《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史研究》一方面从历史层面出发,梳理考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文化理论形态的历史发展脉络;另一方面从逻辑层面出发,首先考察了这些相对独立的文化理论形态是怎样形成的、怎样发展的,其基本内容是什么等,同时考察这些相对独立的文化理论形态各自的历史地位如何,揭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体系中各相对独立的理论形态前后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内在联系。

其三,坚持宏观建构与微观叙事相结合,系统铺陈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的内容篇章。该套丛书既注重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的总体概括和基本原理的阐述,又注重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中的具体问题和重大事件的微观探讨,使该套丛书既有系统性又有全面性。比如,《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体系研究》宏观上分为上篇、中篇、下篇,分别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体系中关于文化的一般性理论、特殊性理论、个别性理论;微观上,各篇内容主要阐述了文化某个细节方面的问题。又如,《马克思主义人文文化理论发展研究》宏观上包含三篇,微观上每篇又从历史发展、基本内容、问题与前景三个部分展开叙事,是中国人文文化领域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的一个时代性拓展。

其四,坚持文化理论与具体实践相结合,力求实现理论实践化与实践理论化的统一。一方面,该套丛书注意体现实践理性,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原理与文化具体领域相结合形成的具体文化理论,比如人文文化理论、科学文化理论等。在各个具体文化理论中,还研究了更加具体的文化理论,比如在人文文化理论中就包括哲学文化理论、历史文化理论、文艺文化理论;在科学文化理论中探讨了自然科学文化理论、社会科学文化理论等。另一方面,该套丛书注重在实践基础上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基本理论问题,又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视野下观照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新经验,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概括,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创新和指导实践的统一。

其五,坚持学理性与通俗易懂相结合,阐释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发展创新。比如,《马克思主义科学文化理论发展研究》不仅以扎实的文本功夫展开学理性研究,而且结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语境以深入浅出的语言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文化理论在中国的创新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文化与社会文化协同发

展等。再如《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重大问题研究》，不仅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重大问题中的基本问题，还从新媒体环境视角研究了大学生德育创新等问题。质言之，该套丛书条分缕析，既坚持理论研究的高度，又坚持叙述上的通俗易懂，体现了二者的统一。

其六，坚持个案分析与整体评述相结合，深化拓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发展空间。该套丛书注重对各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成果、代表人物进行个案分析，再上升到一般分析或总体概括。比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研究》上篇主要以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本雅明、哈贝马斯等为代表性个案，研究政治的文化理论与批判的文化理论。如指出由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所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传统或者思想潮流，强调阶级意识、文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的重要性，要求放弃机械的经济主义和科学主义思想立场，从反抗资产阶级国家的意识形态控制和启发工人阶级集体自我意识的觉醒等角度，揭示促动社会变革诸种变量中比经济因素更为隐蔽的文化与观念动因，并进一步借助对文化霸权争夺战略的实践分析，重写人类解放叙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视角转换和主题更新。下篇选取在文化领域作出建树的斯图亚特·霍尔、詹姆逊、拉克劳、墨菲和鲍德里亚为代表人物，概括总结他们关于文化理论的主要观点，评述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的贡献及理论局限性。该套丛书适应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时俱进的发展需要，坚持个别与一般相结合，从更深层次上认识马克思主义文化发展规律，对拓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发展空间具有重要意义。

三

综上，该套丛书立足学术前沿，坚持“六个相结合”，系统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的历史面貌和发展创新，是一套主题鲜明、结构严谨、理论翔实、视野广博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研究佳作，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和创新性，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丰硕的精神食粮。该套丛书在理论上既回应了当下社会和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研究的迫切需求，又为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具体而言，就是有利于深化拓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研究，展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的当代性，从更高层次上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体系；在实践上有利于总结和吸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的经验教训，更好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进一步推进文化强国建设。

当然，该套丛书也存在一些不足和有待完善之处。虽然该套丛书涵盖了马克

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的诸多方面和层面，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体系十分庞大，且丛书篇幅有限，仍有一些重要的文化理论发展形态没有深入研究或涉及较少，比如数字文化理论、智能文化理论、媒介文化理论等。这些文化理论发展形态是当代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重要特征和趋势，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启示。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进一步探索和拓展这些文化理论发展形态的研究内容和视角，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更加有力的理论支撑。

Write a New Chapter on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Cultural Theory through Adhering to “Six Combinations”

—Introduction on the Series of Marxist Cultural Theory Development

Zhao Xinyan Gao Qi

Abstract: The series of Marxist cultural theory development is a significant stage result of a major research project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fund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this batch, a total of six books have been published. The authors adhere to the combination of clear theme and rigorous structure,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and logical revelation, macro-level construction and micro-level narrative, cultural theory and concrete practice, scientific rationality and popularity, as well as individual case analysis and comprehensive review, and have written a new chapter on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cultural theory. Characterized by its clear theme, rigorous structure, theoretical depth and broad vision, this series is an excellent research work in the field of Marxist cultural theory development with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

Keywords: Development of Marxist Cultural Theory; Six Combinations; Review

[责任编辑：靳贺]

增强探寻“中国之理”的使命担当

——“第三届全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术研讨班”研讨述要

刘清云 武晓玮*

【摘要】2023年8月5~6日,由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会主办,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威海)、《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编辑部联合承办的“第三届全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术研讨班”在山东大学(威海)举行。与会学者围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三大体系”建设、“两个结合”的内在逻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的中国立场和方法论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提出了具有创见性的观点和思路,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地位作用、核心任务、时代使命的理解,增强了系统化、深层次地探寻“中国之理”的使命担当。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自主知识体系;“两个结合”

为进一步扎实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深入研究,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建设,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发展和創新,2023年8月5~6日,由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会主办,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威海)、《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编辑部联合承办的“第三届全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术研讨班”在山东大学(威海)举行。来自全国46所高校的近百名学者参加,与会学者围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三大体系”建设、“两个结合”的内在逻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的中国立场和方法论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提出了具有创见性的观点和思路。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基本理论、基本范畴,是马克

* 刘清云,法学博士,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专题史;武晓玮,哲学博士,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理论表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所属的二级学科,肩负着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深入系统研究、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任,这就需要加快构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自主知识体系。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使命和时代价值,为推动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探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是当前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发展的时代课题,也是本次研讨班研讨的核心议题。

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雷声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要重点明确三个关键点和四个要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三个关键点分别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定义、内容和特征,对知识体系的界定,以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知识体系建构的自主表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理论表达,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阐明了“自然、社会和思维认识的客观规律”和“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两大类规律,表现出整体性、普适性、结构性、发展性四个特征。知识体系是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总和,以理论体系(学术体系)为核心,要在建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理论体系的基础之上系统建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知识体系。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知识体系建构的自主表现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论基础、发展与创新;二是建构要坚守中国立场、构建中国理论、表达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四个要素分别是研究主题、逻辑起点、核心范畴、框架结构。明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主题,关键在于正确理解“思想路线和逻辑主线相统一”这一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思想路线是实现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而对自然、社会、思维认识的客观规律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揭示,是为了支撑思想路线实现而构成的逻辑主线,二者是高度统一的。思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逻辑起点,一要打破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的思维方式,二要反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最核心的规定性范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核心范畴在体系中的排列顺序需要重点考量,只有科学合理地排列顺序,才能反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理论体系的逻辑性、科学性。只有在确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主题、逻辑起点、核心范畴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构建相对完善的框架结构。

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孙熙国教授指出,当代中国自主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知识体系建构,可以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坚守人民立场的思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思想、人民民主的思想、文化建设的思

想、社会建设的思想、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世界历史的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思想等九个方面进行理解。

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三大体系”建设

张雷声教授在开幕式致辞中指出，本次研讨班聚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这一主题，将“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大体系置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来理解，意义重大。自主知识体系和“三大体系”构成了“总一分”结构，对“三大体系”进行理论探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应有之义。

第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科体系建设。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徐艳玲教授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科体系可以从学科的内容体系和学科的建设体系两个方面来理解。学科的内容体系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范畴体系、要素构成等，学科的建设体系可分为学科认知体系和建设要素体系。学科认知体系包括研究基础、研究方向、研究目标、研究方法、研究价值等一系列观念认知体系，学科建设要素体系包括教学大纲、教学队伍、教学平台、教学政策支撑等内容。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永贵教授指出，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很多，其中，如何统筹党史党建学科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是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性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其学科边界还不够准确，成果和学科方向的契合度、研究培养方向和学科设置本身的复合度也需要进一步提高。

第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术体系建设。孙熙国教授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科内涵、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对象和历史使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论体系、建构当代中国自主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知识体系四个方面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术体系。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科内涵十分丰富，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三个组成部分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实践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马克思主义与其他二级学科的关系等方面进行理解。孙熙国教授进一步指出，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对象来看，其主题是“为人类求解放”，主要包括“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和解”“人和人之间的和解”“人类自身的和解”三个方面，并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发展，而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则成为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论体系来看，“三个解放”构成了其基本框架：“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对应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辩证法，旨在讲清楚人与自然的关系；“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对应马克思主义的

历史观、政治经济学，旨在讲清楚人与社会的关系；“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对应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人学观，旨在讲清楚人与自身的关系。这三个方面体现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共同组成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

第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话语体系建设。王永贵教授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主观话语和客观世界规律性认识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话语体系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话语体系的基本原则”三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话语体系进行了深入分析。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话语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外在表达形式，按照思维方式的规律，可以划分为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日常生活话语三个层级，政治话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立场；学术话语居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话语的中心位置，在三个话语层级中扮演着承上启下的重要角色，是核心要素；日常生活话语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大众化的日常表达。在这三个话语层级中，学术话语具有最强的适用性，一方面为政治话语提供学理支撑和科学解释，另一方面引领日常生活话语，通过“反哺”使日常生活话语更显理性和前瞻性，是马克思主义可以产生整体影响力和真理魅力的关键所在。王永贵教授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话语体系的特征表现为六个方面：“批判性与建构性相统一”“传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整体性和时代化相一致”“抽象性与大众化相贯通”。当前，建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话语体系，一要坚持守正创新，既要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话语精髓，又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二是要做好对内对外话语表达的有机统一，争夺国际话语主导权。

三、“两个结合”的内在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两个结合”，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又一重大创新。“两个结合”高度概括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良性互动关系，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当前，只有持续增强推进“两个结合”的自觉性，才能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的新境界。

第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内在逻辑。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主任李佑新教授剖析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从历史逻辑来看，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存在着历史时

代的差异，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创立于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了的欧洲近代社会，其理论和实践要求是改变资本主义世界，主张通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实现社会主义。而在马克思、恩格斯实现世界观转变的时期，英国发动了鸦片战争，用坚船利炮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中国被迫卷入近代社会。这一时期，中国还在试图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存在着历史时代的差异，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从理论逻辑来看，要想将理论付诸实践以改变现实世界，就必须充分考虑实践环境的历史性和具体性，否则就会陷入教条主义，所以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遵循形式逻辑使用概念、范畴对自然界、人类社会、思维认识的规律进行抽象而建构出来的一般的、普遍的原理，不能直接用于一个国家的具体实践。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是以改变资本主义现实世界为目的的；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也是为了改变现实，为了救国。因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必然要求付诸实践，必然要求运用于特殊的、具体的历史环境，从而必然要求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实践逻辑来看，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伟大实践所总结的成功经验，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就要立足并扎根中国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紧密结合起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解决各种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才能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壮大。

第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内在逻辑。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名誉院长周向军教授深入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第二个结合”）的五个问题：“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发展过程、“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内在逻辑、理解把握“两个结合”关系的关键点、“第二个结合”的价值意义、推进“第二个结合”的现实路径。周向军教授指出，“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创新。在成立百年之际，我们党明确提出并一再强调“第二个结合”的原因在于其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伟大事业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的迫切需要，是总结历史和现实经验教训的必然结果，它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坐江山”中的特殊重要性密切相关，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时代价值的全面深刻体认密切相关，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第二个结合”的提出，不仅将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认识提高到新水平，而且还提供了新时代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为了更好地推进“第二个结合”，要全面、系统、完整、深刻地理解把握习近平关于“两个结合”重要讲话的基本精神；要自觉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力求做到“信道”“知道”“懂道”

“通道”“行道”；要全面、系统、完整、深刻地理解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要深入调查研究，做到实事求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现守正与创新相统一；要发扬斗争精神，防止和批判各种错误倾向；要在不断总结经验、利用经验中前行；要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上下功夫。

第三，“两个结合”的内在关系。周向军教授表示，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前者带有一般性，后者带有特殊性；前者体现全面性、整体性，后者体现重点性、部分性；前者强调实践（实际）性，后者着重文化性。“两个结合”有区别，但不可分割，是统一的整体，都统一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伟大实践中，都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联系，都必然在党的道路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的伟大实践中表现出来。张雷声教授认为，“两个结合”是构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自主知识体系必须首先认识的问题，二者彼此契合，互相成就，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发展性，说明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的中国立场和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的中国立场是构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自主知识体系必须要把握的因素，只有坚守中国立场，才能够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知识体系建构的自主性。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的方法论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自主知识体系在哲理层面、社会责任层面和使命担当层面的要求。只有进一步明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的中国立场和方法论，才能不断提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的自主性、原创性和系统性。

第一，坚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的中国立场。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万美容教授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的中国立场既体现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者的学术立场，更重要的是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或基本立场，其基本内容涉及政治立场、价值立场和认识立场三个方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的政治立场是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要想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关键在于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坚守并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理论使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的价值立场体现为坚持人民立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人民至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底色，在理论研究的过程中，要始终从人民的立场来观察现实、发现问题，坚持人民至上，从而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原创性贡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的认识立场是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系统观念、反对教条主

义和坚持问题导向，只有这样才能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新时代的新情况新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第二，探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的方法论。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会副会长、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钟明华教授梳理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的历史演进过程，并从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的原因和方法路径两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的方法论进行了系统论述。他指出，必须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探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的方法论，基本要求是研究方法必须符合研究对象，契合研究目的，具有主体意识。从研究对象来看，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上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的，关于人的自由和解放的理论体系；从研究目的来看，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否定和放弃马克思主义；从主体意识来看，要重点把握信仰马克思主义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正确处理好这个关系，不仅关系到学术研究能否取得进展，而且关系到信仰能否保持。钟明华教授表示，不论是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设置“合一—分—合一”的演变历史来看，还是从当前对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整体性教学落实不到位的现状来看，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都尤为重要。事实上，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水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建设水平，都取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的程度和水平。

主题报告结束后，研讨班还举行了分组研讨。与会代表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和教学中的问题进行了充分的研讨交流，普遍表示通过本次学习交流，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地位作用、核心任务、时代使命的理解，增强了系统化、深层次地探寻“中国之理”的使命担当。钟明华教授在研讨班闭幕式上致辞，他认为本次研讨班的研讨主题具有前沿性、高端性，理论水平与学术水平十分突出，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理论工作者和老师们的学科自觉性。他鼓励与会学者在深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中提升自主性、原创性和系统性，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作出自己的贡献。

Strengthen the Mission of Exploring the “Chinese Philosophy”

—Summary of the Discussion on the Third National Academic
Seminar on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Liu Qingyun Wu Xiaowei

Abstract: From August 5th to 6th, 2023, the “Third National Academic Seminar on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was held at Shandong University (Weihai), sponsored by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Marxist Theory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nd jointly organized by the School of Marxism at Shandong University, the School of Marxism at Shandong University (Weihai), and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Marxist Cultural Research”. The attending scholars conducted in-depth discussions on topics such as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for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hree major systems”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 “two combinations”, and the Chinese stance and methodology for studying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They proposed innovative viewpoints and ideas, deepening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status, role, core tasks, and mission of the times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enhanced the mission responsibility of systematically and deeply exploring the “Chinese philosophy”.

Keywords: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Two Combinations

论点摘编

一 文明的历史含义及其当代启示

何中华

纵观当代人类文明的演进，可谓挑战与机遇并存、危机与契机共生。在这一充满不确定性的历史节点上，尤为需要我们回溯自己置身其中的文明，作出一种反思性的把握。全球化语境下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呼唤一个文明自觉时代的到来。追溯文明的原初意涵，“文明”和“文化”可以在宽泛的意义上通用。在人类文明初期，人的自我中心化是一种普遍的文化心理现象，但文明成熟的标志却在于这种自我中心化的扬弃。人的存在具有超越性，人的个体与类之间的积极互动，使人类文明以加速度的方式演进。人的肉体存在与精神存在的分野这一人类学本体论悖论，在东西方文明中都有各自的表现形式。西方文明塑造的现代性存在着文明与野蛮的吊诡和“伪普遍性”的霸权。从历史的长时段看，人类文明重心是随着不同的历史契机而不断转移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深刻影响21世纪文明新格局。人类普遍交往是文明发展的重要条件，文明互鉴有助于不同民族为人类文明的总体进步作出各自的独特贡献。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6期）

二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道路的现代性特征

赵义良

现代化是一个描述人类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总体性概念，它既是时间概念，一般指社会历史从“古代”经“中世纪”到“现代”的历史进程，也是理论概念，表征人类与传统告别、进入科技革命推动的工业社会的实践过程；现代性多用于有关现代化的评价，一般指对现代化过程中造就的现代社会根本特征与表现形态的哲学反思和理论概括，大致包括对社会结构转型的阶段性特征、核心要素及其对新的文明秩序的追寻等共同内容，但由于不同国家的经济基础、自然条件、文化传统不同，现代性又呈现出不同的差异性特征。西方现代化的主要驱动力是资本，因而西方现代社会展现出生产方式全面“物化”、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相对独立性、共同体与个体的撕裂的现代性特征。中国式现代化则开创了一条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呈现出的现代性特征是领导核心与人民主体的统一、社会进步与人的发展的统一、工具性与目的性的统一。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中国版本。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2023 年第 3 期）

三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全面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经验

姜志强

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极端重要的工作。进入新时代以来，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情况，我们党把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一项战略任务，从意识形态建设的领导以及意识形态内容、主体、传播、安全等维度入手，全面加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由此推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全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极大提升，为新时代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经过新时代十年的努力，我们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力全面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

形态的引领力、凝聚力、影响力显著提升，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战斗力大大增强，由此推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为下一步开展意识形态工作积累了丰富经验，有助于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继续推动意识形态工作的创新和发展，从而凝聚引领全国人民为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目标而奋斗。

（摘自《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5期）

四 科学把握自我革命战略思想中的辩证思维

吴付来

辩证思维是一种从相互作用关系中把握事物本质的科学运思方式。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战略思想遵循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逻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本质上体现了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否定之否定过程。在内涵要义上，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对自身政治属性的深刻恪守、对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的系统总结、应对伟大斗争的锐利武器、掌握历史主动的关键所在。在实践路径上，自我革命坚持自律与他律的辩证统一、培元固本与开拓创新的辩证统一、整体态势与关键重点的辩证统一、刀刃向内与刀刃向外的辩证统一，实现了党的建设事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同频共振。在未来导向上，自我革命要求坚持党的领导与全面从严治党紧密结合、赓续精神谱系与理想信念教育互为支撑、加强顶层设计与完善制度规范体系相互衔接、站稳人民立场与创新监督手段相互促进，为新征程开辟自我革命新境界提供领导力量、文化支撑、制度保障和价值导向。自我革命诠释了我们党坚持和运用辩证思维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进程、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制胜之道。

（摘自《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2期）

五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哲学阐释

李海青

建党百余年，中国共产党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世界的面貌，建立了不朽的丰功伟绩。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高超的领导能力与执政水平。

因而，对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一重大问题不能泛泛而论，而应予以全面系统的总结提升，特别是要从哲学的高度加以分析梳理。这是因为，只有站在哲学的高度，才能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形成更为深入透彻的认识。总结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在哲学的视域下可以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之道概括为初心使命的责任担当、把握规律的历史主动、综合创新的理论自觉、改造世界的实践思维、自我革命的主体锻造。这五个方面构成一个相对完整、前后相继、环环相扣的逻辑框架。初心使命的责任担当是指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就以坚定的初心自觉承担起了伟大的历史使命，在价值观上始终占据着人类道义的制高点；要想践行初心使命，党就必须在把握规律的基础上洞察历史发展趋势，在战略上掌握历史主动；而要想把握历史规律、掌握历史主动，党就必须在不断破解各种历史性难题的基础上推进理论的发展与创新；创新理论、把握规律固然重要，但党更为强调对理论的实践运用、对现实世界的改造；而以上四个方面，都以党的有效自我革命为必要前提。

（摘自《哲学研究》2023 年第 6 期）

六 从人的全面发展看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

董键铭

从人的全面发展来看，资本主义导向了人的抽象化、片面化发展，以超越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理论蕴含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可能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为这一理论构想的实现提供了现实性。就物质基础而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蕴着剥削与对生产力发展的破坏，社会主义超越了资本主义对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与社会的两极分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中国式现代化展了解放生产力、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的现实性。就人与资本的关系而言，资本主义创造了资本凌驾于人之上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超越了资本逻辑对人的异化和宰制，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展现了重新颠倒人与资本关系的现实性。就交往形式而言，资本主义使国家成为虚幻的共同体，并造成了不平等的世界秩序，社会主义在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探寻人与人之间平等的普遍交往的可能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过以人民为中心等一系列新理念，以中国式现代化展现了交往形式全面发展的现实性。

（摘自《哲学研究》2023 年第 2 期）

七 民族复兴的文明追求

刘志洪

取向是自觉的人选取的方向。方向引领道路，道路决定命运。复兴取向在深层的意义上规约中华民族当代复兴的方向、路径与样式，构成中华民族再度兴盛的灵魂。中国道路是民族复兴取向具体的展开与实现，又确证和强化这一取向。深刻把握复兴的合理取向，中华民族的当代复兴将是刚健有力的。相对意义上的复兴是中华民族重回世界前列，绝对意义上的复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存在品质重达时代高度，后者构成中华民族当代复兴更深刻的含义。文明是人的生命活动及其结果尤其是积极成果的总体，本质上为人“文化”的结果与条件，具有“文化而明”的深层意涵。当代中国和世界历史的发展，皆要求中华民族开拓一种在根本上超越作为物性文明之资本文明的崭新文明。从文明视角看，中华民族当代复兴的取向就在于创造更有益于中华儿女生存发展、更有助于社会成员美好生活的新文明，并持之以恒地发展与升华之，在于开创当代历史可能范围内最有益于人之存在及其升华的文明形态。中华新文明不仅是人的文明，而且是“文化”的人的文明，需要“文化”的人与之相辅相成，创造进而升华文明，从而“配享”文明。

（摘自《哲学动态》2023年第5期）

八 “三个务必”的历史生成、内在逻辑与践行路径

张新平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三个务必”，即“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在中国共产党走过百年历程、领导全国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重大历史关头，“三个务必”的提出毫无疑问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三个务必”的提出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三个务必”是中国共产党在对“两个务必”长

期坚持的基础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创新和发展；“三个务必”内涵丰富、逻辑严密，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前进动力与工作作风、精神力量的高度统一；“三个务必”直接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丰富实践，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切实做到“三个务必”的路径也涵养其中。“三个务必”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时代的呼唤，是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重要遵循。

（摘自《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3 年第 2 期）

九 中国共产党百年大党的独特优势

刘红凇

要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必须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中汲取经验智慧，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作为百年大党所具有的独特政治优势、理论优势、制度优势、组织优势、精神优势以及党的建设重要“法宝”。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的成功经验表明：中国共产党具有坚持人民立场、人民至上的政治优势，坚持与时俱进、守正创新的理论优势，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优势，具有组织体系严密与纪律严明的组织优势，具有勇于自我革命的精神优势和党的建设法宝。就中国共产党具有的五大优势之间的关系来看，坚持人民立场、人民至上是贯穿党的所有优势的“一条红线”，党的理论优势、制度优势、组织优势、精神优势都是建立在坚持人民立场、人民至上这一政治优势基础之上。比较而言，党的政治优势具有根本性，理论优势具有指导性，制度优势具有关键性，组织优势具有支撑性与保障性，精神优势具有动力功能。然而，要保持与发扬党的优势、使优势转变为胜势，必须通过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来实现。在此意义上看，党的建设这一重要“法宝”不仅能够强基固本，而且是维护与巩固党的优势、创造新优势的根本所在。

（摘自《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3 年第 1 期）

十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形成历程、实践特征及世界意义

梁伟军

现代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重大战略目标。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便担负起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使命责任，带领人民历经百年奋斗取得重大成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先后经历了从“一化”到“四化”、从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从工业化到新型工业化以及“四化同步”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协同发展的正式开启（1949～1978）、初步探索（1978～2002）、快速发展（2002～2012）、成功推进和拓展（2012年至今）四个阶段。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特征包括坚持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坚持以团结奋斗为强大动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价值立场、坚持以协调发展为内在要求、坚持以生态保护为基本原则、坚持以和平发展为本路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世界意义在于创新发展了世界现代化理论，丰富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积极贡献了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中国智慧。

[摘自《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

《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征稿启事

本集刊是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专业集刊,旨在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者搭建一个交流、探讨的平台。常设栏目有名家访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化理论研究、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青年论坛、博士论坛等。

本集刊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开展文化研究,坚持政治标准、学术标准,依托经典,关注现实,追踪前沿,扶持青年,推进对话,助力创新。欢迎各方有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志趣者通过邮件向本刊邮箱(mkswhyj@163.com)投稿。

本集刊为半年刊,截稿时间上半年为9月底,下半年为4月底,文章字数在0.8万~1.5万字。本刊全文已加入中国知网等数据库,投稿即视为同意加入。作者著作权使用费和稿酬一次性付清。本刊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审稿费等。投稿文章请遵循以下格式规范

(一) 论文要件及字体字号等

- 1.大标题,三号黑体;副标题,四号楷体,居中。
- 2.作者,小四楷体,居中。
- 3.作者简介(30~50字),以当页脚注方式,注明姓名、单位、职称、职务、研究方向,小五宋体。
- 4.中文摘要(300字以内)和关键词(3~5个),五号楷体,关键词用分号隔开。
- 5.正文,五号宋体,英文和数字使用Times New Roman字体,默认单倍行距。
- 6.英文内容,包括题目、作者姓名、摘要、关键词,置于文末。

(二) 正文层次及字体字号

- 一级标题:一(用小四号标宋)。
- 二级标题:(一)(用五号黑体)。
- 三级标题:1.(用五号仿宋)。

(三) 文中引文注释方式

参考文献统一采用当页脚注形式,每页单独排序,序号采用①②③,置于引文结束处的右上角。

1.专著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1页。

陈先达:《哲学与文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页。

[英]以赛亚·伯林:《卡尔·马克思:生平与环境》,李寅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99页。

Yadullah Shahibzadeh, *Marxism and Left-Wing Politics in Europe and Iran*, Switzerland: Palgrave Macmillan, p.35.

2.期刊

王韶兴:《现代化国家与强大政党建设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

Wolfgang Streeck, "Engel's Second Theory: Technology, Warfare and the Growth of the State", *New Left Review*, Vol.132, 2020, pp.75-88.

Linda Weiss, "Globalization and State Power", *Development and Society*, Vol.29, No.1, 2000, pp.1-15.

3.文集

[英]安东尼·吉登斯:《处于舞台中心的中左翼》,杨雪冬、薛晓源主编:《“第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页。

David M. Kotz,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 Lessons from the Demise of State Socialism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 in Robert Pollin(eds.), *Socialism and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 Essays in Honor of Howard Sherman*, Cheltenham and Northampton: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00, pp.300-317.

4.报纸

张士海:《自我革命何以成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光明日报》2022年1月21日。

引用中国古典文献,一般在引文后用夹注,如(《论语·学而》)。

(四) 图表编排

- 1.由于采用黑白印刷,电子制作图表时图例不宜用彩色区分。
- 2.遵循“先文后图表”的方式,图表与文字对应,并注明资料来源。
- 3.图表顺序编号,如图1、图2;表1、表2,并注明图表名称;图名统一放在图下中间位置,表名统一放在表上中间位置。

中共中央宣传部原部长王忍之题写刊名

《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集刊简介

本集刊由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办，属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专业集刊。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化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中外文化发展现状、中国传统文化、多领域文化问题（比如经济、政治、社会、生态、外交、军事等领域的文化问题）、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世界文化思潮等。

本集刊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和分析中外文化理论与实践，积极刊发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的新成果；坚持学术第一的标准，大力推荐富有新思想、新观点和新方法的关于中外马克思主义相关领域的文化研究成果。

我们将力争把本刊办成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重要理论园地，并与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结合起来，注重前沿和热点问题研究，大力扶植青年学者，推出一系列有分量、有深度、能够引起理论反响与学术争鸣的高质量研究成果，积极为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建言献策，并不断提升学术质量，扩大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影响力，拓展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阵地。

ISBN 978-7-5607-8048-1



9 787560 780481 >

定价: 57.00元